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

毛泽东哲学思想

韩树英 杨春贵
宋一秀 孙克信 苏厚重 万井容 著
曹晨辉 杨梅叶 陶后明 董德刚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济南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

出版说明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值此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我们组织撰著出版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是为了弘扬毛泽东思想，更加完整地系统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早在1943年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的讲话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确认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必须“向全党提出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重申，由邓小平作出重大贡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的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本着研究“要联系实际，要精，要管用”的原则，约请我国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沙健孙、梁柱、韩树英、万福义、王珏、丁振海、刘广东、贾若瑜、王洪模等人，分别就毛泽东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建党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伦理思想、军事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新时期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研究。这些著作或是个人撰写，或为集体合著，均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倾注了辛勤劳动，是他们多年来心血的结晶。

我们在组织《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曾得到龚育之、逄先知、卫建林、邢贲思、苏星、郑惠、石仲泉、龚希光、周倜、金春明、陈登才、郑宗汉、宋贵文、卢新德、赵永献等等及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由于水平限制，编辑《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的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的话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转“七五”规划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此项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负责人是韩树英，课题组最初的成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万井容、孙克信、宋一秀、苏厚重、杨春贵。课题组讨论和制定了研究提纲和计划，作了研究分工。其间编写了《回忆与评述——毛泽东的哲学活动》等中间成果。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多数人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辞条的撰写，又分头主编或参与编写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毛泽东哲学思想新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7卷等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这实际上为本课题最终成果的形成作了一定准备。1990年课题组重新讨论、修改了编写计划和要点，决定形成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是集体的研究著作。编写工作由韩树英主持。参加本书初稿执笔的有：韩树英（导言）、宋一秀（第一编第一、三章）、杨梅叶（第一编第二章）、孙克信（第二编第一章）、苏厚重（第二编第二、四章）、曹晨辉（第二编第三章）、万井容（第三编第一章第一节）、杨春贵（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第二、三章、第四章第一节）、董德刚（第三编第四章第二节）。初稿写出后，苏厚重同志不幸因病逝世，这是课题组的损失。课题，

组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对他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敬意。全书初稿经过课题组集体讨论后，由原执笔者作了修改。根据讨论的意见，苏厚重执笔的第二编第二章由陶后明作了修改和较多的补充，是该章的第二作者，第四章由曹晨辉作了调整和修改。分头修改后，由杨春贵对全书作了统改，又由韩树英对全书作了统改、补充，最后定稿。

陶后明承担了全书的技术整理工作。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许多有关成果，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技术原因，未能一一注明来源，谨表歉意。

山东人民出版社姚梦林同志对本著作的成书付出了很多精力，特此表示感谢。

关于书中引文的版本，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选集》第1—4卷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列宁著作的引文，一般依《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为准。

本书的准备时间虽然比较长，但写作和修改的时间却比较仓卒，又限于作者水平，书中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恳请读者和同行专家批评指正，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欢迎大家作进一步讨论。

作　者

1992年6月于北京

导　言

这部《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研究性著作。多年来国内外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性论著，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研究新发表的有关资料，从各方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进一步探索，把握它在当代的重大意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也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这部著作集中了迄今我们的研究心得和成果，在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前夕，我们把它奉献给我国理论界和广大读者，并就教于同志们。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走过的路程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便没有胜利的可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不会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而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指导，也不能实现这种结合，从而也不能有这种胜利。环顾当今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从历史过程中展望我国的未来，不能不使人愈加感到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由此，也就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深化对它在当代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的认识。

当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正在世界上受到广

泛的关注。有40多年历史的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瓦解于一旦，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由此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对抗，已经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但是，同时引起世人瞩目的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以愈益增强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人们不能不在这种对比中沉思，寻求问题的答案。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根本的经验是，在曲折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或者说在具体实践中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党的十三大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曾经发生过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导到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有了这两次飞跃，也才有了中国的今天。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1] 这是中国的经验，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它的普遍真理性，既为历史所证实，也正在为现实所证实，并将不断为未来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同具体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发挥出巨大的现实力量。而这种结合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同不同时代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中，就能显出无限的生命力，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是需要从哲学理论和方法上来加以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中，在解决这种哲学问题过程中，以概括实践经验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从形成之日起，就在人们面前提出如何正确对待它，如何运用它和如何发展它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指出了解决问题应该遵循的哲学原则和道路。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 1882 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德文第 1 版序言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 这是在马克思逝世前 1 年写的，是他和马克思一生共同战斗的经验总结。这是对“保持了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德国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 246—24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8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377—378 页。

者说的，特殊地指明了辩证法的意义，可以一般地理解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把握和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可能。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具有的这种意义。

恩格斯逝世不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潮，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完备，过时了。这是以后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1899年列宁写了《我们的纲领》一文，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这种思潮，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这种理论并不是要一味重复它的一般原理，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列宁所涉及的正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运用这一理论，如何研究和发展这一理论的问题。这里没有直接提及哲学，而表述的正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正是根据这种思想，适应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成功地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达到了胜利。

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挫折和失败，人们才获得了对它的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1页。

封建帝制，但争取民族独立、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本任务并没有实现，革命失败了。这是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实行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这是一种性质的失败。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惊醒了的先进的中国人，决心走俄国人的道路，建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国家的命运，以自己的活动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一直发展到轰轰烈烈的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显示了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这是人们的新的认识。

人们的认识在曲折过程中深化、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既体会不深，又没有积累到具体解决这一问题的足够经验。其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招致的大革命的失败，继之而来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造成的革命的重大挫折，是另一种性质的挫折和失败。它在深化人们认识的进程中，把如何总结革命连遭失败、挫折的根本教训，如何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如何具体解决理论和实践统一问题，极其尖锐地提到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提到哲学思想高度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肃清其影响，必须从哲学理论和方法的高度具体地解决理论和实践统一问题，对此认识得最早最深的是毛泽东。在 1930 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直接从哲学上提出问题，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从更早的萌芽起，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一系列有关哲学的

光辉著作，系统地形成了以他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中进行的革命，如果象列宁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同属于资本主义的英、法、德、俄国家，还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考虑各国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有着理论和这些国家的各自的具体实际相统一问题的话，那末把理论应用于中国这样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更为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就以更加特殊的尖锐性突出出来了，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要借助哲学才能解决的问题，异常尖锐地突出出来了。毛泽东对解决这一重大哲学问题，作了最大最多的贡献。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中形成的哲学思想，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合乎实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不会有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它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任务，不是批判以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是批判和克服在实际斗争中党内表现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即表现为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具体解决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和提出的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哲学理论问题，而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时就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很明显，解决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哲学理论问题，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不能停留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

论和实践关系的一般论述上，而必须依据这些原理和论述，又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这些原理和论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这些问题又势必要涉及多方面的哲学理论，而不能局限于对一两个基本观点的发挥。毛泽东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前提，在鲜明地揭示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对立的两条思想路线，从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概念和结论，并把这些观点、思想等运用于党的建设、政治斗争策略、军事斗争、文艺理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从各方面加以展开，形成了内容极其丰富而又有机地统一的哲学体系，成为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民族的优秀哲学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在形式上带有民族的特点。它深深扎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之中，是党和群众手中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民主革命中形成和发展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道路过程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的学说和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它不仅是中国经验的概括，也反映和总结了国际上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后的国际国内的经验和教训，都从正反两个不同的方面证实了它的真理性和重大意义。

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错误是由多种复杂的原因形成的，重要的是他既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作了主观的片面的估计，又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有误解，在一定条件下，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偏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轨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吸取了国际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分析了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以此为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我们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重大变化，我国的发展日新月异。而这些变化正是从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以哲学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为先导的。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强调了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积极支持并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党哲学认识论的大讨论，在此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充实并完善了它的内容。他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是他明确提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等等。这些都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重大贡献，把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全面地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带来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和发展，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了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了强国之路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等等，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道路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得到了充实和重大发展。对此，邓小平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就可以把这些认识作一些归结。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前面已经提到了从几种角度的把握。从它的实质、历史地位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在当代条件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的本质特征、基本功能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原理的哲学理论和方法。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邓小平1992年年初巡视南方的重要谈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更快地把我国的经济从一个台阶推上另一个新台阶，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提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左”的东西要着力防止，教条主义必须反对，要立足于当今的时代，放眼世界，勇于探索，大胆试验，以实践为标准破除错误的陈旧过时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右的东西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必须批判，也要防止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以免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前进的方向。这就是说，根据历史经验，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遵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把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需要不断深化，研究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我们欢迎专家和读者对这本书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我们提高研究的水平。我们也期望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著作问世，扩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这是集体的事业，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 2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2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 3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 6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 ……………………… 10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 10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 21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 … 30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 36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1921—1927 年） …… 36
一、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 37
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 …………………………………………………… 37
三、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 38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1927—

1937 年）…………………………………………… 40
一、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辟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 41
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创立了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 …………………………………………… 42
三、分析了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 …………………………………………… 43
四、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 44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多方向展开（1937—1949 年）…………………………………………… 46
一、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 46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完整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 47
三、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 48
四、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体系 …………………………………………… 49
五、系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达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空前统一，来赢得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 51
六、依据历史辩证法，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 52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建国后经历复杂过程的发展（1949—1976 年）……………………………… 53
一、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 54

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 56
三、揭示了人类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 56
四、指出形成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阐明了物质和精神辩证转化的辩证规律 …… 58
五、批判了唯心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 …… 59
六、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 …… 60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新阶段（1976年以来） …… 61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 62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 …… 63
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在再认识中的深化和重大发展 …… 65
四、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思想 …… 66
五、深化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和统一战线理论 …… 67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 70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 70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70
二、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 74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 76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 78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重要特征 …… 84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 85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 86
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 ………………………………… 94
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哲学思想武器 …………… 100

第二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第一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 104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发展 ……………………… 106
一、科学地揭示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 106
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109
三、深刻论述了天才和实践、天才和群众的关系 ……………… 115
第二节　系统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 ………………………………………………… 118
一、认识运动的过程、阶段和“两个飞跃”、“两变”的思想 …… 119
二、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 …… 128
三、认识的总过程、总规律 ………………………………………… 131
四、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和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性 ……………………………………………………… 133
五、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 138
第三节　强调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 ………………………………………………… 141
一、自觉能动性的科学内涵和表现 ……………………………… 143
二、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和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 …………… 149
三、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 ………………………………………… 154

第四节 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 …………………………… 159
一、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认识基础 ………………… 159
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 166
三、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173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反对主观主义 ………………… 179
一、反对主观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 180
二、从哲学认识论高度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 ………………… 183
第二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 190
第一节 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
实质和核心 ……………………………………………… 191
一、从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论述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
最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 192
二、论述了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把握和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及
其运动发展 ………………………………………………… 198
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深刻说明其他辩证法规律和范畴
………………………………………………………………… 204
第二节 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建立了分析
复杂的现实的矛盾的逻辑体系 ………………………… 221
一、两种宇宙观、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 223
二、以矛盾普遍性为基础，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 229
三、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具体阐述 …………… 248
第三节 揭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 255
一、揭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
髓 ………………………………………………………………… 256
二、把握矛盾问题精髓的意义 …………………………………… 261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矛盾

分析方法 …………………………………………… 267
一、反对形而上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显著特
点 ……………………………………………………… 267
二、论坚持矛盾分析方法 ……………………………… 276
第三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 289
第一节　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 ………… 290
一、国情分析与中国革命性质及其道路的揭示 ………… 291
二、阶级分析与中国革命动力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证 ……… 298
三、时代分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历史必然性的论证 ……… 311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的学说 …………………………………………… 316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 317
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331
第三节　群众路线 …………………………………… 341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 342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根本内容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 348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 359
第一节　党的建设中的哲学思想 ………………………… 359
一、正确处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辩证关系，把思想
建设放在首位 ………………………………………… 360
二、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 ………………………… 367
第二节　政策和策略中的哲学思想 ……………………… 373
一、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唯物主义原则 ………………… 374
二、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 376
第三节　军事斗争中的哲学思想 ………………………… 384
一、研究战争规律的方法论原则 ……………………… 384
二、战略战术辩证法 …………………………………… 388

三、人民战争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 390
第四节　文学艺术论中的哲学思想 ………………………… 392
一、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 393
二、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 394
三、文艺工作中的辩证法 ……………………………………… 396
第五节　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 401
一、毛泽东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 ……………………… 402
二、毛泽东方法论的若干特点 ………………………………… 404
第六节　关于哲学解放 ……………………………………… 406
一、毛泽东致力于哲学解放的伟大实践 ……………………… 406
二、哲学解放和群众学哲学的努力方向 ……………………… 411

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 417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 418
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 418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 422
三、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426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430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434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434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 439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443
第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 ……………… 447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 448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448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452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 454
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 456
五、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 ……………………………… 459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改革 …… 461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462
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 465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473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 473
一、论证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474
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
能激化 ……………………………………………………………… 476
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 479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 ……………………… 482
一、重新确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
的科学思想 ……………………………………………………… 482
二、对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 ……………………………… 484
三、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 488
第四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 ……………………………………………………………… 494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495

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
务之一 …………………………………………………… 495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 ……………………… 498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 502
四、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504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508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 ………………………… 508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 514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 ………………………… 517

第一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早在 1977 年，邓小平就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种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要全面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首先应当了解它的形成、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40—41 页。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实践的产物，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在哲学中的升华。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曾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② 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在一定的阶级、社会集团哲学思想中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要准确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544 页。
② 同上书。第 1 卷第 120、121 页。

哲学思想，首先必须把握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我们研究哲学史上任何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都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时代的特点。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哲学思想，离开一定的时代条件考察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思想实质和特点，不能确定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其特点是：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和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时，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怎样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总结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无产阶级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

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其特点是：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的、腐朽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阶级斗争日趋尖锐，革命浪潮逐步高涨。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列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他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

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了。列宁指出："继东方觉醒时期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① 他还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②毛泽东也指出：十月革命后，"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③ 新的时期给革命者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这一崭新的重大课题，这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困难而又特殊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提出的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任务，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而又激烈尖锐的矛盾，成了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你争我夺的一块肥肉。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极为奇特的图画。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完整而又深刻地描述了这一幅矛盾交

①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3页，第71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666页。

错的情景。他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欲望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迫切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并日益发展起来。伴随着上述矛盾的发展，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反动政府与士兵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他指出，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就能知道当时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就能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全中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①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矛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月革命后，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在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俄国由理想变为现实，并且在二次大战后由一国发展为多国的现实。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的历史课题，是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分析时代和本国社会特殊性出发，揭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道路，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101页。

义建设道路中，有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取得成功的经验，随后也有偏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轨道，使事业遭到重大挫折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全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应有的权威，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由此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呈现出生机和活力。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回答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课题中，进一步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故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发展的事实，不能不使人们愈益感到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这一伟大时代的特征和意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时期，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进而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发挥了并且在继续发挥着强大思想威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这两个历史过程，就完整地显示出它的伟大时代意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产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适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

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入，逐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工人阶级随着官僚买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40万至300万人。

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时起，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表现出特殊的英勇战斗精神。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其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规模也日益扩大。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我国工人阶级进行过多次罢工、起义，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罢工斗争共计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的短短几年中，罢工斗争就达到130多次，罢工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特别是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工人成了这一斗争的主力，这说明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这给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解放道路。在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解救民族的苦难，争取独立和解放，曾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代替封建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企图仿效欧美建立资产阶级

共和国，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们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了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 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宇宙观并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先进的中国人总结了多次斗争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新的阶级力量，以指导和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② 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作为无产阶级科学宇宙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先进的中国人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代替资产阶级宇宙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决心走俄国人的路。"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 年创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为"自为的阶级"，开辟了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实践证明，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实践又证明，不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不能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中国无产阶级也就不能完成其阶级使命。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解决这一"结合"的事关革命成败的课题过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0 页。

②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第 5 页。

中产生的，是适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决不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思想，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恰恰相反，它是在反对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在反对和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有如汪洋大海的国度，在中国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有影响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要求改变现状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涌进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观未能得到彻底转变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不在革命过程中顽强地表现出来。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上的表现，是在实践中唯心主义观点的表现。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实践中是唯心论者”。[①] 它只能导致主观和客观的分裂、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危害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性。主观主义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党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反对这种党性的大敌中，产生和发展的。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斗争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和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8页。

中国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革命实践的需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阶级基础。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

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 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② 这表明，任何真正的哲学，它的产生和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新，除了为一定时代所规定和一定阶级利益所制约以外，还有其思想理论来源。哲学是现实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又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继续和发展。任何一个哲学家，如果不从一定的思想资料出发，适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发展这些资料，都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原理、规律都来自这一基本理论。正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毛泽东在 1937 年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写的：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的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乃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另一种哲学思想体系。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回答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为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任何企图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都是错误的。

十月革命后，特别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涌现了一大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毛泽东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在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 他在 1921 年 1 月复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

---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9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集》第 15 页。

毛泽东历来强调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为全党作出表率。他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研读马列著作。1932年4月，红军打开当时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时，弄到一些马列著作，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对这几本书爱不释手，一直带在身边，甚至在长征路上，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这些马列的书。

到了延安，毛泽东广泛搜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为了从理论上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从哲学上批判主观主义思潮，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列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当时，毛泽东阅读、圈划并作了批注的马列著作，现在留下来的为数不多。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他先后读过的马列著作，包括以前读过而又重新读的著作，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列宁选集》（多卷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

这一时期他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倾注了最多的精力。这不仅出于毛泽东对哲学的爱好，主要的还在于实际斗争的需要。虽然1935年的遵义会议，已经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军事路线错误，1935

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也纠正了它在政治路线的错误，但对它在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它的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这种思想根源，还没有来得及揭露和批判。不仅如此，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其后接连几次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其特征，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都是不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都是主观主义。对此，就更没有来得及揭露和清算。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这时彻底清算这种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从哲学理论上揭露和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肃清其流毒，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就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主要的决定性的环节。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感到了这种哲学批判的必要，如刘少奇在1937年5月所作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①] 而事实表明，最早、最深刻、最全面地看到它的意义的正是毛泽东。正是由他来认真研究哲学，着手解决有关的哲学理论问题，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斯诺在1936年10月间访问了毛泽东，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71页。

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1] 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以前，他已经阅读了前面所列的马列著作中的若干本，不仅如此他还认真阅读了30年代苏联学者写的哲学教科书中译本，并写下了大量批注。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仔细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写了近12000字的批注。他在批注中，广泛联系近代和现代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有关哲学原理，记下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抗日战争引起的阶级关系变化和党的策略重大转变的哲学思考，不仅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哲学思想上的错误，还着重批评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在当时的条件下以这种形式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等人的思想方法的本质。他也阅读和批注了米丁等人的哲学著作，现存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译本上册)中的批注，有2600多字。这些都为"两论"的写作，直接作了准备。

毛泽东经过这一段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的哲学学习和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

这一段的哲学研究成果并不限于"两论"。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据考证它的雏型是毛泽东1936年在红军大学的讲课提纲：《军事辩证法》。这部著作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系统总结，不仅是光辉的军事著作，而且是在分析实际问题中自觉地运用并发挥马克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67—68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先前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于陕北瓦窑堡作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了随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来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党由国内革命战争改而采取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意义。而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他首次使用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哲学概念，从中国所处的基本矛盾中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分析出发，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述了国内外矛盾的变化和采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意义。这都是这一段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篇论述军事问题和政治策略问题中发挥的重要哲学思想，在“两论”中的升华，看到这一段哲学研究中他的思想发展的某种轨迹。最主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则是1937年7、8月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演用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不朽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的形成。“两论”已经不是在解决政治、军事等实际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而是升华为哲学理论本身的论述，是他的哲学观点从特殊上升为一般，从各个个别论点发展为系统化的理论，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两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显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上面说的毛泽东的读书和哲学研究活动直到写作“两论”的过程来看“两论”的内容，就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前面已经说过，它的基本的哲学概念、范

畴、原理、规律都来自对这一基本理论的继承。他长时期一直认真研读马列的一些主要哲学著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而且又是通过研读马克思列宁其他方面的著作来加深理解了的马克思列宁哲学思想，马克思列宁本人的著作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各方面著作，当然并不都是为了直接研究哲学理论，而广泛地研读这些著作，从他们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中能够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精髓。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化的世界观，是通过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通过这一广义的世界观，来全面地展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威力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喜爱哲学，读过若干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逻辑学、伦理学著作，喜爱康德哲学。在延安时期又认真读了不少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这不仅丰富了他的哲学知识，重要的是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更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哲学的思想联系和根本区别，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解。从他的哲学批注中，我们也可看到读这些书的这种意义。

我们又看到，阅读 30 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他“两论”思想的形成的确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教科书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列宁逝世两年之后，苏联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接着又进行了反对布哈林的右倾的政治斗争。在这种背景下，1929 年底斯大林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指出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脱节，落后于实际工作成就，没有能反击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这在哲学战线首先

引起了强烈反响，继批判布哈林的“机械论的修正主义”之后，这时又开始了对哲学界主导力量德波林派的“孟什维化唯心主义”的批判，开展了所谓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米丁、尤金等人指摘布哈林等把辩证法唯物论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混为一谈，修正唯物主义反映论，否定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以进化论和均衡论代替辩证法等；指摘德波林派否定哲学的列宁阶段，哲学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对唯物辩证法作了黑格尔主义的修正；把辩证法和认识论对立起来，和孟什维克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机械论合流等。结果，为了代替先前的教科书，米丁等人编写出版了一批新的哲学教科书，到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止，一直主导着苏联的哲学思潮。这些教科书在国外也发生了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著作。继20年代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这时随着其中的几本被译成中文出版，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又在我国进步的思想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主要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作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教材，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反映了上述几次哲学论战的情况和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般成果。从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可以看到：（1）他从中了解到了更多的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哲学观点，由于当时马列著作的中译本还很少，这对于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很有好处的。（2）这些书的特点是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对列宁的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而以往在中国对列宁的哲学思想了解得并不多，这对于他具体地把握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无疑是

有意义的。由于指导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不能不对列宁主义包括它的哲学的研究给予特殊的注重。（3）毛泽东在系统阅读这些书时，特别注意了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论述，批注也大体上集中在这两个部分。毛泽东的批注，有一些是在读书中形成的自己的新论点；有一些是对原书已有论点的发挥；也有一些是他记下的自己哲学思想的闪光，以后在“两论”中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例如书中一些论点：实践贯穿着认识全过程、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主导方面的意义等，他都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在“两论”中以概括中国革命经验为基础，作了系统的发挥，充分发展了这些论点，把它们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总之，原书的一些重要论点，以不同形式作为他人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在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时为他所利用。

这里应该指出，以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有些人无视“两论”和这些教科书的一定的思想联系，把已经有的一些提法也都说成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拔高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这种非历史的违背实事求是的错误态度已经得到我国哲学界的纠正。另一方面，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歪曲事实，无端夸大这种联系，说什么“两论”无非是抄袭了这些教科书，增加了中国革命的若干事例，来贬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对此国内外的学者也已经作了令人信服的批驳。正象在本节的开头就说过的，和任何一位伟大哲学家在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时都不能不利用前人积累的思想资料，并且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而改造和发展这些思想资料一样，毛泽东也利用了一些这种思想资料。但从“两论”的内容来说，它们毕竟是运用他深刻理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结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基础上，

他本人哲学思想发生的重大飞跃。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经过长期积累而发生的飞跃，这个过程并非是从阅读苏联教科书才开始的，利用这些书中的某些思想资料不过是发展他的哲学思想的一种契机、环节。和苏联教科书不同，“两论”是以从哲学理论上解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为目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批判对象，提出了新的概念、范畴和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不是在个别观点上而是在整体上把它们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供了在实际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两论”无论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和广度上，还是在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上，在它们所具有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上，都是苏联学者的教科书所无法比拟的。

“两论”的发表并不是毛泽东哲学研究工作的结束。他在1939年1月27日致何干之的信中还说：他还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①] 写作“两论”之后，他又阅读了中国学者艾思奇、李达的哲学著作，读了博古译的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41年3月以后他又重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中译本第4版。从读书的批注来看，他的思想逐步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地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集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直到1942年发表整风报告。他在继续发掘哲学思想资料，并且借评论作者们的观点，有的表示同意，有的则表示不同意，来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

量。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鼓励干部学哲学。住在杨家岭的那段时间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哲学座谈会，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党、政、军干部学哲学热潮初步形成以后，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倡议召开新哲学年会，并号召大家积极学习新哲学，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学习活动。他一贯强调干部要学哲学，建国后又大力提倡群众学哲学。

马克思指明，哲学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能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毛泽东一生都反复申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强调掌握这一无产阶级的科学宇宙观的重要意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① 他一再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他强调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都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发展了这一理论，而且在关于哲学的功能、作用，关于干部和群众掌握哲学的意义等问题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发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全面的继承，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要创立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体系，相反，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因此，那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歪曲为“中国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的观点，是极端错误和毫无根据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毛泽东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不迷信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并不是说与中国传统哲学毫无关系，相反，它与中国优秀哲学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提供了大量的可供批判继承的思想资料，使哲学思想达到更加丰满、充实；借助它使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通过民族化达到大众化。毛泽东哲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民族思想精华相联结，使之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哲学。

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加深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在完全正确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在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在成年人中它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①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哲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等人不仅以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而且也以这种丰富的哲学思想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批判继承中国哲学遗产和哲学形式的民族化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③他主张废除洋八股、反对唱空调，"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等，都有相当精湛的造诣。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⑤正因为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从而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的民

① 参见《逻辑学》上卷第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③④ 同上书。第2卷第534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族形式、作风和气派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中国的哲学遗产异常丰富。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精神文明的民族，也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既深且广。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改造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并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唯物认识论的改造与吸收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大致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繁荣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大部分已提出来，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少见的。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朴素唯物论、认识论的优良传统。从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孙武的唯物主义、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直至集古典唯物主义之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从未间断。毛泽东从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赋予崭新的意义。

在这里，最突出的事例之一，是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和发挥。“实事求是”一语最早出于班固所著的《汉书》。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做学问，广泛搜集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学者颜师古把此语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其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这本是指“修学”的一种求实学风，哲学味并不浓。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

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 这一赋予新意的解释，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点用民族化的语言作了深刻的表述，而且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批判地分析、总结和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观。自宋代以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以更明确、更自觉的形式提了出来，先后讨论过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等几方面的问题。比如，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说；王阳明则主张"知行合一"说；王夫之批判朱熹的"先知以废行"和王阳明的"离行以为知"的观点，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孙中山则提倡"知难行易"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曾受过朱熹的"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五四"时期，他已接近于王夫之的"知行相资"说。他在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他所写的《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吸收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全面和科学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从而使几千年来中国古典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争论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论军事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这是反映战争规律的朴素认识论思想。毛泽东把它誉为“科学的真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1] 这就把战争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结合起来，揭示了战争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指出，任何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

（二）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改造与吸收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产生前近半个世纪，中国就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在《周易》、《尚书》和《诗经》等典籍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改造，而后又转向了它的发源地。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从中国古代的《周易》、《孙子》、《老子》起，直至集古典辩证法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从未中断过。毛泽东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使其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中国古代辩证法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并看到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毛泽东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哲学、历史文献和成语典故里的朴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成分，赋予它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

《周易》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算卦（卜筮）的书。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经》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概括为阴阳两个最基本的范畴，认为阴阳是一切事物共同具有的两种对立的势力，阴阳互相交感产生万物，推动着事物由低到高的变化发展。这种概括，表明中华民族在古代抽象思维能力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我国《周易》思想时，曾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①] 后来，《易传》对《易经》的思想进一步作了解释和发挥。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把阴阳相互作用（交配、交合、交接）看作是一切事物形成、变化和转化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对立时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②]

《孙子兵法》是孙武对我国春秋末期以前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它是一部论战争的书，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所以它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在中外军事史和哲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译成法、英、德、日、俄等国文字，广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泛流传，至今不衰。孙武认为，指导战争必须做到全面性、反对片面性。他要求对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天时、地利、将帅、士兵等诸方面，做出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他主张从事物内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促使矛盾的转化。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对立的范畴，诸如敌我、主客、治乱、强弱、众寡、分合、攻守、进退、久速、曲直、劳逸、奇正、勇怯、虚实、动静，等等，并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了一整套朴素的辩证法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无疑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同时也吸收了孙子等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比如后发制人，诱敌深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十攻其一”，“示形”，“声东击西”，“兵以诈主”等用兵之道，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均有不小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备战略问题》的讲演中，就分析了敌与我、全局与局部、前方与后方、主观与客观、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主攻与助攻、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等 35 对矛盾。毛泽东提出的“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以一当十、以十当一”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毛泽东、朱德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等等，可以说是在现代革命战争中，对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升华。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在这里，老子看到了许多对立的事物和概念都是互相依赖和相互转化的。比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明暗、进退、黑白、巧拙、奇正、善恶、强弱、兴废、曲直、多少、大小、得失、福祸、生死等等。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又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正复为奇（异），善复为妖（灾）。”老子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极为宝贵的，它对人类的认识和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老子把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都看作是无条件的、自然而然的，因而没有也不能有作出正确的说明。毛泽东改造和吸收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科学的解释。他在讲到好与坏的辩证法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① 这就明确指出了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毛泽东历来重视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深刻阐明了对立双方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除了总结实践经验以外，无疑也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和提高。

（三）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言简意赅而又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成语典故的改造和发挥

毛泽东在文章、讲演和报告中，经常引用古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以及散见于文艺、历史等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民间的谚语、寓言、故事等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令人感到生动有趣，亲切易懂。比如，他引用《后汉书》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引用《论衡》的“闭目塞听”，来比喻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引用《沧浪诗话》的“一知半解”，来说明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引用《淮南子》的“削足适履”，来比喻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引用《宋史》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的指挥员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93 页。

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的措施，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等等。所有这些，都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道理。

毛泽东还广泛引用许多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名言，来说明深奥的哲理。比如，他引用《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说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引用班固《前汉书》中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引用《鹖冠子》中的“物极必反”，来说明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引用《史记》的“因势利导”，来说明只有根据事物发展的趋势加以引导，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引用《汉书》的“犬牙交错”，来形容矛盾错综复杂的状况；引用《资治通鉴》所载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说明要全面地看问题，切忌主观片面性；引用《鹖冠子》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来比喻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引用“曹刿论战”的故事，来说明战争的发展不是“一”字形而是“之”字形；引用《汉书》的“后发制人”，来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先退让一步，然后创造条件去歼灭敌人；引用朱熹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说明对敌斗争中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经过毛泽东的改造，都加进了崭新的内容，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成分，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大放异彩。

毛泽东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辩证法所说的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具体的和有条件的。他引用神话中的许多变化，来和辩证法的矛盾转化加以比较并作了区别。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72变和

《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所说的矛盾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一种幼稚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这就是说，神话和童话中的矛盾及其转化，不是具体的、现实的矛盾和转化，只有科学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及其转化，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我们不应当夸大这种联系。虽然，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长过程中，蕴藏着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那种夸大这种联系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什么“儒家哲学”、“孔孟哲学”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化、民族化形式的统一，更容易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理解和运用，成为他们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来自在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反映。单纯的继承和哲学形式的民族化，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归根到底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1] 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所固有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即对这种“结合”的必要性的哲学论证，对“结合”方法的系统概括，对否认“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深刻批判。它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就不能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曾经说过，《毛选》是由血写成的。意思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人民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党建、文化等方面的论著，都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这些经验和理论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讲演，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物。如果把它们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们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没有亲自参加并领导中国革命的人，没有同陈独秀、王

---

①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7页。

明等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哲学论著的。

应当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一届六中会全《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①] 邓小平也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②] 这一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③]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因此，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集体创造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公正的。

毛泽东本人从来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他个人智慧的产物。早在 40 年代初，当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还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为党了。”在 1948 年 8 月给

①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4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59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3 页。

吴玉章的回电中，他不仅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指出：“‘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① 建国后。1960 年底，他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时，在文件论述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的地方，亲笔增加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语。1964 年 3 月，他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979 年 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考虑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②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作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他们探索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例如，关于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自党成立后，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作过探讨，尽管他们的思想不太系统、不太完整，但都为毛泽东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又如，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正是毛泽东总结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的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03 页。

②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3 页。

经验提出来的。

其二，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的卓越见解，被汲取或概括在毛泽东的论著之中。例如，1929年秋，在周恩来主持下，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其中不少重要思想（如群众路线）被毛泽东汲取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刘少奇提出的关于白区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章中也加以吸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等同志提出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术思想，毛泽东加以理论概括形成完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其三，他们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有些著作就是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合作写成的。例如，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和毛泽东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建国后，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集中了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其四，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某些方面的经验所作的系统的总结，对毛泽东论著中的观点，或者作出补充、丰富、发展，或者作出精辟的阐述，或者说明了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白区工作、关于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述，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工人运动的论述，朱德关于军事工作的论述，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论述等等，有许多内容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这些论述，同毛泽东本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论述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丰

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此外，党中央总结的一些革命经验、提出的重大理论原则、制定的重要政策，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文件和文献，也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上述许多党的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直接间接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贡献。至于在这些方面他们表述的直接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反对主观主义的哲学思想，例如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1937 年 5 月)、《人为什么犯错误》(1941 年) 等表述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都为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集体智慧。

以上所有这些贡献，无不来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无不是这种经验的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先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在党的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这是毛泽东哲学的运用和重大发展。这同样也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后面将对此作专门论述。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开始萌芽于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和达到系统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和达到成熟，在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中有过积极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1921—1927 年）

从 1921 年党的成立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是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称之为党的幼年时期。他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这就指明了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一是革命的实践经验非常缺乏，二是对中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0 页。

的规律懂得不多，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但它在中国革命的沃土上已经开始萌芽了。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开始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1922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源泉，必须用革命手段消除列强在华特权，肃清军阀势力，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同年 7 月，党的“二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提出革命要分两步走。首先，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然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就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机会主义观点，表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观点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否定或架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

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1926 年 3 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当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作，是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纲领性文献，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此文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以及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①] 党的幼年时期，在农民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观点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从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5 页。

不同的两个极端否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北伐战争前夕，我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和发动，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彭湃等都一再著文阐述农民运动问题。毛泽东还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指责和诽谤，毛泽东亲自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经过32天的实地考察，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当时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他依据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阐明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对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指出这是由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他还从阐明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了对待群众运动的三种态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并指出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态度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发挥。

实践表明，毛泽东从党的创立时候起，就逐步成为我们党正确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越代表。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始结合，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实践经验在哲学上作出了一些概括和总结。但由于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但从实际出发，阶级分析和群众路线的观点已初步形成，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有了重要萌芽。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1927—1937 年）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血的教训。今后革命向何处去，道路如何走？这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经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党懂得了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紧紧依靠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党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思想。随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大小 200 多次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正是这样大规模的革命实践，为迅速找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陈毅曾说：“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和

提高。"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在政治上，我党犯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特别是犯了在党内统治时间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军事上，我军经历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了一条先是军事冒险主义，继而是军事保守主义，最后是军事逃跑主义的路线；在哲学上，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在我们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这种“左”倾错误的主要特征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通过王明等代表人物来贯彻执行的。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形成并达到了系统化。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辟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战争环境中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国内外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探索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

① 转引自郭化若：《毛泽东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中国哲学》第1辑第33页。

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政治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最杰出的创造和发展。它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创立了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

1929 年 12 月底，红四军召开“九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奠定了我军的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和资产阶级建军思想的原则界限。早在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朱德就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此后，逐步制定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为我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作出了贡献。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运用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

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战争中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指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阐明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分析了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不同时期，这种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会发生变化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自的殖民地，由此引起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基本矛盾的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中国人民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相对地下降为次要矛盾。他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分化，指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批评了那种“左”倾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他依据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对地主买办阶级内部矛盾及其变化作了科学分析，提出要善于利用的扩大敌人内

部的矛盾，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 总之，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和危害性，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思想，同时，他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这种对形势、矛盾的辩证分析，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从而对党的政治策略作了完整的分析，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四、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1930年5月，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上对党的实践斗争经验作了概括，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通过批判当时红军中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思想而作出的对教条主义具有一般意义的经验总结。首先，它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并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其次，它首次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第三，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同时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本本出发的保守主义思想路线。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这表明，本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同党内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7 年 7、8 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论文，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两篇著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系统地论述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划清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思想路线的界限。它们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形成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从 1927 年 8 月至 1937 年 8 月的 10 年时间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时期。同前一时期相比，它的内容更深刻、更充实、更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也反映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9—118 页。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多方向展开（1937—1949 年）

1937 年 8 月至 1949 年 10 月，是中国革命在挫折和失败之后又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时期。这是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在多方面展开、展现了丰富多采性而标志着达到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得到历史的证实的时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发展的总的特点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更系统更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分别得到深刻论证的。在本世纪的 40 年代中，作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最终为全党所公认，被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达到了完全成熟，被实践证明是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中国

社会和中国革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致力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在深入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和系统的理论。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批判了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割裂两个阶段的联系，先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谬论；精辟地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方面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些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完整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为了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毛泽东曾以极大精力研究了战争问题。他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论

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指导战争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论证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战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又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略进攻学说，制定了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 年，他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诸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的综合，提出要善于把它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并以此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1945 年，他又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用不少篇幅叙述了怎样养兵，怎样带兵，怎样练兵，怎样用兵的问题，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用兵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① 这一概括，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重要特色。

三、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毛泽东历来强调在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

---

① 《朱德选集》第 168 页。

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原则。他的政策和策略思想，集中反映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建国后撰写的《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在这些论著中，他明确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统一战线和对敌斗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政策和策略思想。例如，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有理、有利、有节；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深刻地阐明了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1945 年 4 月，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等著作中，用矛盾分析法对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从形式到性质进行了分析，并从敌人、队伍、领导权三个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具体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如何贯彻党的政治策略原则，从而深化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四、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毛泽东一贯强调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早在3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接着又说：“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②

在40年代，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我们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献，形成了一整套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我们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③ 还说：“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④

毛泽东创立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内容极为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基本的方法，有具体的方法。毛泽东创立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第140页。
③④ 同上书。第3卷第902页。

开辟了更加广阔和现实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五、系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达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空前统一，来赢得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刘少奇也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答宋亮同志》、《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著作。在这些文献中，指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阐明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强调了必须在实践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斗争考验，并一再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以后，为全党一致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用整风的形式和方法解决党内矛盾，是毛泽东有重大意义

的创造。把党内的政治路线分岐提到思想路线分岐的高度，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本清源，加以彻底的解决，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上的创造性运用。整风的结果达到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赢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条件。

六、依据历史辩证法，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① 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论述。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又阐明了革命转变的根据和条件。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及时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政策；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阐明了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根据、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② 这就阐明了革命转变的基本原因，进一步说明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新中国诞生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各个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怎样？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② 同上书。第 4 卷第 1433 页。

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如何？国家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作出及时的明确的回答。为了正确回答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为了驳斥国内外反动派的诬蔑和攻击，也为了答复国际朋友的关心，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时候，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深刻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其后经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又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政权的组成和形式没有重大变化而执行了内容不同的任务、职能，把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联结起来。这是从中国的特殊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范例。

综上所述，在这12年里，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和深入，我党的革命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这些都反映在毛泽东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中。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更深刻、更完整，在体系上更严谨、更系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成为全党公认的哲学基础。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建国后经历复杂过程的发展（1949—197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

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76 年 10 月，在这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一时期里，又可以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和“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毛泽东哲学思想有过适应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党的指导思想逐渐产生了“左”的错误，逐步偏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轨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践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而即使在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推动，它在一些方面也得到了发展。

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两部分，二者往往交错在一起。我们必须把正确和错误区分开来，把作为党的集体智慧产物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仍然增添了不少光彩夺目的新内容；同时，在他的言论中也存在着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错误论断，不能归入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增添的新内容，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党及时地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

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我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纷繁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也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例。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摆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课题。1956 年初，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春天，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亲自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运输等 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久，他集中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的意见，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他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指出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例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十大关系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社会主

义社会矛盾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国内外许多人，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早在50年代以前，苏联某些党政领导人和哲学家们就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只有统一、只有差别。他们认为，发展已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是差别的统一和融合。显然，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批评了斯大林没有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没有贯彻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观察，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吸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国际经验，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确地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具体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从而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贡献。

三、揭示了人类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1958年，党和毛泽东在纠正经济建设中背离客观规律，企图超越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强调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提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1960—1961年，鉴于我们工作中曾经出现过“瞎指挥”的错误，党和毛泽东重新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恢

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1962年1月，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② 他举民主革命为例说，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③他深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④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

① 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06页。

②③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第826页，第833页。

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①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又反对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错误倾向，指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对自由和必然这一对范畴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四、指出形成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阐明了物质和精神辩证转化的辩证规律

1963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对《实践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②这篇文章简洁明晰，虽不足1100字，但思想容量很大、很丰富。它批判了唯心主义认识论，指出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阐明了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转化，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阐述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指出了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等等。总之，它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第840页。

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也揭示了人们认识运动的分过程，把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的辩证运动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出来，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中指出，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有许多人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分别谈到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关于认识的主体不仅是个人，而且是阶级、政党、群众；关于"认识工具"的作用以及"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1964年9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① 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

五、批判了唯心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

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密谋炮制了一份"称天才"的材料，竭力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论。为了戳穿他们的罪恶用心，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认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页。

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他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就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破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称天才”的真面目。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坚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这就把认识论中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历史观中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了起来。

六、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准确地把握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确立我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两种矛盾、三种力量和中间地带的理论。进入60年代，国际政治力量、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变化，到了1974年2月，他完整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为国际反霸斗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这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代各种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实践表明，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里，尽管毛泽东哲学思想走着艰难前进的道路，但它还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新内容、新思想，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同时应当指出，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虽然他一再重申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但在实践上却往往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从实际出发，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虽然他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正确观点，但有时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和科学知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有时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背离了“八大”的科学分析，作出了违反客观实际的估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招致了十年动乱。我们应当认真分析这些错误，从中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并应当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真理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严格区分开来。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新阶段（1976年以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3页。

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新时期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并使之更加完备，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飞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上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引起了世界上广泛的注意。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论著和党的历次会议的文件中。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上，为重新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指出了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就无法拨乱反正，也无法开创新局面。但是，解放思想必须符合而不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那种歪曲解放思想的方针，把它曲解为随心所欲，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只能有害于党的事业，危害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就把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提高到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高到是否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发展。以此为先导引起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条战线的工作的重大变化和蓬勃发展。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这是当年毛泽东探索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和重大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轨道上来，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的基本点已初步形成。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总结了10条。在十二大报告中，则规定了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并且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的几个重要原则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纲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这个阶段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肯定我们党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2页。

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国前进的轨道。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从1991年到2000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划了更加明确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

江泽民在庆祝党的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提出了基本要求，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强这三方面的建设，根本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

1992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号召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讲话精神。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的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把两者讲全的观点；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观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等等，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充实、丰富和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在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飞跃，是在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为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充满生机和活为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集中体现了在新时期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果。

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在再认识中的深化和重大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并未丧失它的真理性，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深化和具体化这一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据，也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前提。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情况，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深化、具体化为旧的经济体制同发展生产力的矛盾，政治领导体制同发展经济的矛盾，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党的基

本路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为此，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解决这种矛盾的方针、政策、途径和方法，表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实践上找到并发挥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真实的强大动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党的十二大、十三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曾经提出过一系列的正确思想，但在一个时期里有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对我国现阶段的两类社会矛盾进行了再认识，揭示了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特点和规律、重申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四、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思想

党中央和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思想。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和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① 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1—282页。

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这就深刻说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十二大关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根据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我国全面改革发展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着重解决了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和全局性的认识问题。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五、深化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和统一战线理论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②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页。
② 《人民日报》1990年2月8日。

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指出，实践证明，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维护我国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人大、政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是我国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① 由于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因而，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及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宜宽不宜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实践证明，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71页。

中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各团体，只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去夺取胜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从多方面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范例，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它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必将不断开放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规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党的全部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这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把“实事求是”这个古老的思想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定，赋予它崭新的含义，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

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接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① 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③

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臆想出发；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以"本本"、观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根本对立的基本表现。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保守的"遵守既定办法"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对立。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他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论》、《矛盾论》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论。在延安整风中，他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并精辟地表述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第64页。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① 它集中地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高度概括。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背离实事求是，就必然抛弃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

在我党历史上，不论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口头上一般都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承认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从主观臆想和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情况出发，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还是背离实事求是，乃是党内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正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中的多方面展开，从而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3页。

邓小平1978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性。他从党创立的最初年代起，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后60年代初期党的思想路线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指出，什么时候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挫折、以至失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① 这是对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他还说："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③在这里，邓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13页，第133页，第123页。

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

二、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明确地规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具有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虽然，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还未作出明确的表述，但可以说已经初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雏形，并相当深刻地阐明了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通篇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它指出了只有深入群众去作实际调查，才能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实现这个结合；它论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真理。因此，可以说，它既讲了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问题，也讲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文献。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形成有机的统一。这三者之间，实事求是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紧密结合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 这就告诉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二是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实事求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看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而领导者不过是群众的公仆，就要一切为了群众，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一句话，就要有群众观点。同样，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观点的结合。因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思想觉悟程度出发，超过了群众的实际就是“左”，落后于群众的实际就是右。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条主义、经验等之所以必须反对，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要脱离群众，反之亦然。

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是有机联系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②这就说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靠中国同志自己去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

①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8页，第49页。

律，而不能躺在外国的现成经验上；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能把希望一味寄托在国外的力量上。这也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正象毛泽东说过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①] 当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说不要外援和拒绝向外国学习。但是，争取外国援助和向外国学习，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在哲学上说，这就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关系，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而外因只是条件。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探索前进的道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它不仅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贯穿在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就思想体系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列宁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而毛泽东哲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思想也就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例如科学性、实践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等等。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仅仅指出它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活生生的发展的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它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不同的，它所遇到的主要思想论敌是不同的，因而它所强调和发挥的侧重面也是不同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也就必然表现出相对不同的特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主要任务是创立科学的哲学以适应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这个哲学“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①]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突出强调的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用辩证法去丰富唯物主义，并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运用于历史，从而把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资产阶级哲学日益走向腐朽和没落，特别是在认识论领域，他们集中保护“下半截”的唯心主义，露骨地反对唯物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头面人物，也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攻击马克思“没有自己的认识论”，叫嚷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则鼓吹要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6页。

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强调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纷纷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极力用矛盾调和论和诡辩论为他们的叛卖行为作辩护，于是，列宁又集中研究了辩证法，特别是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从而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遇到的主要思想论敌又有了新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俄国已经取得实践上的伟大胜利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潮，几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损失。这样，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就不能不以扫清主观主义为主要目标，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主要任务。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来说，就不能不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宣布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不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列宁说：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

俄国”。[1]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一般原理的应用，在中国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因为旧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指导中国革命，不能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现成的革命经验，而只能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地、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具体道路。

实践证明，探索这样一条道路，是相当艰难的。它不但需要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正确哲学理论的指导。对于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果不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和论证，全党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统一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来。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纠正了这个错误之后，又走上另一个极端，犯了瞿秋白“左”倾错误，随后又犯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王明“左”倾错误，三次“左”倾又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根本原因是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因此，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的同时，十分重视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出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实践论》和《矛盾论》便是这种哲学论证的代表性著作。《实践论》作为一篇认识论著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03 页。

作，它不是如同一般哲学教科书那样把所有的认识论问题都拿来重复一遍，而是根据“结合”的需要，突出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科学原理，引导人们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取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检验人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矛盾论》作为一篇辩证法的著作，它也不是把辩证法的所有原理都拿来简单重复一遍，而是根据“结合”的需要，突出了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互相联结的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着重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因为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就不能从根本上了解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为什么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懂得把握矛盾特殊性的意义，也就不能自觉地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去开拓中国革命的特殊的新道路。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方法论上论证了实现“结合”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从哲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而且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作出了概括和总结，指明了实现“结合”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这些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而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某一原理的简单运用，而是为了实现“结合”的任务，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许多原理在方法论上所作的创造性发挥和运用。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原则，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原则，体现了注重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它还是认识论的原则，体现了在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要求。群众路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运用，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方法上的体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又体现了本国情况要靠本国人民去了解、本国革命的胜利要靠本国人民去争取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原理。总之，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概括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历史任务中在方法论上的伟大创造。它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天和今后的实践中，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舍此则不能实现“结合”的任务，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否认“结合”的主观主义作了深刻的哲学批判

哲学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党内突出地表现为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主观主义的批判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在中国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在哲学上面临的主要思想论敌，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在18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不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不可能创立。

此后，如果不批判蒲鲁东、拉萨尔、杜林等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批判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庸俗唯物主义、庸俗进化论和新康德主义，已经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不能站稳脚跟，不能为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开辟道路。在20世纪初，列宁若不批判俄国的主观社会学、马赫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就不能有力的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它所遇到的主要思想论敌有了不同以往的特点。"五四"运动前后，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经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尽管中国人民仍然需要在思想上继续开展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但是，从党内来说，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日益突出起来。能否正确开展这种斗争，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之所在。党内滋长起来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潮，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历史任务的主要思想障碍。这种主观主义思潮不是赤裸裸的、以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却表现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和倾向。例如：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指导中国革命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唯上、唯书。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们照搬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企图在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主张城市中心论；在军事战略战术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照搬外

国军事条令，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等等。总之，“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博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检讨）——这种“两个凡是”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路线。

这样，为了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就不能不同这种否认“结合”必要性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从《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等，毛泽东在哲学上批判的主要锋芒，都是指向主观主义的。主观主义，在中国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思想方法上的表现。他系统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实质、危害、根源，全面地阐述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从而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象毛泽东这样对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作如此系统、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如此明确和系统的论述，还是不曾有过的。

以上这些表现集中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的特殊中就包含着一般，因此一般地说，它也就是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哲学理论。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明了的他们学说的根本原则，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它所要求的并不是在口头上抽象地承认这一原则，例如这是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在口头上也承认的，而是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即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统一，这在中国的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者那里恰好相反，实际上

是两者的分离。从理论上包括方法上具体解决在实践中这一“结合”、“统一”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杰出的历史贡献。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后，适应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发展理论的历史需要而产生和形成的哲学理论。这里说的理论都是把方法包括在其中的。因此，特殊地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一般地说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说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不仅具有解决中国的这种问题的特殊意义，而且具有普遍适用的一般意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实践性、阶级性和党性一般特征，就得到了集中的具体的体现。而在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上，则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重要特征

与这一基本特征相联系，适应由这一特征派生出的要求，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具有其他重要特征。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系；它是具有民族形式的群众化的哲学等。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方法论在实践活动中、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和它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通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贯彻执行才能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而正确的贯彻执行，就需要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哲学不仅以理论的形式，通常从纯粹的理论形态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为广大干部和群众

所掌握，在实践中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发生广泛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成熟和多方面展开的标志和表现之一，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系列形成。这些方法在以下的编章中将有具体的论述。

通过民族化达到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因此，它在表现形式上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8年10月，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 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②所谓民族化，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精华，也改造运用它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并赋予它崭新的内容，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这是客观历史发展形成的。它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中华民族哲学发展中的伟大革命变革和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我们应当正确地阐明它，既要反对过分拔高，又要反对肆意贬低，而应当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的评价。因此，要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必须遵循继承和发展、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阐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的独特贡献以及它的国际上所引起的重大影响，阐明它的产生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阐明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列宁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已经历了 100 多年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它的内容。列宁在新的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时代主流，对革命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许多新东西，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备的科学的世界观，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自吹自封的结果，而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论断，是谁也否

①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50 页。

定不了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本人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哲学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优秀的杰出的哲学思想，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苑中绚丽多采的奇葩。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中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① 他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由于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所以，他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②这就指明了20世纪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亚洲革命风暴、人民革命斗争相结合，必然揭开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为马克思学说增添新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适应了这个历史潮流的发展，体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从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以后各章中我们将详加论述，这里举其要者如下：在唯物主义理论和认识论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提出著名的"实事求是"原则，阐明了人的自觉能动性，深刻发挥了"实践唯物主义"，并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辩证法方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

①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第440页。

结合的高度上，集中论述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新思想，阐发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在唯物历史观方面，丰富和具体化了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从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着重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辩证自然观方面，从辩证法的彻底性上，指出了物质内在的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在哲学解放方面，从哲学的历史使命上，指出要使哲学从课堂上和哲学家的手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等等。此外，在实际运用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军事辩证法、文艺和文艺工作的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辩证法、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独创性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体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鲜艳夺目的花朵。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的最主要的贡献，是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问题相联系，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动力的理论向前作了重大的推进。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这里列举一些不完全的材料加以说明。

1950 年 12 月 18 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在题为《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

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还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①

1951 年，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第 74 期（中文版）上发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文中说：这篇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重要的资产”。

1952 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9、10 期上，刊登了维·米海耶夫的介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的文章，对《矛盾论》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矛盾论》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性。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的研究”。②

1954 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26 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

① 《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30 日。
② 同上。1953 年 7 月 17 日。

泽东的生平和主要的理论著作，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宝库的丰富，对于一切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际的益处。"

1955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①

195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教科书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② 并在书中多处引用了《矛盾论》、《实践论》的重要论述。

在日本，有许多学者对《实践论》、《矛盾论》作了很多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松村一人。1952年，他在《思想》杂志上接连发表了《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以〈矛盾论〉为中心》三篇文章，来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他指出：毛泽东的"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他认为，毛泽东哲学"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且有中国民族形式，而且具有国际的意义"。今天看来，他的某些用语不一定十分贴切，但在当时他就能发表这种见解确是十分可贵的。

---

①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中文版）第66页。

② 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文版）第297页。

在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在他50年代出版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一书的日文版序言中说："由于中国革命及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增写了伟大的新的篇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说：《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完备的探讨"。①

1961年，南斯拉夫的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他在书中介绍了《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在《实践论》、《矛盾论》里，"卓越的辩证法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他还说："毛泽东当时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所谓教条主义者。他们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学说的出品，并且由于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由于他的这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专著，所以，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写入马克思主义史的学者。

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理论家都纷纷撰文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指导作用。有的说《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他们党的教科书，是党内思想建设的基本教材，是"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是"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1966年6月，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机关报《先锋报》发表文章说："每一个共产党人联系生活和实践，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巨大发展"。②

① 康福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中文版）第115页。
② 《光明日报》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在第三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毛泽东“丰富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评论分析人类历史、政治和社会大事的可靠准则”。有的说，他们事业的成功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的教导；有的说，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他们国家制定了革命纲领；有的发表文章说：“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研究毛泽东的热潮。他们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会、讲习会和研究会，定期组织学习和研究活动。日本和欧美的一些研究机关不惜重金搜集和出版毛泽东的著作。70 年代初，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 10 卷本的《毛泽东集》(1917—1949)，1983 年又出版了 5 卷《毛泽东补卷》和 1 卷著作年表。1974 年，美国的施拉姆编辑出版了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文集。1979 年，西德编辑出版了解放以后的毛泽东著作（7 卷本），在日本出版了竹内实主编的 20 卷《毛泽东集》。美国在著名的学者施拉姆主持下，正在翻译出版 10 卷到 12 卷的《毛泽东革命文集》。在 60、70 年代，日本、欧美出版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从 50 年以来海外出版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英文著作近 200 种。这说明，尽管人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目的不同，但它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欧美的学者中引起了重大的反响。1964 年，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中国季刊》第 19 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他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

识论都作出了贡献。他说："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而他关于矛盾的差别性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特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的辩证法来说都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的"。还说：《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这篇导言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实质"。

继 60 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中，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肆意歪曲、贬低和攻击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毛泽东逝世不久，国际上刮起了一股"非毛"风。由于"非毛"不得人心，这股风刮了一阵子后也就渐渐平息下来了。国际上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注意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苏说："不管你个人对毛泽东有什么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确实，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因而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还说："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的是对中国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所了解"。1984 年，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说："今天，虽然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已不如 60 年代那么巨大，但并没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退"。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美国《新闻周刊》在《最后一位巨人》一文中说：毛泽东的一生，"使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评价对他比对当前任何其他世界领袖更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国外学者

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通过在它指导下的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美国基辛格博士就曾说过：“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实践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大有希望。对比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剧变，在探索中国取得的这种重大成就的原因时，愈来愈多的人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作用，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的光辉历史地位。

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哲学理论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变革和划时代的发展阶段，从此走上新的历史发展道路。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此，对待它们必须坚持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兼收并蓄，而是要研究它、扬弃它和发展它。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中的

伟大革命。例如：

关于认识论方面。前面已经说过，知行关系问题曾是中国哲学中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古代到现代，许多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后提出过：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行难知易，知重行轻、行重知轻，等等。但是，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出科学的回答。1937 年 7 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哲学时，写作了《实践论》，全面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1950 年 12 月，《实践论》重新发表时，毛泽东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当时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称赞《实践论》的文章，其中冯友兰的《〈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因为，这篇文章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认为《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1964 年 8 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指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贽）、王船山（夫之）、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孙中山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主张在行中求知，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最后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

《实践论》正是对中国 2000 多年来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批判总结和革命改造，使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融为一体，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唯心

论、机械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 这就赋予了古老的知行学说以新的生命。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在还精辟地阐明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历史发展表明，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是中国哲学知行学说发展的科学形态和高级阶段。

关于辩证法方面。前面也说过，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存在着以《老子》和《周易》为代表的两大朴素辩证法思想系统。在《老子》中，承认对立面相互依存的普遍性，强调对立面中柔弱方面的决定作用，提出一套以贵柔为特征的消极辩证法思想。而《周易》中，则提出阴阳八卦学说，认为万物均有两极，天地间均为阴阳八卦支配，强调对立面中刚强方面的决定作用，倡导自强不息为特点的积极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后来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总地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中，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承认客观事物是互相对立和互相转化的，但其中也存在着形而上学因素；同时，又由于没有把方法论和宇宙观紧密联系起来，致使不少辩证法思想未能摆脱唯心主义体系的桎梏。毛泽东指出，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由于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第296—297页。

条件性。他强调说，仅仅承认事物矛盾对立普遍性和互相转化的必然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指出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如果否定条件，就会导致相对主义，以致陷入自然命定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系统地阐明了事物的矛盾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创立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论证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的学术思想作了批判性分析。例如：

关于对孔子的哲学属性，毛泽东作了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他在评论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时说：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接着，他又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①] 这就是说，在孔子的观念论体系中，包含有一些片面的真理性，这就要求具体分析。在谈到孔子的“正名”主张时，毛泽东指出，孔子的“正名”和我们主张“正名”有原则的区别：“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同时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页。

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① 他还指出，孔子在认识论和社会论上基本是形而上学的，但还有它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关于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他还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和道德范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地位。②

关于孔墨的中庸思想，毛泽东也作了分析，阐述了孔墨关于中庸思想的异同。毛泽东认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而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而“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认为，这个思想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③毛泽东在赋予“中庸”以新的解释基础上，进一步对孔墨“中庸”观念的异同作了具体的比较。在此不再赘述。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单纯传播不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的科学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它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标志着中国哲学从传统哲学向新

---

①②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45 页，第 147、148 页，第 147 页。

哲学的飞跃，它不仅体现了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的统一。因此，无论就其思想层次上，还是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传统哲学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它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否定。其主要区别大致如下：

其一，两者的宇宙观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是唯心观念论、机械唯物论或二元论，基本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宇宙观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

其二，两者的社会作用不同。在中国近现代，作为封建社会产物的传统哲学已经衰微，其性质基本上是保守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武器。

其三，两者的历史地位不同。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存在着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含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无产阶级的三种哲学思想的激烈斗争，其中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始终构成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线，而且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自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以后，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志着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因此，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什么“儒家哲学”、“孔孟哲学”等等，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因而是不正确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其优秀的哲学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既深且广。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种哲学理论像毛泽东哲学思想那

样，对劳动人民的觉醒，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发挥过如此远大的作用。所以能够如此，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

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哲学思想武器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从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其指引下，中国民主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坚持并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又进而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大成就。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有了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发展的强大哲学思想武器。

科学地确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指明它的伟大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中国建设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①邓小平也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② 事实表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也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正确路线、方针和战略的决策，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并夺取了一个个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正确理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0—51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8—159页。

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正确运用和发展。因此，它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灵魂，是联系各个组成部分的纽带，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运用和展开。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即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理论的坚实哲学基础。我们要永远坚持，不断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的结晶，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思想武器。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才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了三条道路问题。一是确立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特点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二是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特点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实行逐步过渡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三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把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贯穿于这三条道路中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坚持并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思想保证。

第二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在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和它们在多方面的展开，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

第一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发挥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和解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任务，不能不着重研究以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关系为基本问题的认识理论，解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有关重大理论问题，不能不重视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宣传，强调要对广大干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路线，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做好各项工作。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在同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在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吸收人类认识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最善于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无论是总结历史经验、同各种错误观点和倾向作斗争，还是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领导方法、工作作风，他总是十分重视把问题提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着重从思想路线上来加以解决。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认识论专著，以及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讲话，都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践以及党内两条思

想路线的斗争，系统地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特色：（1）以实事求是为认识论思想的核心，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了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2）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发展过程、目的、真理标准的理论，特别是完善和系统化了包括对具体过程的认识，到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永无止境的发展，到人类认识总过程的认识过程理论，既充分论证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又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3）在实际斗争中，阐明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揭示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和特征，并把认识论原理化为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具体地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列宁关于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工人阶级的光辉思想，围绕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历史的统一的理论论证这一中心，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为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它通过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挥着极为广泛的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为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包括自然观、社会历史观、认识论和逻辑学在内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实践性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把自己称作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且第一次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进认识论并作为它的基础，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及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从而实现了社会历史观和人类认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变革。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思想，特别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着重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者迷信书本知识、轻视革命实践的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系统地阐明和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全面地辩证地阐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

一、科学地揭示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什么是实践？或者说实践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在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家中，有的把实践说成是独立于主体或人脑之外的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有的看作是脱离现实的纯粹个人修身养性；有的则把实践仅仅归结为日常生活中饮食男女一类生物本能的活动，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这些观点，并从不同侧面对实践概念做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

活动”，实践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 这就是说，必须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但是人的活动又有其“主观方面”、“能动的方面”。离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不可能改变周围客观环境，人类社会也就不能存在和发展。恩格斯出于同样的思想，把实践概括为“人类的行为”，指出实践是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②]列宁也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又说：认识向客体的辩证运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③] 在这里，列宁把实践看作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连接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中介、纽带或桥梁。

毛泽东继承、发挥了马、恩、列的上述观点，并用中国哲学的传统表述方法，对实践的含义作了新的明确的概括。他指出：实践即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实践既不是停留在主观范围内的纯观念性活动，也不是一般动物的那种消极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而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他在《实践论》和其他有关著述中，常常用“客观的实践”、“变革现实的实践”、“改造世界的实践”、“社会的实践”、“群众的实践”、“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等词语来表述实践概念的实质和基本特征。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但全面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概念的本质规定，而且基于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7页，第3卷第386、55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301页。

下对实践含义的深刻理解，突出地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和群众性。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完整的概括。首先，他强调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同时，他也非常重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在他的有关著述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常常并列在一起，合称为“三项实践”或“三项革命运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早在30年代所写的《实践论》中就把科学实验作为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过程和形式提出来，这同当时中国和苏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的有关论述相比较，确有其独到之处。后来，他又就科学实验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强调这种形式的实践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对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日益表明，科学实验的实践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示了未来人类实践发展的重要特点。正因为这样，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称赞说：毛主席把科学实验看作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意义是很深远的，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了未来。他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实践”和“实验”》一文中也曾指出：把“科学实验”列入“实践”之中，并把它和生产、阶级斗争并列起来，称做“三大革命运动”，这是毛泽东的独创。其意义在于：把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认识方法放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把科学家的活动放在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提高到与变革现实同等的地位上来。

毛泽东着重强调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主要的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他并没有把它们或其中某一项实践如阶级斗争归结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在他看来，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很丰富的，活动的范围和形式是很广泛的、多种多样、多层次的。正如他在《实践论》中指出的，“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

应当指出，关于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关于社会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各自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本世纪3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哲学家们，都曾分别地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述过。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恩格斯说过，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列宁认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继承吸收了这些重要思想和有关理论成果，并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基础上，作了系统的完整的概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在其内涵的揭示和外延的扩展都更加明确、丰富和具体。

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曾经彻底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者的直观唯物主义，揭示了“感性直观”的局限性，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认识论；也针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侧重阐明实践作为检验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的真理性标准的作用。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 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列宁遵循马、恩的思想也多次强调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②] 指出"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③] 等等；这些观点显然都是非常正确和精辟的。在3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著中，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曾有过一些阐释和发挥。毛泽东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批判地吸收了30年代苏联和中国哲学家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动力、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突出了并发挥了列宁的论点，即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毛泽东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直接经验对于人们获得真知的意义，着重强调了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个基本观点。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在《实践论》中写道："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4页。

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① 毛泽东的这些话，正确地揭示了客观外界、实践和人的认识（首先是感觉经验）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只有在实践中，人的感官同客观外界事物接触，使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客观外界事物才能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先是反映事物的现象，获得感觉经验，而后才能有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诚然，就认识的对象和内容来说，没有客观外界事物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人的感觉和认识。正因为这样，列宁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出发，曾指出客观实在是感觉的源泉，而感觉又是我们知识、认识的源泉。毛泽东也说过，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但是，客观外界事物怎样才能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成为人的感觉和认识呢？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通过人的实践。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和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强调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② 在认识的源泉问题上，毛泽东和列宁的提法，只是角度和着重点有所不同，而不是互相矛盾和对立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286、287、290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9 页。

毛泽东还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上论述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人又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既包括直接经验又包括间接经验这两个部分。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因此，毛泽东虽然很重视亲身参加实践，获得直接经验，但并未否认学习和接受间接经验、书本知识的必要性。问题在于要善于学习，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知识的源和流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经强调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又说："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① 并指出：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得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与此同时，他还教导人们在学习军事理论和别人的经验时，要以自己的实践作基础，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善于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应当指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虽然是说学习战争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就其精神实质，或者作为一种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来说，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里还应当指出，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前几年一些人曾把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诬蔑为所谓“狭隘经验论”者，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说，轻视和否认理论是狭隘经验论的重要特征，那末，《实践论》等著作的写作这件事本身和毛泽东的上面这些论述，以及他自己发愤读书，认真研究哲学，并大力提倡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量历史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是一贯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知识的，是反对狭隘经验论的。

在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的问题上，毛泽东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指出由于客观物质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人类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活动也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包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力量。这就是说，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总是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问题，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以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同时社会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地积累新的资料和经验，创造新的技术工具，从而给人们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可能。总之，人类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眼界的扩大，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等等，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依靠实践来推动。这是人类文明史所充分证明了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的思想虽没有展开详尽的论述，但却明显地贯穿和体现在他对整个认识发展过程的概括之中。在《实践论》之后，他对这个问题作过一些新的发挥和说明。他指出，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制造出的用以改造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使人们的认识逐渐深入和不断提高，对推动认识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毛

泽东的这个见解是有根据的。现代科学技术方面许多新的发明创造，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应用等表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确实是大大加强了，这就进一步揭示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科学性和直观的反映论的缺陷，以及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错误。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如前面所引述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不少精辟的论断。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着重阐明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 又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② 此外，他还指出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对于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来说尤其是这样，往往不是一次实践就能得到证实，而是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的多次反复。由上所述可见，毛泽东既强调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同时又说明了实践检验认识的复杂性、辩证性和过程性，从而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重要思想，把实践标准问题的论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实践是认识的目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很多。早在1845年马克思就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为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6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产阶级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为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它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反过来为革命实践服务,指导实践。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并作了深刻的阐发。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② 他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③ 此外,他在《实践论》中还具体阐释了改造世界的含义,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进而揭示了改造世界与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丰富和深化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本质。

三、深刻论述了天才和实践、天才和群众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时会谈到某人是天才,但究竟什么是天才,天才是怎样形成的,在理解上却不一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往往是和天才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就曾在天才问题上大做文章,极力鼓吹个人崇拜,妄图实现其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因此,如何正确解释天才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曾用过“天才”一词，并从不同角度上论述过天才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第一次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哲学认识论问题提出来并从理论上加以科学阐释的是毛泽东。

在他看来，所谓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比较地有知识、有才能。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反映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知识和才能，归根到底都来自社会实践。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更谈不上什么天才。大量事实表明，任何天才，包括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们之所以聪明才智过人，绝不是什么上帝赋予的或“爹妈给的”所谓生来俱有，而是在后天实践中经过自己不断勤奋努力才形成的。列宁在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时曾这样写道：“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也和列宁一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任何人包括天才人物的知识与才能，都是后天实践的产物，但不否认人脑作为认识的生理基础的作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这里的问题是，人脑在生理上的差别究竟有多大？为什么人们的知识、才能往往有很大的差别？科学证明，就正常的人来说大脑的生理差别是很微小的，脑量悬殊只是个别情形。因此，天才和一般人在知识、才能上所以有很大差别，不可能从人脑在生理上的微小差别得到解释，而只能归因于人们社会实践条件不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不同。1958年，毛泽东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 这说明：人的知识才能的获得，固然要有人脑和各种感受器官作生理基础，没有人脑这个"加工厂"不行，但是决不能由此而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人脑固有的东西，这样就陷入了唯心论的先验论。

毛泽东在论述天才问题时，不仅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而且也坚持和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他历来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天才人物，包括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都是在群众斗争中，在各种群众实践活动中产生和造就出来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毛泽东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时明确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虽然是就无产阶级的天才人物

①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选》第377—3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来说的，但其道理是深刻的，有普遍意义的。

毛泽东关于天才和实践、天才和群众关系的论述，具体贯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有机统一，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天才的本质，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天才观。

第二节　系统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同时又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统一的，人类的认识同客观世界一样，都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过程。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例如在《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辩证法》中，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论述过这一思想，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这方面也曾有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他在研究黑格尔的哲学时，明确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科学论断；他针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不懂得辩证法、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的根本缺陷，强调指出，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应当辩证地思考；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等等。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思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基础上，对认识发展的过程、阶段、规律性等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完整的概括，系统化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其

主要的论述和贡献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认识运动的过程、阶段和“两个飞跃”、“两变”的思想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深化和发展了对一定发展阶段上一定客观过程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毛泽东在1936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对战争和战争规律的辩证认识运动明确地区分为制定军事计划和实行军事计划这样两个过程。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接着又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 这里所概括的认识过程虽然是就战争这个具体领域而言，尚未形成为一般的哲学理论形态，但其思想逻辑却是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分深刻、严谨、透彻的。它为毛泽东后来从认识论高度系统地阐发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思想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起了先导的作用。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以相当大的篇幅从宏观上深刻地阐述和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及其规律性。他明确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这是认识过程的两个能动的飞跃。感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则是对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前者属于感觉和印象的阶段，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或低级阶段；后者属于概念、判断、推理的阶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或高级阶段。从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来考察，从科学抽象上来说，这两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性质，是既不能混淆，也不能任意颠倒的。但二者又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人的实际认识活动中，感性认识和理论认识作为人的认识的两种形式，总是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表现为纯粹的感性形态或理性形态。对这一点，原苏联著名哲学家巴·瓦·科普宁在其所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中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任何知识就其形成来说，都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或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的统一。这些也是为前人所承认的。《实践论》对此虽未展开具体的阐述，但不能由此认为它否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种认识形式之间有相互渗透这一面。《实践论》从总体上把认识过程区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认为它们在性质上和认识发展水平上是有质的区别的，不仅认识形式上而且在认识发展的水平、程度上作了这种阶段性的区别；同时又阐明两个阶段又是紧密相联的，

统一于在实践基础上的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之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地着重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人们只有通过实践，首先获得丰富而可靠的感性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才能产生出理性认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而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认识是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阶段。总之，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具体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从以上所述，可见毛泽东把认识过程区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是必要的，是符合人们认识的实际的；他对于认识的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也是非常明确而深刻的。科普宁等人只承认感性和理性是认识的两种形式，而反对用以说明认识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批评后者是什么没有根据的"臆想"，是"对认识的这两个环节的形而上学的割裂"。① 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发生过影响，但它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是站不住脚的，武断的。他们也不懂得毛泽东在总结实际斗争经验上这种论述的深刻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意义。毛泽东阐明，哲学史上的唯物论的"唯理论"和"经验

---

① 参见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第 202—209 页。求是出版社 1982 年版。

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都在于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片面地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各执一端，因而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经验，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们闭目塞听，从不虚心体察实际情况，反而把亲身参加革命实践而有丰富直接经验的同志诬为“狭隘的经验论”者。经验主义者则囿于自己局部的、片面的经验，不了解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两种人都是主观主义者，都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指导中国革命。

《实践论》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了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了实现这个飞跃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要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二要经过思考作用，将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整理和改造制作。这两个条件是相互联系的，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可能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再次提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十六字诀的抽象思维方法，言简意赅，不但在表述形式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而且其内容实质包含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思维范畴和科学抽象的一系列复杂过程。毛泽东虽未就此展开详细的解释，也没有专门对科学思维方法的所有方面，它的多层次性及其综合运用等问题作系统的论述，但这十六字诀作为最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无疑是科学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

贡献，它在总体上给人们指出了如何进行科学的思考和分析。人类认识史表明，一切真正的科学抽象都离不开这十六字诀。当然，随着人们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发展，我们应当努力概括和吸收现代科学思维的许多新方法，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十六字诀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思维方法，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但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认识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同时也因为理性认识、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能否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中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而必须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证实理论或者纠正它的不完全性和错误，向前发展理论。由此可见，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它既有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体的意义和作用，即马克思所说的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对主观世界、对主体又有检验认识、发展认识的作用。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泽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至于理性认识怎样回到革命实践，要经过哪些必要的中间环节才能实现这个能动的飞跃，《实践论》未做专门详细的说明，其重点是放在阐述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的必要性上。这是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特别是列宁对这个问题虽很重视，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原则，但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着重地系统地加以说明和发挥。3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和教科书在讲到认识发展过程时，更多地是着重于阐述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对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及其意义却未予重视，缺乏必要的论述；有的甚至错误地把到达理性认识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完结或认识的终极目的。毛泽东注意到了有关著述中的这个缺陷。例如，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认为，认识过程包括由物质到感觉和由感觉到思维的发展过程，分析这个过程，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毛泽东在读这本著作时加了一个批注："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① 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述中，既肯定了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又反复强调了理性认识必须回到革命实践。这样，就不仅把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运动的全过程，完整地概括为"两个飞跃"；而且深刻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和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本质。特别是关于认识过程第二个能动飞跃的论述，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266页。

强调“由思维到物质的辩证法”的伟大意义和作用，更是一个突出的贡献，是对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李达等人对这个问题论述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当然，这个论述更主要的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毫无疑问是非常宝贵而重要的；但如果只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或者简单地背诵它的某些条文、词句，生搬硬套，而不和中国的实际、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不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运用，那末，马列主义理论再好再正确，也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特别重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飞跃，一贯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以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等，不是偶然的。这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同教条主义作斗争而得出的重要理论结论。

继《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思想，又多次进行了发挥，并作了新的概括，使其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方面不断地丰富、发展。他在1963年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联系当时我国哲学界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把认识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两个大的阶段，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即“两变”的命题。其实质就是在肯定物质是世界的本源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下，着重阐明物质和精神在实践基础上相互转化的思想。这

就是说，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可以转化为人的主观认识的内容；人们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之后又可以能动地去改造客观世界，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实在的物质的东西。而这种相互转化都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并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实践在“两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命题既反映了认识论的唯物论思想，又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并且进一步突出了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关于认识过程的科学命题。它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和精神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思想、同《实践论》中关于认识过程两个能动飞跃的论述，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又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列宁也明确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路线；“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③]这些话，显然已包含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真谛。毛泽东的“两变”命题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上述论断和《实践论》的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概括。其特点在于把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原理和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过程的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用简明、通俗而准确的语言，高度概括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革命本质。否认“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就要走向二元论。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第1卷第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毛泽东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但“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① 特别是精神变物质这个提法有人觉得更不可理解，甚至被看作是唯心主义的怪想。精神难道可以变成石头吗？对此，毛泽东回答说：譬如大理石，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用来建筑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搬来的，而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通过实践理解了大理石的结构和性状，依靠一定的物质手段，人就可以造石头，精神就可以变成石头。恩格斯也曾举过类似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他指出，既然我们能够按照一定的条件创造出某种自然物，并使它们为我们的目的服务，那末，“自在之物”就变成了“为我之物”。当然，“精神变物质”并不是说可以从虚无中、从人的主观幻想中随意变出物质的东西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说人们可以依据对客观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改变客观物质存在的状态，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精神变物质”是以承认物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和物质可以变成精神为前提的，决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把“精神变物质”混同于林彪、四人帮在“文革”期间鼓吹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我们应当把“两变”作为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命题来理解和把握。这样，就既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另外，有的人把1957年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口号，用来嘲笑和否定“两变”的命题，特别是“精神变物质”的提法。这是不妥当的，不能成立的。实践中一度出现过的某些“左”的口号和做法，是同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的主观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两变”命题本身的过错。恰恰相反，它是不懂得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一科学原理的结果。

二、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

前面说过，认识的发展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即两个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时如果能够实现人们预想的目的，那末，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过程的认识运动来说算是完成了。但这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达到。对于复杂的事物或过程的认识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① 这里包含的一些重要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有过表述。那里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的是军事计划在实行过程中需要部分改变以至全部改变，以适合新情况的认识过程。从各个特殊上升为一般，《实践论》的这段话，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认识经验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论总结，它说明了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前进性，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难免产生错误和失败，而错误和失败常常是正确和成功的先导；只有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经过错误和正确、失败和成功的多次比较，才能更充分地深刻地认识客观规律。

《实践论》的这些理论论述，坚持了辩证法，反对了真理认识的"一次完成论"的形而上学。它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有从事变革现实的人，才能从切身经验中，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过程论的重要贡献，是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发展。

继《实践论》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上述这个认识论的辩证法思想又多次进行了论述和发挥。他反复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例外。他指出，事物或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就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理解它。又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①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十分重视失败的教训对于人们获得正确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认识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要真正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取得主动权，只有胜利而没有失败，或者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而没有反面的经验，是不行的。他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在谈到犯错误的问题时，他认为，有一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那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1963年5月，他把上述这些思想进一步加以概括，明确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① 这个论断是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曲折发展过程的哲学总结，是对《实践论》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对党的实际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不断地总结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而后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才能使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个认识规律，对任何人包括天才人物和革命领袖都不例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没有充分的经验，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也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要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它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逐步取得自由。1962 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我们都知道，从 50 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和党中央就以当时的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重要思想原则，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发生过一些严重的失误和挫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彻底纠正了这些失误，正确地总结、吸收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这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复杂的过程，今后也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继续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刻、丰富和完善。总之，无论是我国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都充分证实了毛泽东关于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及其重要现实意义。

三、认识的总过程、总规律

如前所述，人们的认识经过两个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在实践中得到了预想的结果，这时，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发

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曾说过："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①] 又说："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②]毛泽东也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又全面地阐明改造世界的任务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这些任务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③]这里，再一次体现了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从而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严格地区分开来。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用十分简洁明晰的语言，科学地概括和阐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他在《实践论》最后所作的结论中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④]中国哲学界把这概括为认识发展的总过程、总规律。

---

①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08 页，第 239 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4、296 页，第 296—297 页。

上面这段话，包含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内容。首先，它揭示了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人类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认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出发又复归于实践，能动地指导实践，实践和认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次，它完整地表述了认识过程两个能动的飞跃，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再次，它说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正如列宁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的螺旋式上升或曲折前进的过程，形式上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内容上则不断地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总之，它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深刻揭示了认识全过程（包括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过程和人类的认识的总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飞跃）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表现，从而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它的科学性和普遍意义已为人类认识发展史和个体的认识发展史所证实。遵循毛泽东所揭示的认识发展过程和辩证规律，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四、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和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性

在前面说的认识发展的总过程中，已经包括了在人类实践发展基础上，从相对真理无限逼近绝对真理的真理发展历史过程。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论述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在真理问题上另

一个重要贡献。这就是它揭示的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和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性。它说明认识论的辩证法不仅表现为实践同认识的对立统一，在实践基础上认识的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且表现为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的发展过程，前者是通过后者实现的。

真理问题历来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真理、真理的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及人们认识真理的途径等有过许多论述。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从真理和谬误的关系上进一步阐明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性。他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① 这个论断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本质，深刻体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思想。

所谓真理就是意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谬误则是错误的反映。在毛泽东看来，真理和谬误，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切现象或事物一样，也是对立的统一。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这就是说，真善美同假恶丑，香花和毒草，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5页。

是相比较而同时存在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善美的东西才能战胜假恶丑的东西，香花才能战胜毒草。因此，如果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当然，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相反，要让人们去接触、了解和研究错误的东西，并同它作斗争，才能有效地克服和战胜错误的东西。这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了免疫力。那种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的东西，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反动思潮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日益显示出其真理的光辉和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思想阵地。

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真理与谬误的斗争、真理战胜谬误，也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① 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都不少见。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就受到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虽然不同了，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科学的指导思想，但是也还有一些人不赞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84 页。

成，有的人甚至对它进行恶毒的攻击，妄图削弱和取消它的指导地位和作用。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巩固自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近几年来，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事实和教训，也从反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指导地位不是绝对保险、不可动摇的。如果不在实践中，不在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常保持其活力，那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还会有丧失的危险。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鉴别不清而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先进的经验和正确的思想，也是常有的现象。不过，社会主义社会同旧社会相比，毕竟有许多优越的条件，有利于新生事物的成长，有利于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总之，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认过去、现在和将来，真理都必须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才能发展，而真理同谬误的斗争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人们判断正确和错误也常常需要考验的时间。但是，真理终归会战胜谬误而为人们所承认。

毛泽东对真理发展规律所作的这一科学概括，不仅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观和认识过程的理论，而且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首先，它要求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永远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既要勇于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毛泽东根据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原理而提出的对待认识上的是非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立场。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

合于人民利益的。"[1]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不犯错误的人在世间上是没有的，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及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从谬误的方面转向真理的方面。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必须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和正确立场。其次，它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而制定的一项基本性和长期性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 他还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它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党的方针就是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784页。

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言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要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要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阐释，是同他关于真理发展规律的论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真理发展规律的。因此，深刻地领会毛泽东关于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和真理发展规律的论述，必然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觉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

五、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是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一切实际工作的根本问题。在实际活动中，无论何人，事实上都在这样或那样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和处理这个问题而不能避开它。《实践论》和整个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可以说都是以这个根本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归根到底都是为着说明和解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如何才能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地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之后，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论结论。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 这一结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东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提出的极其重要的新的理论命题。

在这里，毛泽东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同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

也就说，要在有机的统一中来把握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之间的关系。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是认识过程中最基本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使主观同客观相符合，达到它们之间的统一，否则行动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深刻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不仅指导战争，指导一切实际工作，指导革命和建设，都要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才能实现预期的目的。

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要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主观不是直接而是通过实践和客观发生联系，发生作用，而实践又要受理论的指导。理论如果和实践脱节，也就不能发挥它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应有的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也是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

到主观和客观统一的基本的关键的环节。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在理论上作了科学的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不在于是否抽象地承认这个原则，而在于是否在行动中坚持并具体贯彻这个原则。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为此就还要进一步地具体地解决一系列哲学理论问题。

中国党内的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是“有的放矢”，不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而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当作裁剪一切的教条，正象毛泽东说的，他们天天口念“理论和实际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他们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即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原则。他们的主观指导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相分裂，就不能不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在行动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时，要解决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统一的理论问题，做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达到革命的主观指导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相符合。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认识论命题和原则，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以此作为《实践论》的理论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的突出的重大贡献。

由此，他又深刻地具体地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和特征，指明，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 这为我们判明并反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并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取得胜利；而什么时候偏离或违背了这一原则，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就遭到挫折、失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直接的认识理论依据。

而要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这在后面还要作进一步的论述。

毛泽东哲学思想阐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为了发扬根据和符合实际的自觉能动性，能动地改造世界。

第三节　强调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

如何理解和发挥人的能动性问题，是哲学因而也是认识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不懂得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辩证法，因而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世界消极、直观的反映，不理解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不理解人的能动性；唯心主义者则离开物质前提抽象地夸大了精神、意识的能动作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把客观世界看作是所谓“绝对精神”或人的主观意识的创造物。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

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它把社会实践、主要是物质生产的实践看作是人类社会生活和认识的基础，充分肯定了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从而全面、正确地说明和解决了人的能动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本区别开来。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作过许多重要的论述。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能动性思想。在他看来，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①]而面对强大的敌人、斗争空前艰苦和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特点，又迫切需要论证和解决发挥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能动性的问题。因此，他着重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科学地规定和阐明了自觉能动性的含义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自觉能动性等问题。这是毛泽东认识论以至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中非常精粹和富有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因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和方法，反对主观主义，才能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固有的规律，从而根据这种规律通过实践去能动地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就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二者的统一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才完整地表现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的特点。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就要正确把握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把握这一体系中各方面内容的有机统一，而不能陷入片面的理解。外国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理论也是非常重视和肯定的。例如，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思想——关于自觉的能动性》一文中认为，“自觉能动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并具体地考察、研究了这一思想理论的构成和历史发展。这是不无一定道理的。毛泽东的主要论述和贡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觉能动性的科学内涵和表现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主体的能动性，从各方面作过科学的精辟的论述，毛泽东不仅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发挥，而且着重论述了如何自觉地发挥人本来就具有的这种能动性，他名之为“自觉能动性”，看来与此不无一定关系。毛泽东指出：“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①] 在生死存亡立见分晓的战争行动中，强烈地要求人们自觉发挥这种能动性。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 这就告诉我们，自觉的能动性在其内部构成上，总的可分为思想和行动即意识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能动性。人不但有思想，而且总是根据一定的思想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这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即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作为和自然界、客体相对立的主体存在的。人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具有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能力。人不仅能适应自然，而且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地创造和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在自然界打下自己意志的印记。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2] 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的能动性的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当然，能动性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人的能动性表现为意识的功能和作用。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它依次表现为：反映外界的认识功能；预见的功能；确定目的、纲领、战略和任务的功能；制定行动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策略和方法的功能；通过意志、信念和情感等对行动指导和控制的功能；规范和调整人们的关系和行动的功能，等。这些功能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指导实践能动地作用于客观世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阐明了的。

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在不同场合分别论述过自觉能动性的各种表现，而且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革命战争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作了深刻的发挥。《实践论》等有关认识论的著作，丰富和发展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前面已经作过论述。这里再举出若干其他方面的论述，作为例证。

（一）关于预见性

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科学地预见事物的发展进程和总趋势，进而根据科学预见提出某种设想、计划、方案，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这种预见性本领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突出表现，是人之所以区别和高明于一般动物之处。正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建筑房屋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 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预见性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作用，经常教导人们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有备无患"，"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每个革命发展重大关头，他都要求认清事情的实质，把握规律，以展望和预见未来。例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② 由此预见到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高潮，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会要到来。又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他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① 由此预见到蒋介石集团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必然性和大规模内战爆发的危险性，使全党有了必要的思想准备。《论持久战》根据对中日双方矛盾着的特点消长的分析，提出了用持久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为分析和预见事物的一个完整过程，提供了光辉范例。这些不仅告诉了我们发扬自觉能动性预见未来的重要性，而且告诉了我们预见的方法。

（二）关于目的性

这也是人类特有的能动性的一种表现。主体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有了明确的目的性，而后才可能规定实现这一目的计划、方案、措施和步骤，并且努力去贯彻实施。对于战争实践活动说来也是如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专门讲了战争的目的性问题。他指出：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其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他还认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② 因而，战争的各级指挥员指导战争，发挥自己的能动性，都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的目的。可见，目的性作为主体能动性的具体表现，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3—11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3页。

人类的战争活动和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中都是十分明显的。这里论述的特点是，要求自觉地把一切战略、战术、技术原则和行动，把一切手段都服从于和服务于根本目的和目的的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各方面工作都应该自觉遵守这一原则。

（三）关于主动性

这是人的能动性的直接体现。主动性是相对于被动性而言的。在《论持久战》中，指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在军事行动中，总要争得己方的主动权，逼敌方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人有能动性，但这不等于就是有了行动的主动权，摆脱了被动状态。在这里双方要发挥自觉能动性，来互争主动权，互争优势。是否能争得主动权，这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的优劣，还取决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在一定条件下，由于自觉能动性的正确的充分的发挥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反之，也会由主动变被动，由优势变劣势。毛泽东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①] 这个道理无疑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实际工作。毛泽东在1960年6月所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认识论高度强调地提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争取主动性，获得主动权，实质上就是要发扬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四）关于坚持性

这是讲人的信念、意志和毅力的能动作用。要做好一件事，尤其是某些非常艰巨、复杂、需要时间很长、费力极大的系统工程，没有坚强意志力，没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毅力是难以办到的。这种坚持性，或者说意志的能动作用，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键时刻，更是非常重要和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在谈到战争的经验时曾经指出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① 为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他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②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他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又教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所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革命者的意志力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对于最后完成革命事业所起的不可低估的能动作用。毛泽东说过，人总要有点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个东方大国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条件下，就更要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不断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用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12 页，第 476、478 页。

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各种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和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同志不仅对自觉能动性的概念做了科学的规定，而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充分论述了自觉能动性、人的力量、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特别强调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的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并指出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实现具有决定的作用。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在《论持久战》中他进一步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又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虽然讲的是战争问题，但它科学地阐明了客观条件和自觉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适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各种领域。

自觉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关系，就其实质来说，也就是主观和客观、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的关系，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的，要受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条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和限制。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只能在他们所面临的客观物质条件下进行，这些客观物质条件既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也规定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和可能达到的限度。没有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或者企图超越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去计划自己的行动，那么，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人们在客观物质条件面前又绝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自觉的活动和努力，在正确认识和利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不但可以改变一些条件，如变困难条件为顺利条件，变较差条件为较好条件，变无用条件为有用条件，而且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创造出一些新的条件。所谓利用规律，就是人们通过自觉地改变现有的某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4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条件或创造新的条件，使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符合自身的利益和愿望，把对自己有利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这种自觉的能动作用，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特别是战争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939 年，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时所写的有关批注中，又进一步地强调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他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这个错误观点，旁批道：“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① 这也是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关于抗日战争前途的悲观论调的反驳，因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根本无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和能动作用。毛泽东的另一段批语还写道：“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② 语言通俗、生动，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肯定。事实也正是这样。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充分发挥了自觉的能动性得来的。全部人类的历史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人们自觉活动和努力的结果。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者，而不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

综上所述，客观物质条件是人们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人们只能在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去活动和努力；在实践中能否实现某种预期目的，首先取决于是否具备了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在这里，客观条件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

---

①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11 页，第 309—310 页。

要把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则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这时，自觉的能动性就反转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反对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无根据地胡思乱想、盲目蛮干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又要强调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扬主观能动作用，把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努力办好，反对轻视和否认主观能动作用、消极保守、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懦夫、懒汉思想和形而上学机械论观点。总之，必须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统一起来，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这是毛泽东所着重阐明和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的基本思想，也是我们党科学地总结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过去一个时期，国内外一些人曾经出于偏见、误解或者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把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歪曲和诬蔑为所谓“人本主义”、“唯意志论”等等，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历史创造精神得到空前的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也就是说，人们有条件、有可能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去认识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从而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这在旧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的能动性的发挥，仍然不能脱离客观物质条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否则也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都知道，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曾经给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在这以后多次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反复说明在实践中认识、掌握和尊重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重要性。1959 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际的主观能动性。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这就告诉我们，主观能动性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我们要提倡和发扬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也早就说过："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曲折道路和经验教训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在当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要继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能力；同时也要反复强调在一切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行动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力求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此作为检验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是否充分有效的客观尺度。一句话，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必须遵循毛泽东所强调的这个根本的指导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7 页。

想，即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三、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

“自由与必然”是认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二者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人们依据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获得自由，使自然界、社会的变化为人类服务，最终使自己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欧洲的一些旧哲学家如荷兰的斯宾诺莎和德国的黑格尔等人，已经懂得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这个真理，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即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自由观，从而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自由的含义及其和必然性的关系。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是“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①也正因为这样，才能够使社会的人成为自由的人，从而结束了人类的前史，真正进入了人类自己的历史。在这里，恩格斯对自由的实质的理解，没有停留在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一点上，而是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意思，体现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但是，从马、恩的有关论述来看，针对把自由和必然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想，更多的还是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经常注意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侧重从认识论上和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思考和研究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提出过不少精辟的论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由观、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他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对“自由”这一概念的科学含义做了十分明确而完整的规定和解释。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① 又说：“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②在这里，毛泽东承认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他自己也曾多次这样表述过。同时，他又认为，光有认识还不行，还要有实践活动。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是根据这种认识去成功地改造世界。只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还是旧哲学家的命题，是不完全的。他们只说到了问题的一半，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根本点，着重强调了改造世界的实践在人们获取自由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对自由的含义和实质作出了深刻的概括。

其次，毛泽东阐明了自由的实现是认识和实践不断反复的曲折发展的过程。他多次指出，客观世界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也要有一个过程。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也没有一次就完成了的真理性认识。在客观必然性、客观规律面前，人们开始总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取得了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33 页第 485 页。

验，并认真加以比较和研究，才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认识，驾驭客观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和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来说，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经过了长达24年的反复曲折的斗争实践，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有了充分的经验之后，全党才真正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有了自由。至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就更是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指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有了十年的经验，我们已经懂得了不少东西，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与此同时，他还反复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和减少由于盲目性而造成的错误、挫折和失败，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不断地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逐步取得自由。他认为，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待错误的两重性。犯错误当然不好，但实际上难以完全避免，并且错误、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中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正如他在1965年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中所说：“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为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①当然，这不是说成功的经验、正确的思想不重要，没有意义。相反，毛泽东十分重视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理论在人们争取、实现自由过程中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在他看来，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可能成功地改造世界，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科学的理论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从总体上讲，自由的取得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分别来讲，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靠自然科学的指导；而要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取得社会的自由，则要靠社会科学的指导。因此，我们党和毛泽东历来强调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各门具体科学，用以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努力克服盲目性和自发性，以便顺利地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毛泽东从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以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史的角度，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和如何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概括。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这里所说的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说法有所不同。恩格斯把进入未来社会，即人类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称为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是用以区别人类社会历史的状态、性质的。毛泽东是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论点出发，兼有认识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在两者的统一的意义上，具有更广泛的内容。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非常精辟、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②因而人类的认识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只要人类还存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永远不会结束，人类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掌握了事物全部必然性的所谓绝对自由。这也就是说，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现实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通过实践认识了必然，能动地改造世界，实现了自由与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时，人们所获得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不完全的。因此，还需要继续去实践和认识，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能达到新的自由境界，如此无限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此可见，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无限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紧密联系着的。

---

①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自由与必然所作的论述和新的发挥，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本质，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统一。它鼓舞并指导着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努力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永远开拓前进，不断地取得主动权和自由。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便顺利地逐步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四节　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及其贡献，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深刻的阐释和新的发挥，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的核心命题，表现在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实际运用。它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认识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这在本书的总论部分已阐述过。这里着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明和论证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毛泽东在 1941 年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

的科学涵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前面在不同场合已经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命题内涵的论述作过引用，这里有必要再完整地引用他对它的内涵的规定和对它的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 这里说了它的含义；说了它的目的和意义，即引出事物的固有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也说了方法，即：（1）经过调查详细地占有客观事实的材料；（2）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分析、研究和整理这些材料；（3）引出正确的结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实事求是并不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相对立的，相反，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才能找到这些材料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引出事物的固有规律，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的一般规律为指导，才能找到具体事物的特殊的因而也是固有的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只有以这种具体事物的固有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即达到前面说过的作为《实践论》的理论结论提出的要求。这是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四年之后，概括了"两论"的成果，在反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主观主义斗争中提出的重大科学命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科学方法，科学的态度，科学的作风。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提到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态度和党性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在全党造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1942 年 6 月，他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5 年又给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在此期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等一系列重要决定，积极倡导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并且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随后又召开了党的“七大”，从而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 30 年代所写的许多科学著作，包括他的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和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命题，但是这些著作却通篇贯穿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精神实质。

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和具体道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综合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得出的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思想原则，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和主要要求。

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简明而通俗的概括和中国式的表述，也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和要求。恩格斯曾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②毛泽东针对中国党内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多次教导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先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于客观。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③又说：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⑤陈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教导提出过"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著名思想原则，其中心也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上述论述相反，一切只从主观愿望或主观臆想出发，一切只从本本或上级指示出发，则都是主观主义倾向，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出发点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的胜利；坚持主观主义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第74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第799页。
⑤ 同上书。第4卷第1308页。

思想路线，必然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

从实际出发，有其特定的科学内涵。所谓“实际”，就是指认识主体以外的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是认识和研究的客体、对象。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头脑（思想）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从实际出发，具体说，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的特点出发，从全面的实际情况和事物的总体出发，从变化发展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出发，从现实的可能性出发。一句话，我们用以作为出发点的实际，应当是客观事实的全部总和和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有的人抓住某些个别的、片面的事实，甚至随意挑出某些事例来作为其言行的依据，这不是真正的从实际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原则简单化、庸俗化了。

从实际出发，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就是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即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毛泽东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无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还是邓小平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都是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此为基本根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而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挫折和失败，往往又都是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忽视和脱离了中国具体国情的结果。

从实际出发，对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领导人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对中央、上级的正确方针、政策、指示，也应当从本地区、部门、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加以贯彻执行。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

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① 刘少奇在1962年谈到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时也曾指出：“中央制定政策，要把每一个县、每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都规定到，那是不可能的。中央的政策是一般的规定，到了各个地方，就要考虑各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局势怎么样，什么时候执行，经过什么过程执行，如何执行才能执行得好、执行得通。这里就需要动一番脑筋，脑子里头就要想一想。……使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具体化得到最好的执行。”② 可见，对待上级指示如同对待书本、理论知识一样，存在着是否从实际出发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

从实际出发，对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观来说，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在这里，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是一致的。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即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只有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勇于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反过来说，只有认真贯彻执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把握好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两个出发点、共产党人的真理追求和价值追求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②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选》第423—424页。

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只讲“从实际出发”这一条原则，而不讲理论联系实际，不讲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不能完整地理解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和方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要取得胜利，既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又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指出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40 年代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又多次阐述、论证了这个思想。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① 他针对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的恶劣作风，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综上所述，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实事求是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9 页。

想路线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它们紧密结合，互相渗透，同时贯穿于实事求是的整个过程之中。我们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既要反对不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以从实际出发为理由，轻视或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反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一句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是搞好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根本。

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我们要坚持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入手。因此，毛泽东和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们历来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且在理论上作了许多新的发挥和创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早认识调查研究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亲自动手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了许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多次系统、全面地阐

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极为宝贵和丰富的理论财富。

首先，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深刻地阐明和论证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早在 1930 年，他就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把调查研究看作是了解客观存在的真实全面情况，取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在他看来，是否坚持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一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问题，是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实际调查，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并经过科学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上升为理性认识，产生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计划、办法；同样，也只有通过实际调查，才能把这些理性认识的东西在回到实践的过程中得以正确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才能不断地深化、完善和发展人们的认识，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反之，离开了调查研究，就无法实现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飞跃，做到实事求是，就谈不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和政策，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作出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泥坑，就会在政治上产生“左”的或右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充分证明了的。因此，毛泽东在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时，总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联系起来，同共产党人的党性和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强调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周围环境和客观事物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乃是共产党人了解情况，认识世

界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是贯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环节，是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基础和重要保证；是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转变党的作风，增强党性锻炼的基础一环。他还多次提出要在全党和广大干部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推行调查研究计划，以此作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和掌握的一门必修课、一项基本功。由上所述可见，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论述是多方面的，极为深刻的。

其次，毛泽东依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系统地详细地阐述了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目的、对象、态度、作风和方式方法。他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就告诉我们，要真正取得发言权，解决问题，不仅要做调查研究工作，而且要做得正确而有成效。为此，就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指出了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概括说来，一是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切不可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先入为主，自以为是，不要抱定一种成见专替自己找证据，片面地摘取和剪裁事实材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9页。

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二是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耻下问，切忌以“钦差大臣”自居，摆出一副贵族老爷式态度。毛泽东强调指出，搞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①三是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和阶级观点，运用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要把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把全面地详细地搜集、统计事实材料同抓住要点或特点（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结合起来，把个别和一般、典型调查和面上了解情况、“下马看花”和“走马看花”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发现事物的真相而不被各种假象所蒙蔽，才能在总体上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引出正确的结论。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以及如何开调查会、如何提高调查研究效率等问题。他认为，召开由少数有经验的干部和群众参加的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最忠实可靠的方法。在调查会上，主持调查的人不仅可以直接听到被调查人的意见，而且可以在一起根据预先准备好的调查纲目展开讨论，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经验，从而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当然，向社会作调查、了解情况，也还有其他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渠道，这要根据调查的不同环境和条件、调查的具体目的和要求、调查的对象、人数等因素来确定。为了提高调查的效率，加快信息的传递，尽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可能地利用各种先进的通讯设备和手段是十分必要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曾明确地指示各级党委要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来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以便及时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最后，毛泽东还从实践和认识是发展过程的高度指明：调查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必须反复不断地时时了解社会情况及其发展变化，时时进行社会调查。他说："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① 这是因为，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都在变化和发展着，人们的认识也必须随之而发展。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不断地检验和加深已有的认识，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概括总结了他自己和我们党多年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丰富经验，具体地贯彻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使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式的调查研究态度、作风和方法，明确地严格地区别开来，从而为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在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刘少奇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提倡的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才能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

---

①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选》第 193 页。

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批评过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指出他们“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① 这段话讲得中肯、深刻，很有教育意义。陈云也历来主张做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从了解情况着手，把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他曾经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② 这不是简单地规定一个时间分配的比例，意思是强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工作上。他还指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③ 张闻天也曾深有体会地说过：“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7页。

②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选》第417页。

③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31页。

的唯物论者。”[①] 1942年1月，张闻天亲自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米脂、绥德、晋西北兴县等地，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农村调查，写了不少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调查日记、笔记和报告，这是一个以经济基础为重点、以了解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为主要目的的全面社会调查，是当时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规模和影响都较大的调查研究活动之一。1943年3月他撰写了《出发归来记》一文，总结了在这次实际调查中的深切体会，并对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如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分析与综合、典型调查的意义和作用等，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发挥。周恩来对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也作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②] 陈云提出了“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的科学认识方法。就是说，了解情况要全面，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特别要多听不同的意见，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要把各种意见、各种方案，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把情况弄的更清楚，判断的更准确；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因为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

---

① 《张闻天选集》第322、32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314页.

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这就需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总之，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更正确些，是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时应当遵循的科学方法。

三、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时，不仅系统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也做了深刻的论述和科学的概括。

群众路线，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前两句话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群众的根本观点、根本态度；后两句话概括了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它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根本的工作路线，是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之一。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同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和衡量，必须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的作风和倾向，等等。群众路线的这些基本思想内容，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统一。实践表明，要全面

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首先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群众，明确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否则就不可能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地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反过来说，正象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下面，我们着重要讲的是关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及它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

毛泽东在1943年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曾经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这段话是非常深刻和精辟的。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内容和实施步骤、包括它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不断循环、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且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贯彻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之中，使这一方法哲学理论化了。“从群众中来”，就是领导者将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要求和他们的经验、智慧集中起来，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和改造制作，化为领导的意见，形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成理论、方针、政策、计划和措施等等。这个过程也就是由实践到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把领导者的意见，包括理论、方针、政策等等拿到群众中去，经过宣传解释，使之变为群众的实践，并在群众实践中检验、修改、丰富和发展领导意见。这个过程也就是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简言之，"群众——领导——群众"同"实践——认识——实践"，这两个公式、两个过程，实质上是一回事。由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如同前面所讲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一样，也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遵循这条正确的路线，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但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还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组织部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他要

求领导者“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完全符合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的。因此，必须普遍地提倡这一方法，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蹲点”、“解剖麻雀”、“种试验田”、“点面结合”等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都贯彻体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除此以外，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还必须提倡和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 这是我们党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它告诉我们，只有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充分重视和发挥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把两者结合起来，避免领导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错误，才能园满地完成各项任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但多次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而且根据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群众路线的领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8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是群众路线和典型试验、调查研究问题。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的一切都要经过试验，要普遍推广领导干部“种试验田”，的方法，就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原则的具体化。所谓“试验”、“种试验田”，实质上是进行一种探索性的小规模、小范围内的实践活动。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或几个单位，蹲点调查研究，总结和创造典型经验，再用这种经验给群众作示范，领导和推动面上的工作。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制定和贯彻执行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案时，避免草率从事，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切实可行的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当然，试验的过程既然带有探索的性质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即使失败了，损失也不会很大。通过总结经验，再认识、再试验，直到取得成功，而后再推广。这也是符合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还把群众路线的方法同调查研究和人的思维形成、发展过程统一起来。他指出：概念形成的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即思维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受检验和进一步地发展，则是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1961年5月，他在致张平化的信中，指示各级党委“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①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2页。

二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问题。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要发扬党内外民主；同时也讲了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他再次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深刻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① 这里，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或制度同时也看作是党的重要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同党的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都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只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方法，并对工作中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出适合情况的方针、政策、办法和各种条例，成功地改造客观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世界。1963年以后，毛泽东在他的一些讲话和批语、特别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又多次阐述和发挥了上述重要思想。

三是群众路线和对真理的认识问题。1964年9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① 这段话，又一次把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阐明了它们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而且把它们上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说明坚持群众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的贡献。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反对主观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就必须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主观主义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845页。

争，并从哲学理论和思想路线的高度，系统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思想实质、基本特征、表现形式、危害性及其产生的根源，阐述了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为党的思想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独创性贡献。

一、反对主观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使命，是从哲学上论证和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而它所遇到的主要思想论敌和障碍，正是反对或背离这种“相结合”的主观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创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主要是同作为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公开的哲学理论形态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逐渐丧失了市场，哲学战线上的两军对战，也随之突出地表现为实际工作中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导致革命的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则搞“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几乎陷入了绝境。他们在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上，都是脱离中国国情的主观主义，都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鉴于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

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时，总是把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问题突出地摆到全党面前，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内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 1930年他又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作了哲学概括和总结，尖锐地批评了在红军和党内存在的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而不作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空发议论、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且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以后，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中，系统地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臆想或“左”的思想框框出发，一味迷信书本，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③] 1937年他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更是明确地以扫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为主旨，从哲学理论上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1941年以后，他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115、116页，第154页。

一系列重要著作，系统地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实质、表现、根源及其危害性，阐述了克服主观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并从党性的高度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性，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 他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942 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了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中心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全面地清算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及其流毒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同志的思想沿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观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不但有所表现，而且在 1958 年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一度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党的工作指导方针和许多重大决策发生严重失误。其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虽然提出过要防止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重申要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原则，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纠正由于主观主义而造成的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总的看是不彻底的，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自己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0 页。

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轨道而没能从主观主义的错误中摆脱出来，反而发展得愈益严重，最终导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

从以上所述可见，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反对实际工作中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正是通过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并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二、从哲学认识论高度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和实事求是相对立的一种思想方法。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其实质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从表现形态上看，它同唯心主义又有所区别。主观主义并不直接地表现为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公开宣场和论证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而是人们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倾向。

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在于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轻视实践和实践经验，片面夸大理论的作用，把理论和书本上的知识绝对化，看作是脱离实践而产生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到处生搬硬套，拒绝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经验主义的特点是片面强调感性经验的作用，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到处套用，轻

视或否认理论的指导意义，因而不能洞察客观事物的本质、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在对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的片面性，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尤其是教条主义，它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

急燥冒进和保守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在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行动上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批评过那种“分兵冒进”、“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的主观主义错误，认为那些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小看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同时他也批评了持保守思想路线的人，指出这种人在思想作风上的特征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饱食终日，把“本本”看成是“既定办法”，以为只要固守这些办法，一字不差地按这些办法去做，就可以保障永久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明确指出：“急燥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① 前者表现为无视客观规律的存在，单凭主观愿望、热情、意志而不顾客观条件，勉强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后者则是在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面前，消极悲观，无所作为，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经过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也不去做，本来可以争取的胜利也不去争取。实践证明，这两种主观主义、特别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95 页。

使我们吃过很大苦头，走过不少弯路。在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当认真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和防止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并不限于毛泽东所概括的上述几种比较典型的或基本的形式。凡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凭想当然办事的主观武断的官僚主义作风，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中的随意性和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毫无根据地胡说或猜疑，以个人好恶和感想代替党的政策和事情的本质，搞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都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这些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工作、学习、实践中都是常见的。因此，同主观主义倾向作斗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样的主观主义就反对什么样的主观主义、不要带框框，也不要因为反对一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而忽视甚至陷入另一种形式的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我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份如同汪洋大海，占了绝大部分。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其在政治上既有革命性一面又有动摇性一面，因而容易忽“左”忽右；在思想方法上则表现出眼界狭小，好走极端，看问题常常带有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毛病。正如毛泽东所说：“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①]“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

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①] 长期以来，我们党虽然十分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思想教育和改造自己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但由于封建主义的流毒和小生产者思想的影响很深，资产阶级思想也相当广泛地存在着，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还会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共产党内发生影响，成为滋生主观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主观主义的存在，不但有长期社会历史的根源，而且有认识论上的根源，即人们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绝对化。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②] 毛泽东发挥了这个思想，把认识论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

毛泽东不仅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实质、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而且系统地提出了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途径和方法。首先，“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③]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和主观主义思想根本对立的。只有用唯物辩证法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1—64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5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7 页。

和干部，把反对主观主义提到哲学世界观斗争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这些都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和倡导的重要的思想、组织原则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必要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级指示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个人的经验、智慧和集体的经验、智慧相结合，从而才能避免主观主义，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原则性错误。再次，反对主观主义，克服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从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而只知道生搬硬套，墨守成规，这样就必然使自己的认识和行动陷入盲目性，最后，毛泽东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对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具体努力方向。他指出，有书本知识的人要着重向实际方面发展，向实践学习；有工作经验的人要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使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历史经验表明，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中是行之有效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要求的，此外，党和毛泽东还采取整风运动形式，对党员集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创造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有效地克服各种主观主义的成功经验。所有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独创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斗

争并未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主观主义的错误是“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1] 这是因为，客观世界总是作为过程而无限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总是处于主客观矛盾的无限发展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人类认识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根本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不断出现，一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被克服了，另一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又会发生。这是整个人类认识史和我们党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都已证实了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那种认为反对主观主义可以一劳永逸的思想是不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前面说过，毛泽东从5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其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他的主观主义。这说明，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的伟大领袖人物，在另一种条件下也产生了主观主义。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左”的主观主义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恢复和发扬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党的优良传统，因而在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应当看到，在当前和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还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时刻注意端正自己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防止和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以保证各项工作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胜利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二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从哲学上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和运用，而且十分重视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十分注意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和宣传，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充满着各种复杂矛盾的国度。既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既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又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既有各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而产生的矛盾，又有中国统治阶级、各派政治力量或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中国近代和现代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这些矛盾的错综纠缠，矛盾诸方面斗争力量消长变化、屈伸往来，以及反映这些矛盾变化、推移状况的革命统一战线时而联合时而分裂、革命斗争形势的多种多样，都特别表现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变的激烈的辩证法运动。中国共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

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只言片语，长期拒绝研究中国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因而不能洞察中国革命运动的伟大前程，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捉住主要的政治关节、处理好各方面的工作，这样，是不能不遭到失败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实际存在的复杂矛盾，从哲学高度科学地总结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毛泽东辩证法的鲜明特色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1）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2）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发挥了矛盾特殊性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3）把唯物辩证法推广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套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过程中，对于我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的现实的矛盾运动，搞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各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

内核和人类认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实现了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唯物辩证法是由若干基本规律和许多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时，着重论证了与此相对立的辩证法的诸规律和范畴的客观性、普遍性。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他们虽然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讨，没有“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①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对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提出对此要加以说明和发挥，他本人也做了初步的说明和发挥。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继承了马列的思想，从理论上系统地说明和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从两种宇宙观根本对立的高度，论述了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从事物的存在方式上说明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把握事物自身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用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说明其他辩证法规律和范畴。因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宝库。

一、从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论述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而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内部矛盾引起事物的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尽管没有来得及详细地考察辩证法各个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还是初步表述了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分析了矛盾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对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2]

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对立的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并指出，黑格尔以唯心主义方式阐述了这三个规律，在《逻辑学》中论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部分，即本质论部分，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3]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把它当作重要的方法论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贯彻。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个范例。对此，列宁有过十分简洁而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4] 他强调，不懂得矛盾规律，就很难深刻理解《资本论》。

列宁继承、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对此作了初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②③ 同上书，第3卷第54页，第484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

步的说明和发挥。列宁指出："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他还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2]并且强调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3]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等论著中，对这一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说明和发挥。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的实质。不应当把对立统一当作实例的总和，而应当作为规律来看待。对立统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列宁深刻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实质是承不承认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并且强调矛盾的同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把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以及内容和形式的斗争都看作是对立面的转化的实例，实际上是把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看作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但他没有在理论上作出这样明确的概括。他还强调矛盾分析方法是人们的认识方法，认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而且自觉地把它运用到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去。例如，列宁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帝国主义，分析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宁在他的经济学说、国家学说以及其他方面，都渗透着矛盾分析方法。列宁的光辉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是运用矛盾规律分析问题的范例。它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科学地说明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第407页，第240页。

和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资本论》矛盾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评价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时说："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①

列宁逝世之后，苏联哲学界批判了德波林派的错误，对列宁的哲学遗产进行了广泛的认真的研究。其中也力图正确说明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作了有益的尝试。例如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中最基本，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法则"。② 又在他主编的《新哲学大纲》中指出其他规律和范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发现和具体化"，但未能具体展开。我国哲学家李达在其所著《社会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③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也吸收了30年代苏联和中国哲学界的成果，并在理论上做出了创造和发展。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评价的："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④ 毛泽东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
②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68页。
③ 《李达文集》第2卷第13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发展工作，首先在于他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上，提出并阐明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如前所述，列宁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在对这个论断进行说明时，提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他的原话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二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列宁认为，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忽视了事物自己运动及其动力、泉源，辩证法的发展观"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自己'运动的**泉源**上。"[①] 这里，列宁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泉源。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一书的批注》中，对列宁的思想加以概括说明，指出：在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看来"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泉源"，"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②] 在《矛盾论》中，开宗明义，一开始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③] 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互相对立的两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4、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

种宇宙观”，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形而上学宇宙观“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其根本缺陷在于“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① 毛泽东还举了大量例子说明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毛泽东在 50 年代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② 在 60 年代初期，他再次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弄清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④

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说明并坚持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而且还批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指出斯大林把对立统一和辩证法其他三个特征并列，没有突出对立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0、301 页。
② 同上书。第 5 卷第 372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9 页。

一规律的中心地位；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等等。毛泽东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卓越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给唯物辩证法增添了活生生的新内容。

二、论述了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把握和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及其运动发展

毛泽东不仅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上，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且从存在论、发展论、认识论的角度，论述了把握和分析事物内在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是辩证法的实质。

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又指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① 这里他论述的是矛盾的普遍性。当他指明，矛盾即是事物，即是思想，即是运动，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时，大体可以看作这是从存在论上论述了矛盾和把握矛盾的意义。存在论也就是以往的哲学所说的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用存在论也许更为确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科学地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论证了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世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意识、思维是高度发达的物质大脑的机能，思想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等。毛泽东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319页。

学思想继承了这些唯物主义的前提，由于面临的任务不同，它更多发挥的是存在论的辩证法。上述的论点都是这种发挥，都是和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物质及其属性的存在，都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存在，不仅要唯物地而且要辩证地把握这种存在。上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论述，又是从运动论、发展论对把握矛盾的意义的阐述，实际上指明矛盾是运动发展的内在源泉和根本动力，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发展过程的真实内容，既包括现实事物，或客观现象，也包括思想，或思想现象。

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关系，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①]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论》中深刻地论述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系统地论述了认识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而且他的《矛盾论》可以说通篇都是告诉人们如何把握矛盾，认识矛盾，分析矛盾。他还着重指出，矛盾即是思想，"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②] 这说明矛盾也是认识、思想运动过程的实际内容。在《反对党八股》中，他还阐明，"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指出，要提出问题，对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要加以分析和综合，指明问题的性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③]这里，既深刻而又生动地从一个角度论证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7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

的认识论，具体地阐明问题就是矛盾以及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

综上所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也就是这样从存在论、发展论、认识论的各个角度，论证了把握矛盾及其运动过程是辩证法的实质。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从事物的矛盾结构（这是存在论）和包含着矛盾结构的事物的运动（这是运动论、发展论），来探讨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包含的丰富的深刻的内容，说明辩证法的实质。这种探讨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更加深刻地把握当今科学上的系统论，并在哲学指导下正确运用系统的方法，也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包含有事物是作为系统存在的思想，指出："宇宙是一个体系（按体系和系统在西方文字中是一个字——引者），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①并进一步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② 这就是说，宇宙、事物既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又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很多著述中论述了矛盾普遍存在的思想，又经常使用结构这一概念，精辟地分析过许多事物的矛盾结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及其运动和发展趋势。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并把它作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他还特别注意古希腊哲学家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统一物是由两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240页。

对立面组成的"，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提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可以说，列宁这些论述初步表露了事物是矛盾构成的、事物是矛盾的结构的思想。在这里，显然也表露出了事物的矛盾结构是对立统一规律成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现实的内在基础的思想。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上述思想，也批判地改造了中国传统辩证法中关于宇宙构成思想的精华（如《老子》和《易经》中关于宇宙是阴、阳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体的思想），提出了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事物的结构就是矛盾的结构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所讲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②] 作为系统存在的现实事物乃是"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者叫做"矛盾构成的诸方面"的统一。[③]这就是说，事物、系统的内部结构就是矛盾的结构。按照现在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系统是指由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并具有一定功能的统一整体。系统是有结构的。结构是各种物质形态的普遍属性，是指各种要素的内在的联系与组织方式。毛泽东早在30年代的读书批注中批评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就指出："体系内部由互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体系中各要素之间也有矛盾"，[④] 这里就包含了系统的结构是矛盾的结构的思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论述，指出事物中"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396、40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页，第330、331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9—100页。

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因而构成统一的整体。① 这就是说，事物中的“矛盾着的各方面”，即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它们的联结和组织方式，就是既对立又统一，事物的结构就是矛盾的结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论述了世界的“矛盾结构”的普遍原理，普遍适用性。他指出：“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②这样，毛泽东就向人们揭示了世界是一个现实的、复杂的、立体的、动态的矛盾结构网络。它之所以是复杂的、立体的，是因为它充满了无数的矛盾；它之所以是动态的，是因为它是由无数能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即矛盾构成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再次明确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③

毛泽东还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领域中举了许多例子对事物的矛盾结构进行了论述。例如，他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8页，第3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①] 在他看来，原子也是多层次的矛盾的结构。他说："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②]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也是矛盾的结构。它是由两对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贯串于人类社会的各形态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矛盾的性质不同罢了。

关于认识、概念的矛盾结构，毛泽东指出，一个简单的命题，也是矛盾的结构。例如"妈妈是人"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他在《实践论》中揭示了人的认识结构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矛盾结构。

党也是矛盾的结构。刘少奇指出："党的组织结构……是矛盾的统一体"。他举例说，党的支部或党的小组不仅是各个党员相加的关系，有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小组长和小组成员。"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的结合，或是组长和组员的结合，都是矛盾的结合，即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有了这种统一的组织才有力量。"我们党"不是联合会，不是各个地方党部的联合组织，而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320页，第498页。

是不同的党员，不同的组织部门结合成的一个集体的整体”。①

以上着重论述了矛盾即是事物，事物、系统具有矛盾的结构。矛盾的结构也就有矛盾着的功能。例如，《论持久战》中说明整个武器系统就是矛盾的结构，是有矛盾着的功能；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现代的武器系统不外是矛和盾的继续和发展，有的有矛的功能，是用来进攻的，消灭敌人的，有的有盾的功能，是用来防御的，保存自己的，坦克这类武器则兼有进攻和防御的矛盾着的功能，等。这里对功能问题就不作展开的论述了。矛盾不仅是事物，也是运动，是过程。对立统一不仅揭示了事物、系统的矛盾结构原理，又揭示了事物、系统运动和发展的原理，说明了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动力和过程的真实内容。事物、系统结构中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力量又统一又斗争不断推动事物、系统的运动和发展，在斗争的一定范围内事物、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斗争的继续发展又破坏结构的稳定，旧的事物、系统就为新的所代替而进入新的矛盾运动过程。这在后面还要作具体论述。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从辩证法的实质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意义。

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深刻说明其他辩证法规律和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因为对立统一是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理解和把握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键；矛盾分析方法是人类认识的根本方法；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正是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说明，人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319、320、321页。

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时，不能把辩证法的诸规律并列起来，而应维护和坚持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全部内容，辩证法只有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规律和范畴也都是唯物辩证法不可缺少的内容。质量互变规律反映事物发展的形式，否定之否定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辩证法的其他各对范畴，也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事物的最普遍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正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坚持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同时，又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与其他规律与范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① 毛泽东强调用对立统一说明辩证法其他规律、范畴，这对我们深刻领会唯物辩证法学说具有重大意义。

（一）用对立统一规律解释、说明质量互变规律

1. 毛泽东对质和量进行了矛盾分析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7 页。

什么是事物的质，它由什么决定？

毛泽东认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作根据。"①并且进一步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②毛泽东还指出：包含许多矛盾的复杂事物，"质为主要矛盾所规定，属性为次要矛盾所规定。"③同时他还强调质和量的统一，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毛泽东十分注意事物的度，即"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④还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这样，毛泽东就用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来说明了事物的质、复杂事物的质，以及质和量的关系，显示了他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辩证法范畴的特点。以后我们还将要看到这样作的意义。

那么，什么又是质变和量变，以及二者的关系和它的规律呢？在质量互变规律中，毛泽东也是用矛盾的斗争揭示了量变和质变以及相互转化的根源。他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第323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6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①

毛泽东不仅在总的方面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了质量互变规律，由此，他还对后者作了许多发挥，从而也丰富了前者。下面作一些论列。

2. 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矛盾斗争性在质变中的二重作用及其在质变和量变中的表现

艾思奇在《哲学选辑》中提出：矛盾的斗争性表现在互相压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须压抑自己的否定或对立的方面，以显出自己的存在，以维持自己的质的安定性。对此，毛泽东指出："质的暂时不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维持的，质的终久必变也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现的。"② 我们说，这是矛盾斗争性的二重作用，因为对立一方的斗争是要维护质的安定性，而对立另一方的斗争是要改变这种质，而最终由于矛盾斗争性作用的结果，旧质终于被新质所代替。毛泽东把矛盾斗争性在质变中的作用说完全了，说彻底了。这也就是说矛盾斗争性在事物量变和质变过程中都发生作用，他既讲了斗争性对维护质的安定性的作用，又讲了它促使质变的作用；既讲了斗争性在质变过程中的作用，又讲了它在量变过程中的作用。

3. 毛泽东不但揭示了矛盾斗争是质量互变的根源，而且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332、333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

一步揭示了矛盾斗争引起质量互变的具体机制，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的斗争及其相互转化来说明质量互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事物的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随之起变化。后来他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对这一观点作了具体发挥。指出：事物的量变"虽然是各方面的量变，但是属于两大主要方面的各方面的量变，这两大主要方面之一方面的量变小了，另一方面则变大了，于是过程的质就变了。"他进一步指出："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又说："新质就是同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① 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事物内部由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各自的量在对立的斗争中发生变化，也就是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力量发生变化，其结果，原来矛盾主要方面（代表旧）的一方的量由大变小，次要矛盾方面（代表新）一方的量则由小到大，到了最大限度时，矛盾方面的主次地位发生变化，矛盾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新的力量战胜旧的力量，过程就发生质变，新质就代替旧质。于是又开始事物矛盾的质量互变的新过程。

4.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观点对量变和质变过程进行分析，又阐述了部分质变的重要思想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无论是量变还是质变，二者都不是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68—369 页。

以纯粹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互相渗透的。因为量是一定质和量，而且质也是一定量的质。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质变和量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质变中也有量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因此，"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他举了许多例子对这些观点加以说明，并根据上述观点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在工作中要通过促进量变，促进许多部分质变来实现最后的质变。毛泽东还用"关节点"的概念对部分质变的观点加以论证。他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在《矛盾论》中，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分析了部分质变产生的原因，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提出"部分质变"的概念。他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

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1] 依据毛泽东的分析，事物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其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这就是说，其发展是处在量变过程中，但是由于被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有变化，因而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这一情况的发生，从质量互变规律来说是部分的质变。哲学界往往把部分质变概括为两种状况：事物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和事物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对于阶段性的部分质变，《矛盾论》中举过不少事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情形就是如此。虽然这时资本主义从总的方面说来，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量变阶段，但是帝国主义时期却发生了部分质变，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的，垄断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等等。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部分质变的思想，是有思想资料前提的。30年代苏联西洛可夫等编的哲学教科书中提出过“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予以关注。[2] 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也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曾明确地使用了“部分质变”的概念。由此可见，虽然部分质变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毛泽东对部分质变思想作了充分的阐述，他很早就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指导革命工作，正是由他赋予了部分质变思想以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4页。

②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1页。

5. 毛泽东用矛盾的观点分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双方质和量的“向上”和“向下”交错变化及发展趋势，分析了新旧事物的对立双方这种质和量的变化趋势。

毛泽东把这种观点运用到抗日战争过程的分析，具体揭示出中日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力量的变化和战争发展过程的基本趋势。他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中日双方战争的性质、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四个互相联系着的基本特点，由于战争双方斗争和国际因素（这是附随的因素）的作用，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各依其本性而发生“向上”和“向下”双重性变化的复杂情况。他指出：在中日战争过程的第一阶段，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国方面向下的变化，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军事力量、文化机关等的缩减，向上的变化，就是战争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影响的发展、游击战的出现、国际援助增长等等。向下的东西是旧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主要是新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质上。在第一阶段，日本也有向下的变化，即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废、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大量经费的支出、国际舆论责备等。日本方面也有向上的变化，即扩大了领土、人口、资源。日本向上方面的变化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大体上是日本将继续向下，逐渐脱出优势，中国继续向上，脱出劣势，逐步达到敌我力量的平衡。在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阶段，中日双方力量由平衡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中国由大体上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毛泽东对事物质量变化的矛盾分析，新颖之处在于：（1）由以往分析事物内部矛盾引起质量互变，深入到事物内部矛盾结构的两大

方面，分析每一方都同时有向上和向下、新旧质和量的双重性交错交化。（2）指出了事物矛盾双方的性质决定各自的双重性交错变化的发展趋势。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一方，向上的变化主要是新的质和量，向下的变化主要是旧的质和量。代表事物保守方面的一方，向上的变化主要是量的扩大，并且是暂时的、局部的，向下的变化是旧的质和量的逐步削弱。（3）指出了矛盾双方量变质变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分阶段进行的过程。矛盾双方的斗争，因旧质一方一时处于优势，故常能打败新质一方，使它产生向下的变化，即所谓后退现象，这是过程内的量变现象，而败者继续积蓄力量，到了自己处于优势时，就能击败旧质一方，完成一个质变。

《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实际问题的活生生的典范。事实证明了这种分析的科学性、正确性。它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中日双方互相对立的四种基本因素入手，又贯彻始终的，当它又把这种矛盾分析和这些因素的质和量的变化的分析，即和质量互变规律的运用结合起来，为我们勾画出战争发展过程和三个阶段演进的图景，而又由实践证实了这种科学预见性，我们也就可以从中领悟到用对立统一规律理解质量互变规律、两个规律相联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可以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

（二）用对立统一规律解释、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十分注意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反对形而上学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片面性，并且十分注意辩证的否定观的方法论的运用。

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

一切，都是片面性的。"[1] 这种方法实质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他指出，在"五四"运动时期，一些领导人物，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为了纠正这种缺点，党和毛泽东对于中外文化遗产都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

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发展是曲折前进的原理，恩格斯称之为"发展的螺旋形式"。[2] 列宁称之为"螺旋式"上升、"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之否定）"。[3] 毛泽东则称之为"波浪式前进"，并对这种曲折前进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毛泽东认为，这种"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发展，[4]就是列宁说的"螺旋式"上升的另一种说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顺便指出，毛泽东关于波浪式发展规律的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最早提出"波浪式发展"的思想。该文分析了国内各种矛盾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提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其"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5] 显然，在这里，波浪式发展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在1937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他指出，由于物质世界包含的内

---

①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第3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60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98页。

部矛盾，推动物质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但是就具体发展过程说，“也会发生转向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结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螺旋运动。”这个思想，在该书第三章第一节，即后来公开发表的《矛盾论》中作了精辟的表述：“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① 这段论述，说明了事物的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具体情况，揭示了事物波浪式发展的实质，又预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总的趋势。以后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他说：“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② 为什么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他说：“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③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斗争，是波浪式发展的根源。事物矛盾运动的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而道路则是迂回的、曲折的。对此他有过很著名的概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3页。

②③ 同上书。第5卷第361页。

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必须反对循环论和直线论，善于运用否定之否定即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自觉地走“之”字形的前进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上就是如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直线式的冒险政策。“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 土地改革也是这样，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这也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坚持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努力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才能顺利发展。他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②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关于事物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原理，为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论断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③又说：“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④这一论断有重大

①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196页，第323页，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314页。

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这一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新生事物是一定要胜利的，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当然，这一胜利的过程也是波浪式地前进的。

（三）用对立统一规律解释、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一些范畴

对于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毛泽东认为，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① 毛泽东还认为：“本质即为矛盾所规定的该现象的性质。矛盾体的斗争表现为现象，又规定该现象的性质。不了解矛盾，不能了解本质，也不能了解现象的发生与变化。”② 他特别告诫，人们要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③ 党和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运用这一方法观察形势，观察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些人产生悲观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④ 事实正如毛泽东的预料，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最后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884—885页。

终于陷入失败的结局。这些都是说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而且要用矛盾的观点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内容和形式这一对范畴上，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也强调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例如在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关系问题上，他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 并且指出这种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新文学艺术对于旧的文艺形式，也不拒绝利用，但要进行改造，加进新的内容，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毛泽东很重视形式的作用问题。因为虽然形式为内容所决定，一定的内容规定了相应的形式，但是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没有恰当的形式也不能正确表达内容。二者是统一的，但这又是矛盾的统一。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在各国起作用。在政治领域内，他不仅重视国体，也重视政体，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在战争问题上，也很注意战争的多种形式，并注意根据不同的形势变换地加以运用。毛泽东在尊重形式作用的同时，也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例如反对党八股这种形式，曾是延安整风的一个内容。因为形式主义的文章，只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去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也就是脱离了内容，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形式主义的方法。甚至于开会，也要反对形式主义。

在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一对范畴上，毛泽东也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加以分析。他指出："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页。

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① 他还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的斗争及转化的原理来具体说明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复杂情况。他指出："可能性基本的只有两个，并没有多个。这是因为一事物在一过程中，只有一个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各有一种要求，故有两种可能性。但现实性只有一个，则是因为矛盾斗争的一方面被另一方面压倒，破坏了一个可能性，故只剩下的一个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也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则是因为次要矛盾的存在，如社会中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之故。然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因为基本的矛盾方面只有两方面之故。"② 这里说到两种可能性，是说基本的可能性，由于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展程度的不同，两种基本的可能性又要细分为多种可能性，例如解放战争一开始他就估计了战争结果的四种可能性。毛泽东要求人们注意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他提出了两手准备：准备和防止最坏的可能的实现，争取最好的可能的实现，这样就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还曾指出，在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问题上，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主观的努力起很大的作用，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刘少奇在《人为什么犯错误》一文中，也用矛盾来说明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他说："由于根据的矛盾的多样性，决定事物可能性之多重性。"因此，可能性的选择，必须选择实在的有根据的、可能实现的"，并且要"阻止克服其他可能"，积极为所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准备条件。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用对立统一规律系统地阐发了全局和局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7—378页。

部的范畴。

毛泽东在研究军事问题时，在总结前人关于整体和部分范畴成果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全局和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首先指出，全局和局部是相互对立的。所谓全局，是指“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① 反之则为局部。二者的地位不同。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全局一般处于统率的、决定的地位。但二者又相互联系。因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如果在战争中，倘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当然，局部也不能脱离全局，因为离开了全局，局部也就失掉了它原来的作用和意义。全局和局部也可以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全局的东西，在另一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局部性的东西，反之亦然。在全局和局部的相互关系上，毛泽东反对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一是缺乏全局观点，二是不照顾局部。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全局和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还十分注意其方法论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② 他还说过：“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25页。

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① 这一原则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全局和局部是相互依存的，毛泽东在要求树立全局观点的同时，也在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② 这说明党在解决经济建设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问题时是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法来解决。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在范畴方面，还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提出和分析过主流和支流的范畴，以及它在实际中的运用。毛泽东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③在革命和建设中，分清主流和支流，对于我们认清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分析形势的时候，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一部分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扶蒋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1 页。

②③ 同上书。第 5 卷第 387—388 页，第 180 页。

共政策所造成的形势产生悲观情绪，针对着这一情况，毛泽东指出："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① 这一科学的分析，对于人们树立起胜利信心，使人们看到光明的前途，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革命队伍内部，毛泽东总是强调分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这也就是要分清主流和支流的问题。作为方法论来说，分清主流和支流，对于革命的人们，看清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树立起胜利的信心，更好地前进，有极为现实的意义。当然，对于支流问题，也要逐一加以解决。

第二节 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建立了分析复杂的现实的矛盾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特别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了形而上学。他们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对辩证法的原理作了理论的论证。辩证法的理论是用来分析现实事物的。理论是深刻的，而现实是丰富多彩的，矛盾的规律是抽象的原理，而现实的矛盾通常是复杂的矛盾的网络。他们也把这种理论作为方法运用于分析现实事物，分析现实的复杂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103页。

的矛盾，并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提供了这种运用辩证法的光辉范例。但是正象列宁说的："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①这样就留下一个重要任务。把《资本论》的逻辑以一般的逻辑形式抽象出来，把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方法，以一般理论的形式概括出来。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理论，提出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也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现实的复杂的矛盾，但是也同样没有形成如何分析现实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按照各自对马列思想的理解，提出了大体相同的对立统一学说的理论体系，尽管也联系了当时的实际斗争，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论点，但其主旨并不是提供人们分析现实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而是系统化并结合实际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间、不同著作中提出的矛盾原理。

现代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面对的是内外交织、错综复杂的矛盾，是屈伸曲折、变化多端的矛盾运动。"左"右倾机会主义指导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能力把握这种矛盾及其运动变化，是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了这种矛盾和矛盾运动。为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教条出发，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而实际又是这种矛盾交错、变化多端的实际，不能如实地反映这样的实际，不从这样矛盾着的实际出发，也不能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就必须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坚持辩证法。不坚持唯物主义，就不会去坚持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而不能运用辩证法，也不能达到唯物主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义的要求。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不仅要解决理论和具体实践统一的认识论问题，也要解决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用马列关于矛盾分析的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复杂矛盾，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出了系统分析现实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列的辩证法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与世界矛盾运动相联系的中国近现代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的理论上的再现。这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最突出最有意义的贡献。

以下我们对这一逻辑体系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一些探讨。按照《矛盾论》的逻辑，这是从把握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发展观分歧的实质，把握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动力起，而后转入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亦即矛盾在现实的复杂的事物上的特殊表现。

一、两种宇宙观、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

毛泽东在正式发表《矛盾论》时，进一步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对立概括为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① 后来他又进一步申述过这种见解，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① 毛泽东把宇宙发展法则概括为世界观，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正确见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又是运动、发展的，世界就是运动、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这是完整的世界观。毛泽东在抗日初期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指出过，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整个的世界观。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同时也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只有坚持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使二者有机地结合，才能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过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在观点上的对立。认为形而上学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与此相反，辩证法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他没有对辩证法的观点直接作这样的概括，但这是他的逻辑的必然。这种观点上的对立最终集中到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即是否承认矛盾，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这也是必然的。恩格斯曾经把辩证法规定为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他并没有停留在两者的联系的和孤立的观点的对立，他论证了承认相互联系，这就是承认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就构成运动，运动就是矛盾。② 形而上学否认了相互联系，最终也就否认了矛盾，否认了事物的发展。这里说的相互联系、矛盾是指事物、系统的内部的对立方面的相互联系、内部矛盾，但事物、系统不是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6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84、551—552 页。

立的，又和其他事物、系统有着外部联系和外部矛盾。辩证法对二者在运动、发展中的关系，又要作进一步的了解。毛泽东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形成了著名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在说明事物发展原因时他称作内因和外因的，在分析矛盾时相应地他又称为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①]

（二）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深刻指出，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②]形而上学宇宙观就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不能把握事物的“自己运动”（列宁）。

在批判形而上学宇宙观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事物发展的源泉问题。他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③]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其他著作中对这个理论展开了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 针对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一贯主张，即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源。

---

①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2、100页，第70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301页。

毛泽东指出："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1] 又说：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2] 他还举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大量例子，说明事物内部矛盾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明辩证法"自己运动"的原则。

2. 分析了内因、内部矛盾和外因、外部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矛盾论》中这种科学论断，是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总结。此前在阅读西洛可夫等人的教程时，有关论述就引起了他的特殊注意，并写了很长的批注，作了阐发。他说："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他还引用苏轼的话："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来说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说：完全在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毛泽东说，这种"'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

①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0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第301页、302页。

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① 在这个批注中，他还举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中国革命运动中大量事例，说明“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须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②这样，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而且即使是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自然界的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

3. 具体地辩证地分析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同根据和条件的关系。

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中附的《研究提纲》中有这样一段话：“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之后。阅读它并作了批注，发表了不同看法，说：“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

---

①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6—107页，第109页。

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提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① 对批注的内容也许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复杂的矛盾中，他把内部矛盾又区分为根本矛盾和次要矛盾，当我们说到内部矛盾、内因是根据时，根本矛盾或基本矛盾就是基本的根据，而内部矛盾中的次要矛盾和外部矛盾则都是条件。这是《矛盾论》中有关说法的具体化。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在实践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也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必然结论。既然一切事物的发展主要地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推动，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邓小平也强调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

建设，也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艰苦奋斗。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是“内因论”，但不否认外因的重要作用。因为外因也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不可少的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正是上述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的科学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国采取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学习和借鉴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一切好的东西，借此增进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为此，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二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因为它们都违背了上述正确的方针。

综上所述，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中关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内因和外因的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科学的关于事物发展原因的理论。

二、以矛盾普遍性为基础，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在肯定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基础上，对矛盾规律的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特别是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建立了系统的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这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中最富有特色而被国内外极力推崇的部分。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主要是在这一部分展开的。

（一）矛盾普遍性含义的科学概括

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大量论述过“矛盾普遍存在”的思想，但他们都没有使用“矛盾的普遍性”的概念。3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如米丁本和西洛可夫

本都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的概念，并根据列宁的思想，把对立统一称为“普遍的发展法则”，但都没有抽象出“矛盾的普遍性”这个概念，没有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联结起来，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思想，在《矛盾论》中，与“矛盾的特殊性”概念相对应，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并根据列宁关于《资本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部分的矛盾及其至始至终的发展的思想，给矛盾的普遍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 这里讲的也就是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说明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研究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在讲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时，特别强调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是彻底地坚持矛盾普遍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他曾批评过两种不彻底的矛盾观点。一种是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这就是德波林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同一进到差别，由差别进到对立，由对立进到矛盾。他们不了解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的就已经包含了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不过在最初的时候，矛盾没有激化而已。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如果认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5 页。

差异不是矛盾，那末事物发展的最初时期，其发展动力是什么呢？岂不又陷入了外因论的泥坑？毛泽东的这一论点对坚持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是重要的。应该说德波林是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辩证法，他说的同一到差异到对立到矛盾，这是概念的递进，如果把这看成是概念的递进，那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黑格尔和德波把这看作是现实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唯心主义的理解，在现实事物中这些关系是同时存在着的。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上，会有这种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递进。例如，地主和雇农两个人我们看到都是人，这是同一；进而看到两者的衣饰、生活、感情等都有不同，这就是差异，是表现在现象上的差异，由浅入深，我们又看到两者的本质的差异，两者是互相对立、相互斗争的两个阶级的人，这就是对立；再深一层的观察，就可以看到两者虽然是对立的，但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两方，两者以一定条件处在统一体中，又对立又统一，这就是对立的统一，即矛盾。30年代苏联学者们批评德波林时就指出了他把唯物辩证法唯心主义化，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只是还没有说得透彻。当毛泽东说差异就包含了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时，他说的是现实的矛盾而不是概念的矛盾。《矛盾论》是分析现实矛盾的逻辑体系，是以现实矛盾为基础把握概念矛盾的特殊表现的。当然，我们这里讲的差异，是指矛盾着的事物的内部的两个对立面的差异，而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东西当成矛盾，这一点在《矛盾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持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对于坚持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只是在阶级社会中存在，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没有社会基本矛盾了，不承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

东批评了这种观点。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应该说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一个贡献。

（二）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矛盾在现实事物和复杂事物上的特殊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曾经提出，对于德国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不能陷入教条主义的理解，必须要“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 马克思在其全部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复杂矛盾作了深刻揭示，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恩格斯在论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时，曾经指出：“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② 列宁则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③ 又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④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把矛盾特殊性在理论上作系统的论证，也没有从理论上再现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而这正是毛泽东的重大贡献。

在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如在西洛可夫本中，曾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
③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第243页。

述了事物发展过程、过程发展的各阶段上“质的特殊性”，提出处理现实问题要“暴露出整个过程的质及其各种固有性，研究那过程的方面、形相、阶段之质的特性”①。在论述“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运动”时，根据列宁评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研究任何过程，要“暴露主要矛盾”及为其所制约的全体矛盾在过程中至始至终的发展，“探求发展中的过程各阶段的质的变化，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运动之相对特殊性、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的相互联结及相互推移”。②毛泽东以其理论上的敏锐性，以其全部革命经历和学识，对这些论点给予了特殊的注意，捕捉了这些论点。这些论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来源。把这些论点系统化，并加以发挥，这是这些教科书的有意义的贡献，也给了毛泽东以启示。毛泽东则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以中国共产党人处理中国革命中复杂矛盾运动的全部经验为基础，以中国革命中复杂矛盾运动表现出来的客观辩证法为原型，进行理论上的创造，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作了系统的阐发。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

人们要认识物质世界，就是要认识物质运动的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当然要注意其共同性，但是，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为此才能区别各种事物。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人们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要从认识物质运动形式

①②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6、49页，第90—91页。

的矛盾特殊性开始研究。这是现实的矛盾运动形式的特殊性。

2.要认识每一物质运动形式的发展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

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发展过程，都有其特殊性，都是不同质的。例如，就社会的运动形式来说，它在发展的长途中，经历过一些不同的发展过程，其中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它们都是不同质的，都有不同质的矛盾。不仅如此，而且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有其特点。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或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成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级性来。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时它便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要加以研究。只有不断地研究不同阶段矛盾的新特点，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理，才可以避免在思想和行动上落后或超越一定的历史过程和阶段的失误。

很明显，这里分析的，不仅是现实的矛盾，而且是复杂的矛盾，不是对矛盾的静态的把握，而是动态的把握。说是复杂的矛盾，是因为这里不仅有贯穿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而且有为

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大大小小的矛盾，形成了复杂的矛盾网络。说是动态的把握，是因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根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为它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发生复杂的变化，过程又显出阶段性，由一个阶段发展为另一个阶段。这种分析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已经在其后的事实中充分显现出来了。它不仅被运用到对抗日战争过程和阶段的分析，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了战争的胜利，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指导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解放战争的转变以及其后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党的指导思想脱离了我国过程和阶段特殊性的实际，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犯了“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教训，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和现阶段复杂矛盾的特殊性作了清醒的科学分析，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的重要依据。

在《矛盾论》的有关论述中，下列两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矛盾论》指出，过程之所以区别为不同阶段，是由于过程的根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发生了变化。根本矛盾的逐渐激化用于说明革命过程和阶段，说明对抗性矛盾，这无疑是合适的，而对于非对抗性矛盾发展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和阶段来说，似乎要用另外的表述，因为过程的发展和阶段的区分都不表现为根本矛盾的逐渐激化。这是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但即使在这里，由于根本矛盾的变化和相应地许多大小矛盾的变化，过程要显示出阶段性来，这又是确定无疑的。

这里，毛泽东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阶段”这

一用语，进行了哲学概括，赋予了它哲学上的意义，提出了“阶段性”的哲学概念。在毛泽东看来，“阶段性”是说明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过程是区分阶段的，不仅不同的过程的矛盾是特殊的，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矛盾也是特殊的，都不能千篇一律地对待。他批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指出：“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对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就会于一点。”①

3. 要把握过程和阶段的矛盾特殊性，就要分析过程的和阶段的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认为，无论是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或过程发展的不同阶段，矛盾的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为了从总体上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注意研究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相互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他具体地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发展不同阶段上国共两党及与此相关的各矛盾方面的特点，说明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对从总体上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从而正确地对待矛盾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深刻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在反对主观主义中，要求既要辩证地看问题，又要唯物地看问题，达到二者的统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2—113页。

一。[1]

4. 要认识矛盾以及矛盾方面在地位上的特殊性

在现实的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它们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在现实矛盾中，相互对立的方面，地位也是不相同的。这也是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和矛盾方面所处地位的特殊性，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毛泽东指出，在矛盾特殊性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过程和阶段矛盾特殊性的论述中，毛泽东已经提出并分析了过程的根本矛盾和为它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也不可能作展开的论述；他也提出，为了在总体上把握过程和阶段的矛盾特殊性，必须分析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但对它们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也没有专门加以论述。总之，在那里，论述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过程和阶段的矛盾特殊性，论述也以此为限，而对于革命政党正确决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有重要意义的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问题，就有结合中国革命经验，作展开论述的必要。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有关理论是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逻辑体系的主要内容、重要方面。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地论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所谓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规定

---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313页。

或影响着其他的矛盾存在和发展。它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而次要的矛盾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在复杂的矛盾中，要用全力去捕捉它的主要矛盾，捉住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否则就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的这些论点，说明的是捕捉主要矛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对的是形而上学。主要矛盾又是客观存在的，是由现实条件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对主要矛盾作出错误的判断，就要招致事业和工作的挫折和失败。这里要求的是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我国主要矛盾认识的曲折经历，以事实补充和完善了《矛盾论》的有关论述。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不仅相互区别，而且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的矛盾可以转化为次要的矛盾，反之亦然。这里又要求反对形而上学，坚持辩证法。毛泽东特别强调抓住主要矛盾的意义，认为它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也是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方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 强调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还把这种抓住中心，兼顾其他的工作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因此，正确运用这一方法，既要反对“单打一”，又要反对平均使用力量。

当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党的指导需要转变战略策略，适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时地转移中心任务，这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在这一方面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否认主要矛盾变化的事实，继续推行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政策，打倒一切，使革命遭到重大挫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后，1935 年瓦窑堡会议又批判了“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决定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终于引向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1956 年党的“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后这种原则上正确的关于主要矛盾的估计遭到否定，又错误地把阶级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最终导致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和做法，以完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为基础，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足以说明，认识和正确把握主要矛盾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关于分析矛盾地位特殊性的理论，是分析“多数矛盾”的逻辑，是他分析现实的复杂矛盾的逻辑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这是对传统上分析单一矛盾的逻辑的发展，它使矛盾分析的理论更具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单独加以研究。

毛泽东在分析现实的复杂的诸矛盾地位时，使用了“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

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等成对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对“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许多研究，其中有的见解，对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是有益的。我们认为，从毛泽东使用这三个概念的情况看，毛泽东所使用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是为了分析矛盾地位的特殊性而使用的概念，不论是在分析过程或是阶段的矛盾，实质上都是指“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在他的著作中，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地使用这三个概念的。如果我们对这三个概念加以硬性的规定，势必不符合毛泽东辩证法的本旨。据现有文献看，毛泽东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最早使用了“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概念。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里，为了说明基本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成为主要矛盾，才把两个概念作了区别。而由此“主要矛盾”被有些人理解为是在“阶段”中占支配地位的矛盾，而“基本矛盾”，则被理解为“过程”中的占支配地位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了一般性的概括。但这种理解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该文中又指出，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的许多重大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① 这里，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都是指的中日矛盾，亦即抗日时期的阶段性的占支配地位的矛盾。这并不是偶然的用语上的失误。毛泽东在1941年5月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2、254页。

高潮的总结》中，再次把中日矛盾称之为“基本矛盾”。他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① 而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被称之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同时，这两大“主要矛盾”和其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都又被称为“基本矛盾”。②

再说“根本矛盾”和“基本矛盾”的使用情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③ 在别处，他则称这一对矛盾为“根本矛盾”。④ 在抗战时期也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⑤由上述情况可看出，毛泽东无论在“过程”或“阶段”上都使用过“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概念。“社会基本矛盾”的使用情况也是如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既是整个人类社会全“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又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中的“基本矛盾”。这不是概念上的混乱，而是在分析现实的复杂矛盾过程中，在“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个意义上，运用概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它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因为，“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第631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318页。
④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7页，第387—388页。

质的"矛盾；[①]主要矛盾也是"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矛盾，也就是"取得支配地位的"决定过程性质的矛盾；[②]根本矛盾也是规定"过程的本质"的矛盾。[③]另外，在毛泽东看来，过程是由阶段组成的，过程和阶段的区别又是相对的；过程和阶段的诸矛盾在地位上都有支配或被支配之别，所以他在"支配地位"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过程或阶段上，都使用过"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概念，而在《矛盾论》中分析矛盾地位的特殊性时，则是用"主要矛盾"来表征"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并无特指"阶段"的"支配地位的矛盾"的含义。综上所述，毛泽东在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表征"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时，表现出了原则性（即在一个意思上使用）和灵活性（使用三个概念）的统一，简洁性（在专门的理论阐述时使用一个概念）和丰富性（使用三个概念）的统一。

关于主要的矛盾方面问题。

毛泽东还十分注意研究在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区别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是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的。

还在阅读西洛可夫本时，毛泽东在批注中就指出，不论是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如果平均地去看任何矛盾之两方面，那就是大错的。两方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他一方是次要方面，前一方面即所谓矛盾之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汉诺夫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7—388页，第376、387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2页，第314页。

的错误说法；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他还指出：“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究竟那一方是主导的呢？这要看过程之发展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规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①

在《矛盾论》中，他进一步用不平衡是绝对的理论来论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及转化。他指出，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因此，“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②

他还把矛盾主、次两个方面的斗争和转化，与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指出，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到大，上升为支配地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到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为新事物的性质。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③

毛泽东从事物矛盾双方发展的不平衡性出发，强调矛盾的主次方面相互转化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矛盾论》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述，他说：“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8、90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第323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 对这一段论述，国内外有人认为，这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是唯心主义。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这段论述，它不仅可以成立，而且是深刻的。两者虽然都用了"决定"一词但意义又是不同的。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

者是指规定，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生产力规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经济基础规定的，而不是相反。这是唯物论。后者是指决定性的环节，是说在事物发展过程的链条中，当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进一步发展，不改变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不能发展，这种改变就成为事物发展链条上的决定性环节，这种环节是轮流变换的。这是辩证法。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变，它们的发展方向和性质，仍然分别是由生产力、经济基础规定的，是后者的要求，被后者所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也有一些类似《矛盾论》中的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但在一定条件下，“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①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是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正确理解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们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方面，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非主要矛盾方面，逐一解决非本质、非主流的问题。并且还要注意把重点论和两点论结合起来，反对均衡论和一点论。防止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不注意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5. 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普遍的、绝对的；但矛盾的斗争形式即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有条件的、特殊的、相对的。由于矛盾的性质和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矛盾的斗争形式也有所不同，所以要研究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解决矛盾的方法区分为对抗和非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抗两类形式。而且特别注意研究了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 毛泽东从党的历史上总结了这一方面的经验教训。建国以后，这一理论又有了发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列宁认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不能把它和矛盾等同。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在《矛盾论》中，提出了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随着研究的深入，把对抗作为矛盾的一种"性质"一种类型来研究。他提出了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别及其相互转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②这也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行的提法。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既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对列宁关于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的思想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按照列宁的思想，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斗争形式）解决的原则，研究矛盾斗争形式，研究对抗这一斗争形式，必然要研究矛盾的性质问题，因为不了解矛盾的性质，是无法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来解决矛盾的。因而从研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3页。

“形式”进展到研究“性质”，提出区分“对抗性矛盾”及与之相应的“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研究的结果，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之所以十分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理论，是因为“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①

毛泽东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理论的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我们认为，他研究的方法有以下特点：首先，他把事物作为矛盾的系统，它的内部是一个有层次、有结构的整体。从纵向分析，各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都有它的特殊性。从横向分析，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这些方面又有主、次之分），都有它的特殊性。这样，毛泽东经过科学的分析，十分严谨地建立了一个分析现实的复杂矛盾特殊性的逻辑体系。其次，矛盾特殊性的理论渗透着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依据毛泽东的论述，我们分析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或一个阶段，必须首先分析这个过程或阶段中所包含的各个矛盾的特殊性，以及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然后再把这些对事物各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以便在总体上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进行分析和综合。再次，矛盾的特殊性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理论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使唯物论和辩证法高度结合。毛泽东强调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①] 只有克服了这些主观主义的东西，才有可能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并运用特殊的方法加以解决。而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也正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使列宁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的原则具体化了，是对列宁这一思想的发展。

三、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具体阐述

《矛盾论》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之后，紧接着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这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入和展开。了解任何矛盾都具有的这两个基本属性，即同一性和斗争性，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现实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本来并不纯属矛盾特殊性问题，不过《矛盾论》的结论指出，同一性表现了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斗争性表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可见这仍然和矛盾的特殊性有关。不仅如此，《矛盾论》在这一节中，还直接指明："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②]在具体论述中没有另外指明复杂矛盾属性的特点，可以认为这里的论述对单纯矛盾和复杂矛盾都是适用的，上述引文也说明了这点，所以还是可以认为这仍然可以包括在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之内。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对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有不少的重要论述。30年代的苏联哲学教科书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第327页。

对此也有一些发挥。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继承了列宁的思想，也参考了苏联教科书中一些论点和论据。但从根本上说，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如果说，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是对作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表现出的复杂矛盾特点在哲学上的概括的话，那么，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理论，则是对中国革命矛盾诸方面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等的内容的哲学理论上的升华。毛泽东以此来丰富唯物辩证法理论，发展列宁的有关思想。

（一）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论述的基础上，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① 在读西可洛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中，毛泽东对矛盾的同一性下过两个定义。一个是："对立的两方面相互结合，并转变到新的对立，即所谓相互渗透。"又说：过程中主要矛盾与若干其他次要矛盾每一种矛盾之两方面之运动，那些方面的被制约性，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可动性，以及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相互转化。"辩证法研究这许多，就是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② 可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7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6、81—82页。

毛泽东比较一贯地把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称之为同一性。而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即是指复杂事物中包含的主要矛盾和若干次要矛盾的诸方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矛盾论》和30年代苏联教科书不同，不是用“对立的互相渗透”作为标题，而是使用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标题来论述有关内容，意在突出表示研究现实的复杂矛盾各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而不是纯哲学理论地研究矛盾的两种属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运用了大量的例证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情形。指出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因为矛盾着的诸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苏联哲学界因受斯大林形而上学的影响，不能彻底坚持矛盾同一性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作过深刻的批评。从而恢复和发展了列宁的“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思想。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① 在这里，毛泽东把矛盾着的两方面，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当作矛盾的同一性，并且申述了他的理由。他举了大量的事例。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又如，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等等，都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为什么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属于矛盾的同一性范畴呢？毛泽东解释说，矛盾双方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① 这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桥梁，如果没有它矛盾双方又怎么转化呢？由此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坚持了矛盾双方互相转化是矛盾的同一性的表现的观点。

矛盾转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②矛盾转化的思想鲜明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有转化才有发展，才能进步。因此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③ 建国以来的40余年的历史，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在矛盾转化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他说：“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④后来毛泽东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

---

①②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9页，第330页，第332、333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398页。

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 毛泽东指出过，中国由穷国向富国转化，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由此可见，条件在矛盾转化问题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否认条件而谈转化，就势必在哲学上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在政治上犯“左”的或右的失误。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在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上，直接继承了列宁的一些论述。同时，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其中，“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等，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有极为明显的影响。

（二）矛盾的斗争性

什么是矛盾的斗争性？在《矛盾论》中也有过论述，如说：“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② 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指的是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性质和趋势。在《矛盾论》中，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相联系地加以说明的。二者不是割裂的。毛泽东讲的很清楚：“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③这就是说，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或依存，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即斗争性的对立面和互相联结或依存；矛盾着的双方的斗争性则是相互联结或依存的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性质和趋势。如不这样理解，则会陷入形而上学割裂二者关系的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②③ 同上书。第1卷第327页，第328页。

从《矛盾论》对矛盾的斗争性的界说中可以看出：哲学上的斗争性是一个极为广泛的范畴，它不仅与其他具体学科或日常生活中的“斗争”概念含义不同，而且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过去有的人把斗争性仅仅局限于“敌我矛盾”或政治斗争，这是明显的失误。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概括地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列宁论述的基础上，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

《矛盾论》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的相对性。毛泽东指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① 为什么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呢？毛泽东作了如下论证：“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② 矛盾的同一性的存在是与一定的条件分不开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矛盾双方才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

《矛盾论》论述了矛盾的斗争性的绝对性。毛泽东指出：“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③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变动性是绝对的。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依据列宁的思想，从发展、运动的绝对性来论证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332页。

②③ 同上书。第1卷第333页。

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①]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②]

毛泽东不但论述了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斗争性的绝对性，而且指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矛盾论》指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他在《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又说："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③]毛泽东这些论述，进一步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认识，毛泽东在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作出了精确的表述。他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④]又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2—333页。
②④ 同上书。第1卷第333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4页。

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1] 在这里，毛泽东坚持了列宁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但又作了完整的精确化的表述，不会使人误以为辩证法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由此也可以说明，那种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反对割裂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我们党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具体应用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原理，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我党各个历史时期在实行统一战线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作过哲学概括，他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2]正是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其他政策的配合，从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节　揭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说明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763页。

的思想；深化和丰富了对立统一规律本身的内容，建立了系统地分析现实的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而且创造性地揭示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辩证法的角度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

一、揭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指明“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这是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在辩证法上的集中概括，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列宁在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时论述了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来说，相对中有绝对。”他又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①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在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时，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创造性地把矛盾范畴同普遍性和特殊性范畴结合起来，提出和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光辉思想。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二者是互相区别的，是对立的，然而又是互相联结的，是统一的。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也就是把握二者的对立统一，反对片面性，反对形而上学。

首先，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是互相联结的，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毛泽东说：“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②又说：“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③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联结的观点，说明了每一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是矛盾的共性，它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是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第319—320页。

在的，所以是相对的。然而，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都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结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本质存在于特殊本质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相对中有绝对。

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联结，就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者抽象地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用来剪裁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而不是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他们不理解一般即寓于个别之中，共性即寓于个性之中，绝对即寓于相对之中，从一个极端割裂了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联结，走上绝对主义的错误道路。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忽视、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用局部的、个别的、一时的经验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不是把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从而使思想和工作具有原则性、系统性、创造性、予见性。他们不理解个别中即包含着一般，个性中即包含着共性，相对中即包含着绝对，从另一个极端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联结，走上相对主义的错误道路。

第三，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转化，从转化中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指出："由于事物的范围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

合则变为普遍性。”① 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对于一般阶级社会而言，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了。把握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就能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握一般阶级社会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我国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一般来说是特殊。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势必要涉及社会主义一般特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我国的特殊，然而它又突破了若干旧的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念，也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加深了对它的理解。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一般规律又是特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这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的一般论断，就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根本任务，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特殊，这一论断又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解。

第三，从认识过程阐明了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

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毛泽东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

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同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之间的关系。人类认识的运动秩序之所以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正是因为客观事物存在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互相联结。人们在观察认识客观事物时，既要在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研究新的特殊性。

毛泽东在这里对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们一方面，不懂得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必要性，不懂得认识了特殊，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不懂得认识了矛盾的普遍性，还必须继续深入研究新的矛盾的特殊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他们否认了并且颠倒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

我们也可以说，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关于认识过程的观念。他们既反对从特殊到一般，也反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9—310 页。

从一般到特殊，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就事论事，贬低、反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和它的意义。

毛泽东的论述对于我们在当今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因为它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大力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必须探索矛盾的特殊性。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实用主义。

毛泽东的论述，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的辩证法、认识论理论依据。

二、把握矛盾问题精髓的意义

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揭示出矛盾问题的精髓，科学地论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才有可能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使矛盾学说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矛盾的理论分析，而是发展为分析现实矛盾的理论形态，具有了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更重要的说明和发挥。毛泽东指出，不懂得矛盾问题的精髓，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没有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的自觉，在实践上就会这样和那样地陷入形而上学。

这里着重说明它的实践意义。

（一）它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辩证法依据

在《实践论》中，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作为认识论论述的结论。

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是和上述认识论的结论相对应、相联系的。这体现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中。

实事求是说到底就是要从“实事”中“求”得事物的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事物的固有的规律，都是具有不同质的特殊规律。特殊规律并不能从一般规律中纯粹用逻辑的方法推演出来，因为一般并不能完全包括特殊。这就要坚持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臆想出发，要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通过实践去认识这种特殊规律，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认识论的要求。为此，就要通过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客观实际的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即普遍规律的指导下，分析综合这些材料，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到事物的固有的特殊的规律。这是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普遍规律、共性就寓于特殊规律、个性之中。不以普遍规律、共性为指导，有的放矢，就不可能找到特殊规律、个性，实践就成为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实践；不把普遍规律用来指导人们去探寻特殊规律，无的放矢，普遍规律也就成为空洞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理论就成为脱离实际的理论。这都达不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达不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既要求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结合，又要求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要求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联结，要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达到实事求是，都不能找到事物的固有的规律性。人们的实践也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把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制定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辩证法依据。

（二）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辩证法基础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① 普遍真理，这是普遍性、共性；本国实际，其中含有的是特殊性、个性。两个方面必须结合，结合就是以普遍性、共性为指导去把握特殊性、个性，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就是要把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就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之中，而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并不能完全地包括在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之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揭示的是一般规律，一般规律就寓于中国革命特殊规律之中，但特殊规律又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规律之内。问题就在于要以一般规律为指导，找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从而找到中国革命具体的因而也是特殊的道路，这就要由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独立地通过实践去探寻这种规律和道路。在这里，空谈马列主义理论，照搬外国经验，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只能招致革命事业的挫折、失败。为了解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为了找到和论证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批判了主观主义，从理论上解决了一系列认识论问题，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认识论命题，又批判了形而上学，从理论上解决了一系列辩证法问题，提出了把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一辩证法命题，在实事求是的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246—247页。

路线中把二者联结起来，这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围绕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从辩证法角度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严格的批判。他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①用一种公式到处硬套，这是形而上学，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②，这是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在实践上的结论。

为什么教条主义者陷入形而上学的公式主义？他又围绕矛盾问题的精髓，从认识论作了揭露。他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在《实践论》中也是从认识论进行批判的，在那里揭露的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依赖于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在这里也从认识论上作了批判，揭露的是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抽象公式，否认并颠倒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不懂得两个认识过程的联结。二者也是相对应、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310页。

相联系的。后者除了有与前者相重合的内容，它还是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角度揭露的，并且提出了在两个认识过程中这种关系表现出的特点，强调了它们的联结。在《实践论》批判的基础上，再加上《矛盾论》的这些批判，就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教条主义在哲学上的错误。与此相对照，这对我们从哲学上了解另一方面的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是有意义的。

把在这里提到的认识的两个过程联结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式："特殊——一般——特殊。"这又是和《实践论》里提出的认识的两个阶段的公式："实践——理论——实践"相对应、相联系。人们也就按照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公式，从具体实践去了解特殊；再从特殊上升为一般，由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丰富、发展原有的理论；而后再由一般到特殊，以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的理论更为有效地指导实践，并探索和研究新的特殊。由此可见，这种过程也是发展认识、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不仅是引导我们的实践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许多革命指导者都对此作过论述，周恩来指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如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如此。

这样，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基础。

(三)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也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马克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01 页。

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辩证法思想基础。

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部门，应当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自己的实践情况结合起来，制定实施的具体方案，既要遵守党的方针政策的各项原则，又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这正是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原理所要求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许多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要以它为指导，结合自己的特殊情况加以执行，在执行中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它。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

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对待上级的指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就是照抄照转，生搬硬套，盲目地执行。毛泽东对此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② 在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③ 二是借口情况特殊，放弃一般原则，违背上级指示的精神。这也是极其错误的。它也背离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13页。

原理。特殊性中包含有普遍性，因此任何地方和单位，都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放弃原则不仅是政治性的错误，而且也是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错误。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为我们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确理解和创造性地执行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分析和处理世界格局变动中各种复杂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重要的辩证法思想武器。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矛盾分析方法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是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同各种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它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一、反对形而上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作斗争中，同时也批判了他们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

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①《矛盾论》贯串着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并且先后七处直接批评教条主义者对待矛盾问题上的形而上学错误，几乎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党内形而上学思想。他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思想理论上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②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彻底批判了主观主义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表面性观点，以及形式主义作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上又提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批评他们错误的同时，也要肯定他们应该肯定的方面。他批评党内存在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思想，指出，许多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③这样，延安整风就既反对了主观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又防止了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犯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这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的重要条件。这也是我们党达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全党也就以这样的高度统一，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在3年的时间里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也是用辩证法克服了形而上学得来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939页。

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重要经验。

50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又对形而上学在新形势下的表现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例如，针对在学习外国建设经验上的新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①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批评了向外国学习上的形而上学态度，指出："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在评价我们党的工作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③在60年代，鉴于"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的领导人都强调要掌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1961年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④ 1962年陈云提出"全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以便使全党干部认识更正确。⑤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复提倡学习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1963年提出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自己的工作，反对一点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中央和各地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第401页，第41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314页。

⑤ 参见《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179—180页。

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①

毛泽东不但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形而上学思想，而且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形而上学思想。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我们党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发表“一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形而上学态度和做法，坚持对斯大林的功过作辩证的分析。在这一前提下，对斯大林本身的形而上学错误，也作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又一次表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法的成熟运用。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想的批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矛盾，否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指出，后来在他逝世前一年虽然吞吞吐吐地承认了矛盾，但是仍然没有把它“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②(2)否认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指出：“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象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③(3)割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第347页。

裂对立面的统一和对立面的斗争的内在联结，否认对立面转化的普遍性。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并指出，“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4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毛泽东指出，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只是互相排斥，不能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根本错误的。[①](4)指出了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危害性。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又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②]联系到斯大林最初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后来承认了有矛盾，但也没有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③]联系到当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事实，我们回过头来重温毛泽东1957年这些教导，特别是关于天下稳固与否的见解，不能不使我们进一步领悟到，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一切实际工作，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实践表明，这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成败攸关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第347、348，第356页。

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并且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反对和克服了以往的错误，包括形而上学的错误，以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制定并且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一句话，反对形而上学，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却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从上述可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在说明，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懈地对形而上学思想进行批判，是坚持唯物辩证法，搞好革命和建设工作的重要思想前提。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对形而上学的批评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系统的全面的。

首先，毛泽东从理论上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实质及其基本特点。前面已经说过，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形而上学是和辩证法相对立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其实质是否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① 当然，党内形而上学思想不是哲学史上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或在机械唯物论中的那种以系统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而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与主观主义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倾向。

毛泽东把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三个特点与其否认矛盾的实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片面性是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最突出的表现。他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① 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② 和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相对应，他把片面性叫做一点论。他说：“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片面地看问题”。③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把表面性也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给以批评。他指出：“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④即只从现象而不是从本质看问题，只从形式而不是从内容看问题。这种看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一部分同志当中曾相当盛行。毛泽东深刻地指明：“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他说：“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⑤这也就是说，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离开了辩证法，也就离开了唯物主义。前面说过，我们的同志并不是信奉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而是由于没有辩证法的自觉，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在思想方

①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313页，第313页，第313—314页。
②③ 同上书。第5卷第412、413页，第320页。

法上具有形而上学倾向，陷入主观主义——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的表现。毛泽东的揭示有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毛泽东把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一起，作为产生党内错误的思想根源而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毛泽东分析了党内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中的形而上学表现。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① 教条主义者只有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实际知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抽象公式到处乱套；经验主义则满足于自己的狭隘经验，偏于局部的感性知识，缺乏普遍的理性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②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过，教条主义者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这样，毛泽东也就从思想方法上揭露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犯错误的共同原因，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③

党八股、形式主义也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④ 党八股作起文章或讲演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⑤他指出，这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

①②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第818页，第833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423页。
④ 同上书。第1卷第313页。

方法，它既不提出问题，不指明矛盾的所在，也不分析问题，不分析矛盾，也就不能提出解决问题即解决矛盾的方法。刘少奇也批评和分析过这种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在 1937 年 5 月《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中他就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地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它使我们机械地处理问题，一切工作公式化、刻板化，使我们许多同志毫无生气，不去思索问题、考虑问题。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又说：“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一再批评了这种形式主义方法和作风。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中，还指出了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具体表现。例如，对待苏联的经验不加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它的一切；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关系即矛盾，片面突出某些方面而不顾及它们的联系，畸轻畸重而不注意平衡，只注重局部而不顾整体，以及不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套用一种公式等；对人、对工作、对好事或坏事等的评价上，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② 等等，等等。这些无不是思想方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71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3 页。

法上片面性的表现。从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到党的“八大”，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60年代初期，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强调了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各方面工作的矛盾的重要性，都强调了克服和反对形而上学的必要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揭示了形而上学思想对党的事业的严重危害性，阐明它是“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根源之一，而且分析了党内形而上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党内形而上学之所以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共产党处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并且又有大量的党员出身于这个阶级，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到党内。因此，党内形而上学植根于小资产阶级这块广大的土壤之中，它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狂热性和片面性”在政治上和其他工作中的表现。毛泽东还指出了产生党内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根源。这就是他一再指出的，在辩证的复杂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片面性，而要害就在于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不懂得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抛弃了辩证法。形而上学是他们理论和实践相脱节，导致犯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论坚持矛盾分析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它的矛盾学说，而且把这种理论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了广泛的作用。

（一）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及其对立

的实质

毛泽东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与此相反，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是在前面已经说明了的。宇宙观转过来就是方法论，两种对立的观点转过来就成为方法，形成两种对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对待事物，也就成为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对立的辩证方法。这也是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了的。

前面也说过，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岐、对立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矛盾，是否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这样，矛盾分析方法也就成为辩证方法的实质和主要内容。毛泽东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①] 这也就指明了掌握辩证法理论、矛盾学说的实践目的和意义。为此，就要把矛盾学说化为方法。

作为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提出和坚持把握事物的"二重性"、"两点论"、"两分法"等方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方法，并对此作了精辟的大量的论述，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关于矛盾分析方法的实质

矛盾分析方法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模范地运用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330页。

矛盾分析方法，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入手，分析了商品交换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列宁把矛盾分析方法列为辩证法的要素之一，并运用它来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运动，写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许多出色的著作。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矛盾分析方法本身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即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提出问题，就是对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作大略的调查研究，了解矛盾所在；分析问题，就是对矛盾各方面作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解决问题，就是把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指明矛盾的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①]现实的事物包含的矛盾常常是多方面的，是矛盾诸方面的统一体，是复杂的矛盾。无论是只包含着一对矛盾的单纯事物、过程，还是包含着一对以上矛盾的复杂事物、过程，都要经过这种分析，才能进行综合，来具体判明矛盾的性质，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观察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一文中，把“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②]列为辩证法要素之一。毛泽东的论述，是对这种思想的发挥、具体化。

列宁又说：对立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③]无论是单纯事物还是复杂事物，经过分析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7页，第712页。

和综合，都是要具体地揭示出其中含有的这种矛盾着的倾向，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地位。这样才能如实地指明矛盾的性质，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对策。“一分为二”等方法也就是要揭示这种矛盾着的倾向。

事物的状态可以是多样的，（有人据此主张提“一分为三”如人群分为左、中、右。其实这只是指现象的状态。）事物系统中的要素可以是多数的（有人据此主张提“一分为多”，其实这只是指构成的多成分），但就事物、系统、过程中包含的“倾向”或者说“趋势”、“基本力量”而言，则只能有二，只能是矛盾着的对立的两个方面。单纯事物是如此，复杂事物也是如此。否认了这点也就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

这样，矛盾分析方法的实质也就是经过对事物的矛盾着的方面的分析，加以综合，发现互相矛盾着的倾向，指明矛盾的性质，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以便通过实践促使矛盾转化。

这也就是以矛盾普遍性原理为指导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是实事求是即从分析“实事”中“求”得“是”的方法。

（三）关于矛盾分析方法和处理方法的多种形式

对立统一规律根据事物和问题的不同性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运用形式。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它作了灵活多样的运用，有各种提法和做法。

一是把握事物的“两重性”。

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

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①] 这种根据对事物“两重性”的矛盾分析，提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论述，是从它的雏型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后来的1946年《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8年《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发展而来的。这种科学分析是我们既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又要在行动上认真地谨慎地对敌的思想根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的原则，根据对事物的“两重性”的分析，无论是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既要有革命胆略，又要有求实精神，既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性质，决定了主观上必须采取的辩证的态度和方法。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作这种分析，必须采取这种态度和方法。

一是“两点论”、“两分法”。

毛泽东对矛盾分析方法，用中国的表述方式又称之为“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任何事物、人都要采取辩证的分析态度，反对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一是要全面地看待事和人，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这大体上也就是从黑格尔以来人们说的：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一贯坚持对事物对人要用“两分法”作辩证的分析，不要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对我们的革命工作，对我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

们的同志，不要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他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

毛泽东坚持运用两分法去观察和分析形势，而不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从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预见。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分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指出它有强大的一面，又有脱离人民、压迫人民、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是虚弱的一面。对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分析了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它现时是弱小的，但由于它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的利益和愿望，最终必将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结论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正是按照这种辩证法发展的。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也运用两点论加以分析，认为它的长处是战争力量强，而其短处是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以及人力、物力之不足、国际上之寡助。在中国人民一面，短处是战争力量弱，而长处是战争本质的进步性、正义性，以及国家大、国际上多助。这样全面地分析，结果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的全面的科学的结论。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它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它们是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因而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成绩和缺点、正确与错误，毛泽东也坚持运用"两点论"进行分析。例如，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他提出要坚持两点论，一要看他的错误方面，二要看他的正确方面，因而要一看二帮，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①

毛泽东说：“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②1963年在他起草的党内指示《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中说：“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③ 只有对工作对人、对他人对自己都采用两分法，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才能促使矛盾转化，达到工作的不断发展和人的不断进步。

毛泽东哲学思想一贯坚持“两点论”，全面地看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片面性。

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④ 还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⑤

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看问题，但同时又要指出两点当中的重点，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根据矛盾和矛盾双方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3页。
④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第285页。

地位的主要和次要，正确地抓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做好重点工作，带动全面的工作。否则，就不能解决复杂的矛盾。当然，在强调重点论时，也必须注意它是两点中的重点，不可搞成一点论，同时还应注意重点和非重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不能僵化。

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历来告诫人们要做到全面性，防止片面性，提出过不少克服片面性的办法。在这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的陈云在一九六二年提出的全面、比较、反复等几个方法，对于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有很重要的意义。陈云指出，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要做到全面，就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从反面或各个侧面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要和现行的、过去的以及国外的进行多方面比较，这样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更准确。反复，就是作比较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要进行反复考虑。

除以上所说的把握事物的“两重性”、“两点论”、“两分法”之外，我们还采取“两手抓”的工作方法。

前面讲到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时，已经讲到毛泽东提出要有两手，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党强调了两手抓的工作方针和方法。这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也是建立在矛盾分析方法之上的辩证法的工作方法。

新时期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工作的中心，这也就是说要围绕这一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既要有物质文明的建设，又要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二者是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忽视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党的方针是，物质文明

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在注意物质文明建设时，工作中曾出现过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缺点，产生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党中央强调两手都要硬，以便克服这方面的缺点。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总方针，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强国之路。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就要认真对待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为此，他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1] 在这里也要两手抓，也不能有片面性。

提高贯彻执行这些“两手抓”方针的自觉性，就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

以上我们对矛盾分析方法和相应的工作方法，作了列举。它是贯穿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全部科学著作和党的全部革命活动中的。今后在工作中还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方法。

（四）关于坚持科学的矛盾分析方法的必要条件

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做到对事物的矛盾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这是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的。忽视或违背这种条件，就不能达到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以至犯各种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此作过许多重要阐述。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59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用矛盾分析方法时一定要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原则，反对主观随意性，坚持辩证法和唯物的统一。

列宁把“观察的客观性”列为辩证法的第一条要素。[①] 毛泽东在论述和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时，特别强调要坚持这种客观性的原则。他在《矛盾论》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方法。”[②] 在《论持久战》中，他又指出：“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③]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次指出：“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④]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反复强调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要坚持客观性原则，一方面，是因为这是由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它坚持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内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定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矛盾的性质，找出正确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内教条主义者主观随意地对待客观现象中的矛盾，不懂得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时，必

---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447页。

④ 同上书。第5卷第401页。

须对现实的复杂事物作精细的艰苦的具体分析。教条主义者空谈辩证法，主观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矛盾和矛盾的变化，导致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毛泽东要求人们要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客观地具体地分析具体的矛盾。

为了把辩证法同唯物论统一起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必须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客观事物本身，必须把矛盾分析建立在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反对片面性和表面性。

没有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就不能客观地、全面地了解矛盾诸方面互相联结又互相斗争的特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客观地全面地分析旧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复杂矛盾，为中国革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国情作了深入、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又因为对事物进行矛盾分析，目的是要了解事物的矛盾的本质，达到对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就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当人们获得了对矛盾本质的认识之后，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之后，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补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实际中各种矛盾的分析，就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实践逐步达到客观的全面的认识的。毛泽东在指导民主革命中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实践，深切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因而在运用这一方法时，能够做到实事求是，把握民主革命的规律性。教条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只有片面的表面的了解，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分析实际的矛盾，因而不能不跌跤子。1957 年毛泽东对这方面的经验作了总结，他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

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①

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必须坚持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并不断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

坚持科学的矛盾分析方法，首先要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包括矛盾分析方法，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得到坚持。否则，就难以做到科学地运用两点论、两分法。1945 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②指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③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指出，片面性、绝对化的方法，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克服主观主义、片面性，必须增强党性。1964 年周恩来曾经指出：“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④可以认为，这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说明，失去了科学态度，就不能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就要犯片面性错误。此外，还有一个作风问题。只有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相信和依靠群众，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13—414 页。

②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993—994 页，第 996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38 页。

断地总结经验，方能有效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克服片面性，做到全面地看问题。相反，如果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作风，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不了解实情，光听汇报，就发议论，作决定，这样就必然要犯片面性的错误。为了更好地坚持两点论、两分法，还要加强辩证法的学习，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影响。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要掌握和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而在晚年他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包括严重的片面性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他犯错误的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从坚持科学的矛盾分析的条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探索，也就是“对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另一方面，他又逐渐骄傲起来，“头脑热”，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态度，离开了“观察的客观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也就不能不陷入主观主义，犯下严重的片面性错误，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科学的矛盾分析原则。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证明了毛泽东倡导的矛盾分析方法的科学性、重要性，都显示了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是通过不断克服矛盾前进的，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矛盾分析方法，善于运用这一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方法。

第三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另一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要解决在这一“结合”中提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问题，而且要解决有关的社会历史理论问题。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统一、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联结，要体现为唯物史观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身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奠定了直接的社会历史理论基础。

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是在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时起，人类才真正走出了历史迷宫，历史科学才获得了与自然科学同等意义上的客观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才得以确证，社会主义才由空想成为科学。

大约在70年前，唯物史观通过俄国革命被介绍到中国；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探求中国革命道路的哲学根据。于是，一个恢宏的历史进程就在下述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现实历程，一是作为这一现实历程的理论表现的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生命历程。从这种意义上说，

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决不是唯物史观经典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并实际地向前推进了唯物史观。

在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具特色的理论观点是：（1）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特殊意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2）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3）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活动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众路线的理论。

第一节　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

无论就何种意义上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特别是列宁的著述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已经得到相当深刻的阐发并且以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表述出来。无疑，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尝试改造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时候，置放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部完整而严密的关于革命的“一般认识逻辑”。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一般认识逻辑”揭示出中国革命这一“特殊逻辑”。这个事实规定了作为中国革命“特殊认识逻辑”的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必然具有下述特点：它的全部理论兴趣抑或理论研究的中心，并不在于超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或突破经典理论框架，而主要着眼于理论本身的社会认识功能即方法论意义。换句话说，它不限于在学理上一般性地阐发那些已经由个别上升为普遍的结论，而是力求使这些普遍结论能够在探求中国革命的“特殊逻辑”中再现出来。

根据这样一个思路，可以说，毛泽东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把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转换为审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论，科学地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从而阐明了与一定历史时代相联系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道路、动力和前途。

一、国情分析与中国革命性质及其道路的揭示

在历史尖锐冲突和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一切试图有所作为的党派，在思考本国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时，不能不确定它们所将从事的政治变革的性质及其实现的道路的问题。然而究竟什么才是判定革命性质以及选择革命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一切真正的社会革命，其终极原因、变动规律和实现途径，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去寻找，不应当在个人或党派的意志力量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毛泽东把深藏于社会经济事实中并决定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的基本因素称之为国情，即社会性质。他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有必要指出，毛泽东一向认为，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国情，总是与一定的实践主体的活动相联系的。因此，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具有首要意义国情要素，主要不是指构成中国自然客体诸如地理环境、物产资源、人口状况等要素，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是指那些决定中国社会客体状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关系等要素。概括地说，所谓中国国情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一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实际状况。因为，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就无从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同样，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实际状况，也无法选择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的一系列分析，就是围绕着上述两方面问题展开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中国的民主革命，始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经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历时半个多世纪；尽管这些运动并不乏革命的激情和勇气，也不乏救国的理想和方案，但均以失败或流产而告终。仅就社会认识的角度看，这些运动的失败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运动的领导者或政治集团，受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不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不懂得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能也不可能寻找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出路。

如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所领导的改造中国的政治实践一开始就蕴含着悲剧性的结局，那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造中国的政治实践一开始就预示着一种希望和可能。因为这个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工具。然而，历史认识从来不是原则与实例的简单相加。有了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就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更

不等于批判的对象。这对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近代中国是整个东方各种矛盾的交错点；帝国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各种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画面。而相形之下，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又必须埋头于紧张而迫切的实际斗争之中，理论准备相对说是不够的。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之中，就表现为一个复杂而曲折地演进过程。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共初创阶段，甚至未能把中国革命性质与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思考，还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党的“二大”尽管对中国社会性质首次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确认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就整个全党来说，还是肤浅的而不是深刻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甚至还包含着许多谬误之处。因此，当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性质的认识又出现反复甚至倒退，认为现实的革命斗争，已经超越了民主革命范围，革命进程将急转直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① 直到党的“六大”，中国共产党才在思想上搞清了中国革命性质与中国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重新确认了中国社会性质，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后经过土地革命实践和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才真正完成。毛泽东在30年代末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最终以完备的理论形态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

① 参见《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史特点。

毛泽东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3000年左右；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社会才逐渐地生长出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开始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逐渐地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由此就规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在完成了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才能进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度不平衡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革命道路。

革命的形式以及道路问题，就其实践意义而论，其重要性并不下于革命性质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政党，若要成功地指导革命，仅仅把握革命赖以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据，从而确定革命“是什么”，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确定革命将采取何种形式以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为此，就必须把握决定革命形式以及革命道路的社会历史根据，即社会经济、政治运动的实际状况。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①] 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由来以久。早在党的创立时期，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就阐发了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共产党人要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非夺取政权而不能。而"历史上凡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②] 中共"一大"也把"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写入党的纲领。从"二七"罢工失败和"五卅"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到国共两党合作和北伐战争兴起，中国共产党日益深化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理解。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未能始终坚持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没有充分利用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利时机，以主要力量去组织和发展自己直接指挥的革命军队，"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③]

大革命的失败，从实践方面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并由此开始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伟大历程。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确立了武装斗争的目标，还不等于解决了怎样实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辛的探索过程。

在中外近现代史上，社会革命的一般模式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控制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后再由城市逐步向农村扩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诸如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俄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② 《毛泽东书信集》第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

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如此。这似乎成了一切革命的经典模式或必由之路。它曾一度束缚了尚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从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和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城市中心论”的议案，到 192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 200 多次武装起义，其中凡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尝试都相继失败。

毛泽东率先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打破了原有的革命道路的模式。他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大胆地提出并亲自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形成了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科学理论。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岗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这一创造性理论的代表作。

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的总根据，就是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相联系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四种并存现象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封建经济还大量存在。这是造成一切“不平衡”的根源。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一些大城市，因而那里不仅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成为反动统治的中心。而在广大农村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半封建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小

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地方性，决定了农村长期与城市隔绝并不依赖于城市而存在。这就造成了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中国社会政治上也是十分不平衡的。中国是一个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① 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在中国的利益与为争夺中国统治权的中国各派军阀、政治派别勾结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统治阶级、集团的分裂，“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②这种政治上的不统一和不平衡，就为革命发展造成了可乘之机。当由不同帝国主义支配和操纵的军阀之间发生对抗和战争时，革命力量就有可能在革命基础较好的而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迅速发展起来。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敌我力量强弱悬殊的不平衡。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革命力量还很弱小。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积聚才能足以战胜敌人。然而在城市，由于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议会可利用，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革命力量难以较大地发展。所以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③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根据地，促使敌我力量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页，第188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542页。

毛泽东所创立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的革命，而且，它对于那些与旧中国条件相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革命也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

二、阶级分析与中国革命动力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证

就中国革命的实际认识进程而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道路的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领导权的问题，都是根据现实中国国情提出并解决的。然而，就解决问题所涉及的方面和运用的方法而论，前一个问题更侧重于对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政治、经济的矛盾运动分析，而后一个问题更侧重于对社会的阶级状况以及阶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分析。这里我们将毛泽东关于国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阶级分析作一专门探讨；尽管这种区别只是理论叙述的需要，实际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关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分裂为不同阶级集团这个基本事实，并不是他首先发现的。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他发现了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从而揭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列宁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①他还指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② 毛泽东的阶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40页。

级斗争理论，正是以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为依据，缜密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基本关系，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以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确立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一种完备的理论，就其内在结构而论，大致包含三个彼此相关的层面，即理论观念（观点）、方法、实践观念（方针、政策或策略）。理论观念是理论的精神内核，实践观念则是理论观念的具体化，方法是理论观念向实践观念转换的中介。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完备的理论。其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其方法是独具特点的阶级分析方法，其具体化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注重阐发阶级斗争理论。早在中共建党前夕，李大钊就指出，阶级斗争犹如"一条金线，"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①]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宣言》通篇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②]毛泽东也谈到，他在20年代实际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应当说这个认识贯穿中国革命过程始终。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作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③] 他把阶级斗争观点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把是否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作为划分两种历史

---

① 《李大钊选集》第177页。

② 参见陈独秀：《马克思学说》。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

观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论点是深刻的。

无庸赘述，阶级斗争不是唯物史观的唯一内容，也不能把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作为判定两种历史观的唯一标志。毛泽东无意为唯物史观作一新的界说。他只是试图从一个角度阐发唯物史观，强调阶级斗争观点对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他看来，艾奇逊之流在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上之所以走向唯心史观，关键在于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道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诚然是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亦即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但是，它必然是通过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普遍现象（阶级社会）出发，就无法说明和解释中国革命乃至一切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

毛泽东这里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即把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和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巨大杠杆和直接动力统一起来，把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史）看作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改变所决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在解释阶级社会诸现象，特别是社会革命现象时，就不会仅仅看到经济因素并简单地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要看到阶级和阶级矛盾并使之归结于阶级斗争；并且，始终注意从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去把握。

有必要指出，毛泽东做出这样的论断，是与他把阶级斗争理论首先并且主要地当作一种社会认识的方法的思路相联系，而这又是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异常复杂的东方大国发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既不同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

那样单纯明朗，在那里，“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 又不同于完整的封建社会阶级关系那样稳固森严，在那里，建立在封建等级基础上的阶级关系总是在形式上发生周期性的变动；同时，它较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或完全殖民地化的国度的阶级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近现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派别、政治革命，无非是这一繁杂的阶级关系的某种反映。毛泽东认为，以往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效甚少，就是因为这些革命的领导者缺少分析中国社会的科学方法，认不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相互关系，因而不能把握和辨别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和领导者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谈到，他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后，立即把它转换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因为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回答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说，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

阶级分析，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不能满足于对阶级的一般的、抽象的认识，更不能简单地套用阶级划分的一般原则，而必须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分析就是社会调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告诫担负一定责任的领导者，必须把阶级分析方法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① 毛泽东本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撰写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几部专门研究中国社会和农村阶级状况的论著，堪称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的典范。这些著作不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做出科学的估量，从而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打上中国革命印记和毛泽东本人特点的阶级分析方法。概括起来说，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下述几个特点：

第一，从经济地位分析入手，把握各个阶级的质的规定性，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毛泽东在进行阶级分析时，首先注重的是对阶级的定性分析。阶级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是诸多规定的统一。但是，阶级的实质和划分阶级的依据，只能是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不能是阶级的政治思想抑或情感意志。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不同，反映了它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不同，归根到底，反映了它们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同。所以，只要把握了中国各阶级的不同经济地位，就不难判定它们在中国革命中充当的不同角色以及所抱的不同态度。据此，毛泽东指出，大致可以把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概括为以下几种：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 从整个中国革命过程看，只能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阶级由于其自身地位的脆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有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未完全断绝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经济上的联系，并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害怕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革命性与妥协性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不能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也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2]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也是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阶级，且又人数众多，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无产阶级是"中国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3]它人数虽少，但却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高度集中，故其所蕴藏的政治力量比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它的经济地位低下，一无所有，又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所以整个阶级都最具革命性且又"特别能战斗"，因此"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4]毛泽东正是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的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首要的或基本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即"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第5页。
③④ 同上书。第1卷第8页。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

第二，注重对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把握复杂的阶级状况，从而为党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和策略提供可靠依据。毛泽东不仅把整个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的复杂机体，而且还认为，每一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不同阶层或社会集团。这些阶层，一方面由其所属的阶级本性所规定，另一方面又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认为，掌握阶级分析方法，无非是让我们“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看待社会，既要看到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状况，又要看到每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状况。他在1956年9月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因此，他们就不能了解农村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②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中，为我们进行阶层分析提供了实际范例。在这里，划界标准是相对的。例如，毛泽东根据代表的不同生产关系，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剥削程度高低，把地主阶级区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富农）；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把小资产阶级区分为有余钱剩米的、经济上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个层次；同样，农村半无产阶级也可分为上、中、下三个细别，即半自耕农（中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306页。

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资金的贫农、既无充分农具又无资金的贫农。毛泽东认为，每一阶级的不同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例如，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政治态度即可分为左翼、右翼和中派；农村半无产阶级的三个阶层，大体上是越下层的越容易同情和接受革命。从对各个阶级的分析到对各阶级不同阶层的分析，实际上表征着关于阶级状况的认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制订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理论依据。

第三，注重对阶级状况的动态分析，把握阶级关系的变化，从而适时改变党的政策和策略。就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来说，由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所规定的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阶级斗争格局是确定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由此决定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阵营。但是，毛泽东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① 当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国内阶级关系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原有的阶级斗争格局被打破，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各处都将发生或是扩大或是缩小的变化。例如，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② 这就决定了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反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254页。

命营垒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些属于其他帝国主义集团的买办资产阶级和部分受损害的地主阶级，也会暂时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阵线。那种认为“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①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这一分析已为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实践所证实。毛泽东还指出，在把握一个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时，既要注意由该阶级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立场，又要注意该阶级受革命运动影响而相对变化的政治态度。毛泽东曾经分析了小资产阶级这一情形，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平时与革命高涨时对革命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在平时，小资产阶级右翼对革命持怀疑态度，小资产阶级的中派则持中立态度；但是革命高潮来临时，不但小资产阶级左翼参加革命，中派也可参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也受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裹挟，只得附合着革命。毛泽东在批评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关门主义策略时指出，关门主义者把阶级关系看成一成不变的，他们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②毛泽东认为，这些说法都是形而上学怪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

第四，注意阶级的数量分析，既要把握决定各阶级性质的数量界限，又要把握各阶级所占的人口数量，从而正确估计阶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第154—155页。

级力量和阶级斗争形势。阶级作为经济关系的实体，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分析社会各阶级时，必须掌握决定阶级性质的数量界限。例如，对农村各阶级状况的分析，既要考察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又要考察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既要考察是否直接参加劳动，又要考察参加劳动时间的多寡；既要考察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又要考察剥削的程度与出卖劳动力的程度。这样才能严格地区分出农村的各个阶级以及各阶级中若干不同阶层，达到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性质的更精确、更具体的认识。在对阶级的数量分析中，除了上一种情形外，还必须注意分析各阶级的规模大小、所占人口比重多少，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① 毛泽东还根据中国阶级状况的数量统计指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占少数，农民阶级则人数众多。因此，"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② 无产阶级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获得占人口80%的最伟大的同盟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

军，借以组织雄厚的革命力量。

阶级分析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主要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史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阶级组织，是施用暴力的专政机器。他们还断言，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革命转变时期的唯一政权形式。毛泽东不仅完整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观点，还着重突出了它的方法论功能。他从作为构成中国革命力量的诸阶级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动状况中，探求未来政权的实质和形式，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创造。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从前清末年起，关于国家的问题始终没有搞清。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总是隐瞒国家的阶级实质，"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某一阶级专政的实际"。① 他说，要搞清国家问题，不能不涉及到"国体"和"政体"的问题。所谓国体问题，"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谓政体问题，也就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毛泽东认为，政体问题诚然是重要的，因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尤为重要的是国体问题，因为不懂得"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就无从确定国家的阶级实质。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第676、677页。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以及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历了工农民主专政，中经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从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从工农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的构想，不是随意的。“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因此，人民共和国应该“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① 稍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政权的建构，既不能以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归宿，也不能以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范本；而应该“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②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③ 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开始系统思考和深刻阐发新中国的政权建设问题。据薄一波同志回忆，“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④ 同年12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056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674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页。

次正式使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于第二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系统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政权形式。在这个专政中，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①还在于它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则是这一专政的基础，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新创建是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也为人民的一部分，因而在政权中也应有一席之位，尽管不能“占重要地位”。据薄一波、师哲等人回忆，毛泽东在1949年1月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向代表斯大林前来我国的米高扬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国的新政权中之所以有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需要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③因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人民民主专政看作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他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第1478—1479页。

③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上卷；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当由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过程时，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而产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又转而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直至今日。这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根据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三、时代分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历史必然性的论证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必然归宿，归根到底，决定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亦即它的基本国情。因而要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必须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经济的运行状况，阶级关系特点和阶级斗争状况。然而仅此是不够的。要全面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尤其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历史必然性的问题，还必须研究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国际环境，亦即时代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的扩张方式便获得了世界意义。整个世界的面貌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隔绝而自成体系的状态被一步步地打破，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所支配。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中发生的任何大的事变，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而且，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重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事变，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地发生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改变它们的发展方向及其历史进程；而无论它们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就决定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不仅决定于该国家的特殊国情，而且还决定于整个世界的特殊的“世情”，亦即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本国革命问题时，必须首先认清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因为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①] 列宁认为，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但是，“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②]等基本特征，是确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时代分析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活动的年代，正是“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他们不能不十分重视时代交替所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早在1923年蔡和森就指出，既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那就“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③] 稍后，陈独秀也指出，中国的资产

①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第123页。
③ 参见《蔡和森文集》第273页。

阶级民主革命已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① 中共“四大”也作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论断。毛泽东循着上述认识，对此给予更详尽更深刻的阐发。他指出，中国革命不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孤立现象，“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② 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反映。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断，站在新的历史时代的高度，从新的世界事变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第一，新的时代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崭新的特质，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近代世界历史曾经发生过两种前后相继的世界革命：第一种是业已衰落的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第二种是正在兴起的属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两种世界革命的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③，这是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④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已经超越了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⑤因为，在这种时代，无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是何种阶级、党派或个人，也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

① 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 37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1 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1 页。
④⑤ 同上书。第 2 卷第 667 页。

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①]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后来曾就这一提法作了某些修正。他在1958年9月2日会见两位巴西记者时谈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面临的选择，仅仅说成是要么站在帝国主义阵线方面，要么站在反帝国主义阵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这不完全正确。他指出，这种观点看来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就不适用了。这样的国家往往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参加帝国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的任何一边。[②]但毛泽东显然认为，他在当时的分析是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情况的。

第二，新的时代决定了中国革命领导权向无产阶级方面转移具有历史必然性，这就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可能。毛泽东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是“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虽然按其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却不是一般的或旧式的民主主义，而是特殊的或新式的民主主义亦即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新旧交替是以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性转移为首要标志的。他说，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在“五四”运动之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革命，但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中国无产阶级了，[③]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这种历史性转移决定了中国革命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1页。

②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0页注释，第672—673页。

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末，为什么革命领导权会发生这种转移呢？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的内部矛盾运动和世界矛盾运动双重因素决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中国无产阶级已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革命领导权转移的内在根据。而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①]在无产阶级已经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发展方向的时代，就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权转移能否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外部根据。

第三，新的时代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在其结果和终极目标上与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并竭力避免这一前途；它将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并且通过这一专政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还为时代的特点和国际环境所决定。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②]在这种时代，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中国要走欧美资产阶级的老路，不仅社会主义反对，而且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毛泽东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第680页。

殖民地国家不可能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帝国主义是依赖殖民地半殖地过活的，决不允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与之平起平坐。这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① 相反，通过新民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这条路诚然“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②因此，中国在实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后，应竭力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走历史必由之路，及时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

以上这些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形成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完整的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制定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直接的社会历史理论基础。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特别突出的是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的阐发，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置于突出位置并具有首创意义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根据列宁的说法，突出并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原理，并不取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第668页。

决于任何个人、政党或阶级的主观兴趣，而决定于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转变。

在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大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扩大和增进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应，在理论上亟待回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仍然存在着矛盾？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而且，在国际上，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在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上述问题上，也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精神，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入手，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不仅为解决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这一“特殊”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为解决整个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这一“一般”提供了理论方向，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高大醒目的里程碑。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这是包括斯大林和苏联党在内的国际共运史上长期未能搞清的问题。斯大林在1936年后，只是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克服了旧的剥削制度下产生的阶级矛盾，忽略甚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因此把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视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

力。斯大林晚年对苏联社会的现实矛盾有所觉察，但他只限于“羞羞答答”地承认矛盾存在，未能把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未能“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①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首先是由于“以苏为鉴”（事实上苏联哲学界在斯大林逝世后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无矛盾的论点有所纠正）即看到苏联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以及波匈事件等深刻教训。同时我们党在组织国内经济建设等方面也日益暴露出许多现实矛盾。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刚刚结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不久，就立即把这一问题置于自己的批判的视野之中。

作为一个辩证法大师，毛泽东从矛盾普遍性的观点出发，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论点，并且认为，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继续。他批评一些同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②他还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③ 否认这一点，乃是“天真烂漫的想法”。从 1956 年春发表《论十大关系》到 1957 年夏完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历时不过 1 年左右，毛泽东考察和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遇到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客观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一）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6 页，第 372 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14 页。

的基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之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上个世纪中叶制定的，尽管“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范畴是毛泽东在一个世纪后首次明确的。(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是毛泽东在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首次提出的；并在稍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给予透彻的发挥)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的研究，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适应——矛盾——桎梏——变革的基本图式。[①]本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成功地运用并证实了这一理论。

但是，当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产物的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以后，实践又提出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否还适用于社会主义？如果适用的话，它的特点和运动规律又是什么？列宁未来得及解决这一问题，斯大林交了一个不甚合格的答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做了理论上的巨大的努力，第一次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特殊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哲学的高度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动力的问题，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比较抽象到比较具体、由不甚深刻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过程。限于历史条件和时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代的主要任务，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不可能具体而详尽地探讨这一问题，甚至也不可能将其摆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尽管他们对此曾有过一些相当精辟的论断甚或是天才的预见（应当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时，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还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断定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新旧因素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列宁进一步断言：在社会主义下，矛盾仍将存在。）

解决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历史现实性，是随同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突出出来的。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和苏联党对此未能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充分研究，相反，竟然作出了错误的论断。1939年在联共十八大报告中，斯大林在宣扬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矛盾、阶级冲突时，提出："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① 他否认了苏联社会矛盾的存在，有的只是共同性，而"一致"则成了苏联社会新的动力。他陷入了形而上学。后来，斯大林在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旧制度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时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②由于这个提法出现在被收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产生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后果是不难想见的。斯大林晚年对这个问题有所纠正，说对此

① 《斯大林文选》第237页。
②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5、449页，第577页。

提法“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1] 但他充其量只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出现矛盾，并未真正意识到，恰恰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它们的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才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自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 他批评斯大林吞吞吐吐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3]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全面性的问题”，就是指规定并制约着社会一切矛盾存在和发展基础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才是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锁钥。根据毛泽东的理解，斯大林的问题似乎可以这样看，其主要症结在于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以至不承认矛盾本身的存在，因而不能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把这些矛盾归结到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因此，他在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就不能抓住实质和核心，就有意或无意地离开了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规律，不能把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贯彻到底。

毛泽东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这个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范畴首次明确了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动因理论具有极为普遍的意义，它不仅适用于资本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第356页。

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形态，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①另一方面，它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科学方法。社会主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崭新的制度。然而，如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上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就静态上考察，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要素构成的关系整体，并规定了社会基本结构；就动态上考察，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后一种考察，正是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范畴所要求的。循着这一范畴，我们才能用近似于自然史的精确程度来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总体，进而揭示其发展的规律及其动力机制。邓小平在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曾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贡献。他说根据这20多年的实践看，还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比较好，较之其他一些提法更为妥当。②

（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基本矛盾。但它们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又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征。不了解每一社会形态中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特点，我们就根本不能把握这一社会的本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研究，正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着眼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力求揭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示其运动的特殊规律。他在研究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现实矛盾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①]，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基本适合的前提下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状况。毛泽东有时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八个字来概括。当然这需要具体分析或说明。

毛泽东认为，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体而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导方面。这里所说的“相适应”，是指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制度较之旧制度“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②]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说，如果离开这一特点来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状况，就无法说明新旧两种制度实现历史交替的根据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③]；就不能解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并正在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事实，同样也不能解释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并巩固起来的事实。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

---

①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73页，第373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373页。

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是在总体“相适应”的前提下发生的“不相适应”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不相适应”或“又相矛盾”，毛泽东通常是在下述意义上使用的。其一是指制度的或体制的“不完善”。毛泽东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幼年时期，它的各种制度和体制还不成熟，这就会造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其二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方面的“不适应”。毛泽东一再强调，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然而，由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国家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这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从“适应”和“不适应”的联结上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状况。他认为离开“相适应”谈论“相矛盾”抑或离开“相矛盾”谈论“相适应”，都不可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应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适应中把握“不适应”，并且在解决这些“不适应”中去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适应”。换句话说，“适应”和“不适应”，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每一“适应”格局的出现，都是以“不适应”的解决为前提的，甚至从发展的眼光看，“适应”潜在的也是“不适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有“适应”格局将会被打破，而新的“适应”格局便会建立起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经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

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① 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它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也把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状况的认识深化了。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性质上与剥削阶级社会尤其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毛泽东在比较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之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② 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根据有两条：一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为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它在总体上或在根本上克服了旧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旧制度所无法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社会主义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体现者。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确立了劳动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成为维护、保障作为现实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劳动者的工具。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必然具有非对抗性的特质：它不再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剧烈对抗和冲突，而表现为新制度的逐步完善并更好地推

---

①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168 页。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2—373 页。

进社会发展的矛盾；它不再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和冲突，而表现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社会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有可能发生某种对抗性的冲突，但这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矛盾由非对抗性向对抗性转化的情形总是局部的、暂时的。究其主要原因，一般也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与领导者主观决策失误，问题处置不当有关；或是与尚无法一下子消除的旧社会弊端相联系。①

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认为，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规定了其解决方法或途径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而不必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或政治革命去解决。这里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高度的自觉能动性，它能够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和引导其发展方向，积极创造主观和客观条件予以解决，而不致使其发生性质上的激变或转化。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关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总体思路或根本原则。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实现过程

毛泽东不仅运用比较方法指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还特别注意运用动态分析方法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实现过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它的基本内容可以简单地表述如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373页。

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在适应与不适应、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这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认为，把握这一点，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纲”。然而，仅仅承认或指出这一规律是不够的。要深刻理解这一规律并且能够在实践中遵循这一规律，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一规律的现实展开过程。为此，就不能停留在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一般哲学概括上，而应该详尽研究植根于经济土壤之中的社会矛盾形成、发展、转化的具体过程，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交互作用等等。应当指出，毛泽东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尽管只是初步的，但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则是不容抹煞的。

第一，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的诸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其中生产力占主导地位并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力的性质和变化，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而且还规定着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性质和变化。毛泽东认为，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也必须反映并且遵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这一关系。他说，无论是推翻旧制度还是建立新制度，其根据都必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中去寻找。“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①] 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必须把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点。对中国这样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主义的腐败，给新中国留下一份十分可怜的经济遗产，生产力极度落后，只有10%的近现代工业，90%是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又相当不平衡。这种状况曾经是中国发生革命的基本根据，因为不推翻旧制度就不能解放生产力；然而，一旦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后，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到落后的生产力上。因为没有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最终建成。早在4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 因此，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后，毛泽东就多次指出，党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并且提出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1956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的着重点，是传达和阐述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毛泽东到会讲了话，他强调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②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正确思想。但是，他提出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点的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一个贡献，而且也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直接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②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第503—508页。

论根据。

第二，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必要环节，是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毛泽东在提出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点的同时，还把及时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看成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毛泽东多次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经建立，就不会发生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情形了，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还将产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不单纯是新制度中现在的某些不完善造成的，而且更大量的是来自生产力发展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出现的新的不适合。毛泽东认为，认识这后一种情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经过人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的。如果人们不能自觉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据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改革的论断。他说，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①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们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②当然，毛泽东这里所说的“革命”已经不是指阶级社会的政治革命，而是指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意义上的革命；他所使用的“推翻”等激烈的字眼，也是仅仅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页，第318—319页。

针对“搞得不对头”、“人们不喜欢”的那部分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而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证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必要性时，总是着眼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执政党干部作风的改革。他指出，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主要地是解决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是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领域的重大问题。他说，如果在我们的企业中，干部官僚主义泛滥，严重脱离群众，就会造成干部与群众，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对立，就会削弱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就会逐渐使公有制改变性质，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对我们认识今天正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理清它的基本思路，把握它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是有重要启示的。

第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环节，是把握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毛泽东始终坚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看作是贯彻社会主义社会全过程的基本矛盾。但是，他从现实的矛盾运动着眼，又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解决，往往是通过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反映出来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集中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趋向，或者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某一方面突出出来，或者是被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的诸矛盾中某一矛盾的地位突出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环节是把握和解决主要矛盾。附带说一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提出一个引起颇大争议的著名论断，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的作用的论断。我们认为，这个论点

主要是就作为基本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一个历史阶段集中表现为主要矛盾的情形而论，而不是就本原的意义所发。实际上毛泽东正是把它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转化的实例提出的。

通过主要矛盾来解决其他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实施其战略方针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毛泽东本人的实践为此提供了正反两方面例证。他在夺取全国胜利后直到 1957 年，曾先后根据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不同趋向，及时而正确地规定了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确定了党的不同工作重心，为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自 1957 年以后，他在主要矛盾问题认识上开始发生失误，以致酿成长期“左”的错误，甚至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结果。这从反面证明，不能正确地把握和解决主要矛盾，也不能正确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有过一些论述，但限于时代和任务，未能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课题予以阐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注意到苏联社会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敏锐地觉察到阶级对抗虽然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总的来说，也未把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予以深入研究，更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学说。这一尝试最先是由斯大林作出的。他在 30 年代初《给契·同志的信》中明确指出，苏联社会存在着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类是“结合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基本群众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结合外部的矛盾”

（即无产阶级和富农之间的矛盾）。[1]不仅如此，他还对这两种社会矛盾的内容、性质、发展趋向和处置方针等问题作过一些分析。[2]但斯大林的这些观点，除了用语不够准确、严密外，更重要的是他未能使其贯彻到底；严格说来，他甚至没有触及到这一课题本身。因为，斯大林所说的"两种矛盾"，显然是特指过渡时期的。而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36 年）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斯大林和苏联党一方面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持回避甚至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自 1934 年基洛夫被刺事件以来，在 1936、1937、1939 年又屡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斯大林 1937 年 3 月提出了一种"左"的理论作为根据，即社会主义的进展愈大，剥削阶级残余进行的斗争也愈加尖锐，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那末它的另一端则在资本主义国家。[3] 他只承认有敌我矛盾，而且是愈来愈尖锐化的阶级矛盾。甚至在 1939 年苏共"十八大"上斯大林再次宣布了剥削阶级残余已经彻底消灭，苏联社会在道义和政治上是一致的。多年后，还接连出现混淆敌我、混淆矛盾性质的许多冤假错案。斯大林逝世后，1956 年 2 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随后爆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加上 1956 年冬至 1957 年春，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素，我国先后出现 1 万工人罢工和 1 万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①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20 页，第 20—22 页。

③ 参见《斯大林文选》第 129 页。

产党人，总结了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有 1800 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初步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及其解决的不同方法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个论断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具体考察中国社会现状所获得的。它在普遍存在于国内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僵化理解上打开了缺口。但是，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一般地承认矛盾，甚至也不满足于一般地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现象，较之许多人的想像要复杂得多，如果不能具体分析和区别各种矛盾的性质，从而确定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式、方法，那么，事实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就仍然是不甚了了。毛泽东正是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现象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发。

1.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 那么，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人民和敌人。毛泽东认为，人民和敌人这两个范畴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即是说，在不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4 页。

国家以及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它们的内含和外延都是不同的。根据唯物史观，制定人民和敌人的标准，是以社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言行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为最终根据，但这一根据又是通过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具体状况反映出来的。就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说，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以及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这一任务所持的政治立场决定的。毛泽东举例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凡是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则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凡是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 由此可以确定，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在人民范围之内发生的矛盾，包括人民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各阶级、阶层内部的矛盾；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诸如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等等，都属人民内部矛盾。凡是在人民和敌人这两大敌对势力之间发生的矛盾，都是敌我矛盾。这是毛泽东阶级分析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矛盾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人民同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之间在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由此可见，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区别，是由“根本利益对立”抑或“根本利益一致”这个不同基础规定的。因此，人民和敌人虽然直接表现为对待一定历史时期革命主要任务的不同政治立场或态度，但实质上是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

2.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本方法。

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的基础或前提；然而，不解决方法问题，我们仍然不能达到正确处理矛盾的目的。毛泽东认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①] 毛泽东根据我们党在处理两类矛盾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对敌人实行专政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方法，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②]

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就是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对那些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予以坚决的镇压；在一般情况下，专政这一方法的贯彻实施，主要是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依照法律程序，剥夺那些被专政对象的政治权利（在一定时期内）并强迫他们参加劳动改造。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较好地发挥了专政的“改造”功能。对敌对分子专政，侧重于改造，并给予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371页。

改造好了的人以出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相对于专政方法而提出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总的原则或总的方法。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把这一方法作为解决党内以及革命统一战线内各种矛盾的基本方法。但当时主要还是针对解决人民内部属思想性质矛盾的原则提出的，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把这一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所要解决的矛盾的性质，大致还是属思想领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对的人民内部矛盾空前地突出出来。毛泽东认为，我们党过去为解决人民内部属思想性质的矛盾而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①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把全部民主方法完全归结于这一形式。在他看来，由于现实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具体的、多样的，民主方法的应用和贯彻自然也须通过不同手段和形式才能实现。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每一种人民内部矛盾，都需要通过不同形式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例如，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民主方法具体化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对科学艺术中的是非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民主方法的具体体现。一般地说，凡是涉及人民内部思想认识方面的分歧和争论，必须采取非强制性的手段去解决，即是说“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①] 凡是涉及人民内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必须主要通过经济的手段，并辅之以思想教育的手段去解决。诚然毛泽东一向反对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在物质利益方面斤斤计较，并且认为，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他同时也指出，要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就“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②] 即是说，还要利用经济手段，依靠经济政策的调整来解决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我们解决城乡各阶层和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的基本方针。它要求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来照顾各方利益，并促使各方谐调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中，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敌我矛盾问题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毛泽东在他的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篇即指出，他是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提出的，还说：“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③]似乎不能把这番话单纯理解为是关于这本书写作重点的一个说明，我们认为，把它看作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地位的概括倒是更为贴切。

毛泽东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研究和阐发的理论重点不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0页，第363页。

是偶然的。当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以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日渐突出，而范围逐步缩小的敌我矛盾的地位则急剧下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正是以此为根据的。然而，承认一种事实是一回事，而在理论上说明这种事实并在逻辑上再现这种事实又是一回事。从毛泽东50年代中期的一些主要理论著述中，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既是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现实矛盾状况为其研究的实际起点，又不是单纯囿于事实描述，而是着眼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地位，并把它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在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基础上引出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这是由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的，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深层矛盾，它规定并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的集中体现；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人际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比重的变化，直接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认识作为社会基本矛盾集中体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社会主义社会敌

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地位相互转化的关键。刘少奇曾经直截了当地把两类社会矛盾同社会主要矛盾联系起来，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① 毛泽东虽然没有把社会主要矛盾直接表述为人民内部矛盾（更确切地说，他没有直接使用"主要矛盾"这一概念），但就他这一时期（1956 年到 1957 年 9 月）的有关著述看，他的确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②（毛泽东后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摇摆。1957 年 10 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既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③ 这就为日后党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迈出了错误的一步）

毛泽东还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本身也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体系。这些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96 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5 页、378—379 页、389 页。
③ 同上书。第 5 卷第 475 页。

和各个方面，其中既有社会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又有不同民族、地区、部门、行业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但是，在整个人民内部矛盾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及其解决，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① 它的解决，直接地或间接地决定着其他矛盾的解决。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诸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与集中和自由与纪律的矛盾等等，都会直接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有些矛盾即使不直接表现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也需要由领导出面解决，解决得不好，也将转化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重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还在于这方面的矛盾直接涉及执政党的党风及其盛衰存亡的问题。他指出，一般地讲，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由领导部门或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刘少奇也指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确切地说，大量地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能否保持人民公仆的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的课题。列宁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成为官僚主义者，“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③还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④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也一再强调，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几十万县以上干部，他们自身作风好坏，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⑤ 刘少奇还就克服官僚

---

①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36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552 页。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5—326 页。

主义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不仅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会使这些本应合理解决的矛盾激化。因此，能否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关系着能否真正解决涉及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大历史课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篇章。不过他本人还没有把这一学说具体地贯彻到对具有重大关键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原有社会体制的矛盾的揭露上。不仅如此，其后发生的长期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一度湮没了这一学说的光辉。它所蕴涵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它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才愈益充分地显现出来。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的严重挫折，更加衬托出它的这种运用和发展对一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第三节　群众路线

就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哲学而论，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也无论是古典形态的还是现代形态的，在关于人民群众及其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未能给予科学地说明，在大多数场合下，甚或完全落在它们偏狭的视野之外。唯物史观的一个划时代贡献，是“第

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正是这一科学考察的理论结晶。

理论的实现程度从来都取决于社会实践对它的需要程度以及它能够满足社会实践的程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到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随同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展开，由一些相对抽象的规定上升为丰富的具体理论，并最终创造出它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

群众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理论内核及其方法论功能，不仅构成了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② 而且也构成了我们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唯其如是，它在毛泽东哲学甚或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不能不占有突出的位置，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③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什么是群众路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一个高度概括：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四句话，言简意赅，蕴含着极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辛的探索过程。

就思想史的一般发展而论，晚出的理论或多或少地要以先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②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2页。

③ 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前的发展为基础，这对具有师承关系的理论发展就更是如此。群众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其理论基础是不言自明的。毛泽东本人说过，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实现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之前，他也曾相信“英雄造时势”和孔孟哲学宣扬的“浩然之气”那一套。这种思想转变过程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能随意超越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不仅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它赖以产生的必要的思想前提。

群众路线又不单纯是思想史的产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实践活动的无比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从这种意义上说，要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及其形成与发展，不能不首先联系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

中国革命的敌人曾经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而革命力量则是比较弱小的。敌我之间力量的悬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在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实现。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一切革命的成败都与民众的联合程度直接联系着，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指出，要改造中国，首要地是造成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大联合。① 后来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长达 40 年，但最终未能实现革命的主要目标——彻底推翻封建主义，而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未能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

① 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 338—341 页。

众真正发动起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建党之初的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至党争取到执政党的地位，这一完整的历史活动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特点：时时刻刻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去解决革命中的一切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作为这一特点的理论表现，就是在这一历史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种理论或学说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其内部的各个原理或各个组成部分的成熟程度，而各个原理或各个组成部分的成熟程度，又决定于社会实践的需要。群众路线理论的各个方面，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根据中国革命实践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的需要，而分别予以阐发并使之完善的。

群众路线的某些思想在建党初期就提出了，尽管“群众路线”这一提法的出现要晚得多，大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使用。根据国内学者考证，“群众路线”的提法始于李立三。他在 1928 年 11 月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同志讲话时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稍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并且是在一种工作方式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中去，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稍后的军事斗争。与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6 页。

同时，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党内存在的怀疑和贬低工农阶级革命性的糊涂观念，批驳国民党右派对工农革命的种种诬蔑。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在理论上阐明了工农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期间，邓中夏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大量的资料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李大钊写了《土地与农民》，提出并论证了农民群众对于国民革命具有的特殊意义），并力求使之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1922 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 年 10 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毛泽东从 1925 到 1927 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及对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几篇文章，特别是后两篇文章，透彻地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有针对性地回击了党内外错误思潮的进攻，并且把对人民群众和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如何，作为判定和检验革命党和革命领导者的试金石，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国共两党合作和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法西斯的白色恐怖遍及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中国革命面临严峻的形势和艰难的困境。我们党把自己的命运同广大工农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多次指出，只有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中国的红色政权才能保存下去，并以星星之火，造成

燎原之势。他在中国苏区做政府工作时还把是否关心群众痛痒，是否“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① 看作是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革命的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把认识论原理同群众观点相结合，初步阐发了作为认识论和工作方法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把党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他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②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以对待群众的态度区别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和“群众化的方式”；稍后，他在《关于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我们必须“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至此，构成群众路线理论的主要之点都得到程度不同的阐发。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经过长时期历史经验积淀的群众路线理论日臻完善和成熟，并在毛泽东1943年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以及在此前后所写的一系列整风文献中得到系统的阐发。他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论断，强调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时一刻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他透彻地发挥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把认识过程的理论同群众路线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第115页。

人特点的领导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1945年党的“七大”，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确认了毛泽东提出并倡导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并且将其精神实质正式写入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新的工作作风”，并且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威信空前提高。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越大。他一再提醒全党，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他又向全党发出号召，依靠群众，“向自然界开战”；与此同时，他把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① 在他看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有多少，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② 因此，他总是注重从群众路线的高度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60年代初，他针对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460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

中的失误，强调搞经济建设也要贯彻群众路线，要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① 十年浩劫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到严重破坏。这固然与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相关，但也应该看到，即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理论也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例如，他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反对唯心论的天才论，提出历史是奴隶创造的，强调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根本内容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每一组成部分甚或每一条原理，都同时兼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群众路线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根本原理的具体运用，恰好是循着这两个方面予以深刻地发挥的；其本身也获得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双重意义。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方面的意义上阐述群众路线的根本内容的。他说，群众路线的两方面意义是：其一，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二，认为党的领导工作正确与否，决定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②

（一）作为世界观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原则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路线关于人民群众

① 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8—579页。
② 参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第205页。

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革命世界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且实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原则和依据。

1.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是共产党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毛泽东认为，一切为了群众，并不单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理想或主观追求，而首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要求。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社会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的历史，因而同时也就是作为生产进程的基本物质力量——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在一切社会形态中，构成历史活动（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抑或社会变革的活动）主体的，始终是劳动群众。因此，劳动群众的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愿望和要求，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出现以前，任何统治阶级例如资产阶级，限于剥削阶级的私利和偏见，不可能做到一切为了群众，尽管出于统治需要，它们也往往假以这种名义。而劳动阶级例如农民阶级，由于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其视野不可能超出本阶级的限制。无产阶级则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其阶级使命规定了它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身，它的利益和一切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是本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一切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据此，毛泽东指出，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毛泽东认为，在我们党内，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也没有人在理论上否认一切为了群众这一根本观点。但是，在理论上承认的未必都能在实际中正确地贯彻。这里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即共产党员能否真正身体力行一切为了人民这一最高宗旨，能否在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不一致时，自觉自愿地以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群众利益，直到牺牲个人的一切。问题还不仅于此。毛泽东根据我党的历史经验，还着重阐明了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1）共产党人在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各种利益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抽象的、单一的，而是具体的、多样的。一般地说，党在制定和实施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应当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舍此，就等于放弃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在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目标的同时，还应当从解决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着手，舍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无从实现。毛泽东多次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善于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联系起来，从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手，而引导他们为解决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切不可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他说："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①]又说，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然而，只有当我们的同志善于思索，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协调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2）共产党人在把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民群众的利益做为自己的唯一利益时，还必须正确处理对人民群众负责和对领导机关负责的关系。我们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党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反之亦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也可能会出现不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人民负责，说到底是对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这就可能造成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定与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机关也会由于自己认识上的局限和工作中的失误，与群众的利益甚至根本利益发生矛盾。毛泽东指出，凡属领导机关的正确决策，即使与部分群众的眼前利益不一致，也应当在说服教育的基础上，坚决加以贯彻，任何迁就都会损害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就是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凡属领导机关的错误决策，即使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或倾向，也应当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础上，认真加以纠正，任何盲从都会损害党的威信，并最终损害群众根本利益。这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毛泽东强调，“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①] 归根结底，是向人民负责。他说，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才能把对人民群众负责和对领导机关负责真正统一起来。

2. 一切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是群众路线的基本理论原则，是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法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了群众的问题，一个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①这诚然是就文艺方针而论，但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不仅回答了一切为群众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解决了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在中外历史上，从来都有同情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和学说，也不乏为民请命、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但是，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外，其他一切社会学说和政治集团，至多只是把群众当作一些受苦受难而值得怜悯的消极被动因素，而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例如 18—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学说就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曾经化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去清算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从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到对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与群氓"的社会学说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些学说，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认为历史只是由贵人、贤人、智者、杰出人物创造的，而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②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结局。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并且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争取；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是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也不能包办代替。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③

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极大地发挥和拓展了马克思列宁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53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06 页—307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72 页。

主义创始人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一切主要论点。正像马克思之于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起义，列宁之于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群众的英勇斗争，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在中国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告诫全党，“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① 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我们党和毛泽东在阐发一切依靠群众的原理同时，还具体阐述了与我们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几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原则：（1）把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革命党和革命领导者的试金石。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更应该在实际斗争中，善于认识并且承认他们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不能靠口头声明去判断一个人如何一样，衡量一个党及其领导人是否依靠群众，归根到底，看他们对群众运动持何种态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各个党派及其党员至少有三种态度可供选择：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②（2）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意愿，作为决定党开展实际斗争并制订政策的基本根据，既反对命令主义，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3页。

反对尾巴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工作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工作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① 这就是我们党决定自己工作的主客观依据。有的时候，尽管客观形势已经产生了开展某种斗争的需要，但如果群众主观条件不成熟，群众的多数尚未觉悟，我们就要耐心等待，并且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启发群众觉悟，直至他们下决心自愿加入斗争。他认为这才是领导者的真正责任。他批评说，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领导者的决策与群众的多数的觉悟状况不符合，就是脱离群众。这样的决策，或是造成超出群众觉悟程度的命令主义，害了"急性病"；或是造成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的尾巴主义，害了"慢性病"。前者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使工作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后者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使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他指出，领导者要想真正克服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顺利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②必须深入群众，了解并且尊重群众的意愿。这不仅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要求。（3）把领袖的作用置于群众创造性的历史活动中去理解，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在斗争中造就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富于献身精神的干部队伍。毛泽东指出，强调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并不排斥领袖个人的作用。根据列宁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又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又是由领袖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13 页，第 1095 页。

集体统帅的。因此，群众、阶级创造历史的作用要与政党、领袖的领导作用统一起来。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某些历史重大转折关头，领袖作为阶级、政党的主要代表，其统帅作用有时表现的极为突出，甚至是阶级、政党决定革命胜败作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毛泽东认为，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固然取决于群众和阶级的力量，但政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着革命的胜败。因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所以，毛泽东说，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当然必须着眼于它的客观原因，但仅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① 他还说，我们是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进行一场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不仅要有一个伟大的党，还要造就一大批最好的干部，"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②

但是，领袖和干部的领导作用是在阶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就最终意义而言，是群众创造历史。领袖为指导革命所制定的行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是来自群众运动，并只有为群众所接受，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能把历史上的功过是非，统统归之于少数领袖个人。他在谈到党史问题时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③ 他还说过："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

①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③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选》第215页。

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①

毛泽东认为，在任何实际过程中，领袖、干部与群众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必须在工作中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领导（包括领袖、干部）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是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思想上是用革命理论武装群众，在组织上是以坚强的领导核心去团结和调动群众。而领导作用的真正发挥，又必须一切依靠群众才能实现。毛泽东还谈到发挥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说，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积极性相结合，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相结合，就会形成少数人空忙的局面，反之，"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②

（二）作为方法论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原则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理论原则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群众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扼要地概括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③同时，毛泽东又把这一领导方法，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进一步阐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②③ 同上书。第3卷第898页，第900页。

述了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相统一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原则，提出了群众路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名论断。这不仅为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奠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

把群众路线作为一般认识论，或者说把认识论应用于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特别是列宁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是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的同时，应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一般认识论原理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内在结合的论点，但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作了详尽阐发的当属毛泽东。如前所述，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时，就开始触及到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思想路线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中国的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无视实际，归根到底是不走群众路线。他认为，实践（作为群体主体的实践）、群众在本质上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都是一回事。随着以《实践论》为标志的毛泽东认识论的形成，从一般认识论原理上系统总结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成为可能。1943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首次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系统阐明了群众路线。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论。”[1] 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也有过大量论述。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人的头脑进行逻辑思维的过程，就是对来自群众实践的原料进行加工的过程；而人脑制成的成品（思想、计划、办法），究竟是否正确，是否合用，还得交由群众检验。[2] 1964年他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段重要批语，再次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且认为，现在尤其应当“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3]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作为方法论的群众路线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认识原则：即群众是领导认识的基础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领导认识的基本过程。前一个原则不仅是指领导的“知识来源于群众；”[4] 还包含了领导认识的价值，就在于指导群众并服务于群众，以及领导认识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由群众来判定。这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相一致。后一个原则指示了领导认识活动必须遵循的途径。在“群众——领导——群众”（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可以看作是它的必要补充）这一领导认识公式中，深刻体现了“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公式和秩序。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点，正是循着这两条基本认识原则而展开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② 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6条。
③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原理方面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贡献，而且十分重视这些原理的应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党的建设、政策和策略、军事、文学艺术、领导工作等领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展开，提供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动的光辉的范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臻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也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党的建设中的哲学思想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生长在一个半殖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虽然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最有觉悟、且又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但其人数甚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党一方面生存在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外部环境中，另一方面，党要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成为一个领导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政党，不能不从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大量吸收党员。这样就使得小资产阶级甚

至资产阶级的思想或是从外部渗透到党内来，或是由那些尚未得到根本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直接带到党内。加上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这就使资产阶级思想更容易侵蚀党的肌体。

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党的自身建设不能不具有首要意义。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把“党的建设”列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49 年 6 月在革命行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党的 28 年历程中的宝贵经验时，他又把“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看作是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之一，而且列为首位，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正确处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辩证关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党的建设，概括地说就是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纲领，贯彻执行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进行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正确处理并科学阐明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的辩证法。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

思想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党员，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断改造世界观。各国共产党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武装自己的党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更加自觉地把它提到党的建设的首位，并为此创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根据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党的建设的经验，就对党处在农村环境中且又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的情况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了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曾多次强调并亲自组织党内的思想教育。中国共产党对从思想上建党这一规律性认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熟的。1941 年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党在思想领导上的重要性问题”，并把党内思想上的领导放在中央政治局工作的首位。1945 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代表中央首次明确了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论断，指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必须“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意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发思想建党的内容和意义，形成了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思想建设理论。

着眼于思想上建党，首先要解决相当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一些党员，只是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这种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党完事。因此我们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0 页。

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他还说，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①

毛泽东认为，要实现思想上整顿，基本途径就是在全党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痛感，搞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是因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普遍”、“不深入”。因此，他总是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还以党的经历和教训告诫全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两起两落，究其原因，还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们在大革命时就读到列宁的《两个策略》，就不会犯那么大错误了。② 1938 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③ 刘少奇 1941 年在《答宋亮同志》的复信中也指出，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党的组织能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差，甚至为绝大多数的党所不及，“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④ 这和党一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5 页.
② 参见《彭德怀自述》第 18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3 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20 页。

始成立就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直接有关。他认为为了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必须克服这一历史性弱点。在延安整风批判了教条主义错误之后，还在解放战争行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党中央就决定要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来迎接伟大的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任务。

先是在1942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整风后要大量翻译马列著作，同年11月提出高级干部要准备选读三、四十本马列著作，在“七大”他规定要先读5本马列著作。这些由于战争的原因并没有一一实现。而在这时，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决定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亲自标为“干部必读”书，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1958年“大跃进”出现严重失误之后，他又规定各级干部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以获得清醒的头脑，去指导经济工作。1963年，他又规定了30本马列著作，要求高中级干部在几年之内有计划地阅读。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大肆鼓吹“天才论”，阴谋争夺个人权力的活动被粉碎以后，毛泽东又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马列的6本著作，提出只有读一些马列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再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85年邓小平作为一个新的要求对新老干部提出，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

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① 通过这样具体的历史的叙述，无非是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时期起一贯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联系实际，直接地认真地学习马列的基本著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对于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对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推进我们的事业，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每次遭到重大挫折时，之所以都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继续前进，是和广大干部具有马列主义根基分不开的。在党的建设中，今后也要珍惜这种宝贵经验，发扬光大这种优良传统，使党能经受任何风浪，不断前进。

（二）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保证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胜利，固然需要依靠自己政治路线以及思想理论上的正确，还需要依靠自己组织上的巩固。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也给予党的组织建设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就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保证党的历史任务实现的团结战斗的统一集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他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中，首次使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理论化、系统化，为十月革命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②

---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4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41 页。

毛泽东遵循列宁的建党学说，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组织建设理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是异常繁重的。如前所述，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数量甚少，而小资产阶级犹如汪洋大海的半殖地半封建社会，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必须大量吸收那些逐渐无产阶级化了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为此，中国共产党既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又要大胆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一些同志在发展组织问题上的形而上学。他们要么借口保持党的纯洁性而把发展党员的大门关上，要么借口大胆发展而忽视党的纯洁性。毛泽东认为，贯彻党的组织建设方针，就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把“大胆发展”同“谨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党的纯洁性，又使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中心环节，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指导下创立的。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①] 稍后，党鉴于陈独秀的错误和“八七”会议以来的教训，在中共“六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既要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又要反对家长制作风。中共“七大”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组织建设经验，系统阐明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

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要想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防止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第 3 册第 125 页。

反对个人专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毛泽东说，这两种倾向在中国都是有深厚的土壤的。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① 另一方面，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散漫性，又有其广泛的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出现“极端民主化”和“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这两种情况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既要发扬民主，又要坚持集中领导，两者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② 坚持这个原则，一方面要在党内实行高度民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战斗力。

干部问题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③ 他还对各级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① 建国以后，他还多次提出过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不同情况下对各级干部提出了各项要求，这些均有现实的意义。

二、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

党内团结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政治生活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凝聚力、战斗力的保证，是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另一方面，党内团结又不是无原则的，往往需要经过党内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才能实现。这是无产阶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辩证法。

（一）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是在其内部的斗争中才成长起来。恩格斯断言：“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② 那么，党内斗争的根源和性质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认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③

毛泽东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因此，党内出现矛盾、斗争并不奇怪，相反，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他指出，党内矛盾就其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6页。

源说可以分为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前者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和影响，既包括国内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又包括国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党内矛盾作为阶级矛盾反映，并不等于党内存在不同阶级和阶级斗争。因为党内矛盾一般来说，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至于混进党内的个别敌人和后来蜕化变质成了敌人的情况，这实质上是以党内形式出现的党外问题。党内矛盾除了一部分是阶级斗争对党的影响以外，还有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例如，进步与保守，正确和错误，先进与落后，整体与局部等等的矛盾。此外，党内矛盾的存在还有其认识论的根源，这就是在党的成员之间由于认识上的差别所引起的矛盾。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过："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由于上述情况的限制，人们在认识上常常发生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矛盾，因而产生认识上的差别，这不属于阶级矛盾的反映。因此，毛泽东认为，党内大量存在的矛盾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② 刘少奇也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108页。

产阶级思想的矛盾。”[1] 归根到底，党内所发生的一切矛盾，其实质基本上都是思想斗争。这就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科学指导。

（二）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同一（或统一）和斗争是辩证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以这一原理为指导的党的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认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斗争的目的、出发点和归宿；斗争则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手段和途径。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直重视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 因此，“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3] 列宁也指出：“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4]

党内团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尤为重大。民主革命时期，党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斗争环境极为艰苦，这就要求党必须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组织。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③ 同上书。第 4 卷第 399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03 页。

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① 因此，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③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毛泽东指出：“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④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必须同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作斗争。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要加强团结，反对一切搞分裂、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言论和活动。

（三）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实现党的团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为了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必须开展党内斗争。恩格斯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⑤ 列宁也指出：“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统一。”⑥ 毛泽东也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为此毛泽东强调说：“我们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② 转引自《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
④ 转引自《人民日报》1972年1月1日。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3页。
⑥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页。

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①

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方法：

第一，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是“团结——批评——团结”

如前所述，党内矛盾基本上是思想斗争，是人民内部的、革命同志之间的是非之争，那末，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即斗争方式就应该运用与这种矛盾相适应的方式。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② 后来他还解释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③ 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这样的斗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两个目的。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率先本着这一方针解决党内矛盾的楷模。无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311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369页。

还是延安整风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他都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既要不留情面地揭露批评错误，又要明确批评的目的在于救人。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不应过份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实事求是地分析犯错误的具体环境、错误的性质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总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① 他指出：我们要相信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第二，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对待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取消党内斗争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种是破坏党内团结的惩办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

毛泽东认为，所谓自由主义倾向，就是“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②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 ③为此，我们应该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思想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纠正和克服自由主义。所谓惩办主义倾向，就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②③ 同上书。第2卷第359页，第361页。

击”。他们混淆两类不同矛盾的性质，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整自己的同志，造成极大的危害，是“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方法来说，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自由主义是离开斗争来讲“团结”，惩办主义是不要团结来搞“斗争”。二者都违背了团结和斗争辩证统一的原则。在党的历史上，这两种错误倾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均衡地存在于党内，我们要注意实际情况，注意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当然，我们在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时，也要注意防止掩盖着另一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告诫说：“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① 总之，只有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把团结和斗争结合起来，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我们的党才能兴旺发达，健康地向前发展，才能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政策和策略中的哲学思想

政策和策略作为共产党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重要思想武器，具有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政策和策略问题。马克思“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了大量的材料。"[1] 恩格斯说，任何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要是背离了《共产党宣言》这个策略纲领，"每次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2] 毛泽东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问题。他说过："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3]政策和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党和群众利益的实际表现，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有特色的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一、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唯物主义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中，要使自己不在政策和策略上犯错误，首要的是把政策和策略建立在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而周密的了解基础之上。

(一)制定政策和策略必须从现实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出发

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策和策略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及其变动状况。列宁说："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4]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一唯物主义原则，他总是依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其变化来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他批评教条主义者不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主观主义地制定政策和策略，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① 他还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②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人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邓中夏等党的领导人就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阶级关系状况，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并确定了党对各个阶级应采取的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新的政治形势，抓住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情况，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新策略，排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胜利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折。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制定的总路线总政策，以及在革命各个阶段上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二）制定政策和策略必须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出发

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党的领导机关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并能在群众斗争中贯彻下去的政策和策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理论、政策和策略都是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853页。

定的主体通过实践对客体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就中国革命来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任何政策和策略，首先都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愿望和要求，因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人民群众中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凡是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政策和策略都不能真正贯彻下去，并必然在实践中遭到失败。毛泽东总是告诫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把我们的政策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到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到他们变革现实的活动中，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根，从而制定出为群众所接受并自觉转化为群众行动的政策、策略来。他说，在党的历史上，凡是在政策和策略上跌跟头时，一般都是党的领导机关脱离实际，脱实群众，脱离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造成的。

二、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原则，主要包括：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掌握斗争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等等。这些都是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精神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一）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思想。当资本主义还在上升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

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 同时也谆谆告诫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业，必须讲究斗争艺术。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对帝国主义的本作了深刻的分析，曾将当时称霸世界的英、法、美帝国主义称作“泥足巨人”和“稻草人”。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人民必须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那种轻视敌人，主张革命速胜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他又指出，就长远的观点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看不到这一点，就会被敌人的暂时强大所吓倒，就会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毛泽东认为，只有用辩证思维去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的敌人，才能把握住它的实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根据敌我态势确定了红军作战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后来他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完整概念。它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这个完整概念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过程。毛泽东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具有两重性，它们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就其发展过程讲，它们是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动派是依照两种不同的逻辑行事的：前者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后者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第二，这个完整概念揭示了战略与战术的对立统一关系。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是要灭亡的。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时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暂时还有强大的力量，他们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是很凶恶的，吃人的，所以要重视他们。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由此可见：战略上藐视敌人要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保证，战术上重视敌人又要以战略上藐视敌人为前提条件。不能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①

值得重视的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一对敌斗争根本原则，其意义不限于对敌斗争。毛泽东甚至把它作为各项工作中必须贯彻的方法论原则。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做到："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页。

苦战，就不能胜利。”[1] 我们应当运用这一思想方法和态度来做好一切工作。

（二）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反对主要敌人，同其他阶级、阶层、党派以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如此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不断发展和壮大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国革命中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2] 在实现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我们党执行了一整套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争取了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动派，配合武装斗争，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在建国以后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统一战线内部，有着两个不同性质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在这个同盟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毛泽东从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点出发，把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0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5 页。

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适当加以区别。指出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对立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系统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路线，并尽可能地保持这个统一战线。而对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则同他们建立了暂时的抗日统一战线。

党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针对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特点，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这一政策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具体运用，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成功的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历史上，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曾经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三）掌握斗争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

掌握斗争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抓主要矛盾思想在对敌斗争策略上的应用。这一策略原则，要求我们在同一时期内不应树敌过多，要注意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自己一边，或使他们中立，而把斗争的主要方向指向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在一个时期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这一原理运用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就要求把斗争的主要方向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因为集中力量打倒了主要敌人，就有利于次要敌人的解决。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紧紧抓住了中日这个主要矛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人民革命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为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认为，为确保斗争的主要方向，就要力争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暂时不能争取到的，也要尽量使其保持中间立场，以避免树敌过多，分散力量，干扰斗争主要方向。为此，我们应该学会在某一方面做出某些必要的让步和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他说，这样的让步是积极的，不是投降主义的纯消极的让步。积极的让步是为了前进和胜利而让步。毛泽东指出："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

的”。[1] 这样的让步，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更快地取得斗争的胜利。他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讲话中还说，我们党面临着很复杂的局面和困难，一定要坚持这样的战略策略方针，即“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2] 由于当时重点打击的对象明确，就较容易地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在我党的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策略，曾使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例如，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左”倾关门主义者看不到日寇侵入我国后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错误地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等口号，要求党更剧烈、更广大地开展这一斗争，“使国民党走上灭亡道路”。并且断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结果分散了革命目标，主要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却遭到了我们的攻击。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24页。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也是毛泽东制定的对敌斗争的基本策略原则。在他看来，敌人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敌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利用的。列宁说：“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最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 在旧中国，革命的敌人很多，也很强大，不可能一次都打倒，只能是各个击破。有时在特殊的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应使非主要的敌人处于中立的地位，或者成为暂时的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马克思说：“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②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达到了孤立和消灭敌人，壮大和发展自己，取得革命胜利的最终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这样。毛泽东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了敌人内部矛盾，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毛泽东曾指出：“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4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8 页。

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①] 这正是对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成功运用的胜利总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敌斗争的策略理论。

第三节　军事斗争中的哲学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思想，作为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又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军事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军事问题，系统阐发了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一、研究战争规律的方法论原则

战争规律，就是指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无论从事何种战争，战争指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8—309页。

者若不能把握战争规律，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就是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革命，最后是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能否科学揭示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自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就以极大的精力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问题，并且阐明了研究战争规律的方法论原则。

（一）研究战争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在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上，“左”倾冒险主义者也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无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在作战方面，他们认为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或者认为1926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要学习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等等。这些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争指导，导致了革命战争的失败。因此，毛泽东在战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联结中，强调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 因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照搬。

毛泽东还认为，研究战争规律还要着眼其发展。他说，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一定的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①就中国革命战争来说，北伐战争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同于国内战争。因此，指导战争的规律包括战略方针、作战形式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战争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必须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战争上的机械论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它把一种战争经验搬到指导另外一种战争；把过去的战争经验搬到指导现在的战争，不承认因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而形成的战争的特殊性，不承认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不同的战争。这样是没有不遭到失败的。

（二）在战争实践中能动地认识战争规律

战争规律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战争的神秘物，它就存在于战争实践之中。只有通过战争的实践，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②这说明战争实践是战争知识的来源。

那么，在战争实际中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对此作了完整的分析。首先是战争计划的制定过程。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③这就是定出战争计划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第181页，第179页。

的过程。所谓正确的部署也就是正确的战争计划。怎样才能使战争计划正确地制定出来呢？毛泽东认为，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侦察敌方情况，尽可能多地得到各种实际材料。同时，要对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这是制定正确战争计划的两个重要条件。在这里，必须反对那些粗心大意的军事家和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他们不可能使军事计划符合客观实际，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次是战争计划的执行过程。毛泽东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① 在实行中加以检查，如果战争计划不符合客观情况，就要加以改变，局部的或全部的改变。不能一味蛮干。这些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创造性贯彻与运用。

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必须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他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447页。

二、战略战术辩证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重视研究战争的总体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战略战术之中，阐明了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主动和被动、分散和集中、内线和外线、运动战和阵地战、消耗战和歼灭战以及直线和曲线、打和走、进和退等诸方面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中极为重要和精彩的部分。这里仅就其中若干方面略加叙述。

(一) 进攻和防御

进攻和防御是战斗的基本形式，是战争矛盾运动的基本形式。毛泽东指出："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① 进攻是指为了歼灭敌人或占领重要目标而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形式，防御是避免敌人杀伤，抗击敌人进攻的作战形式。进攻和防御是实现战争自身的根本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两种基本关系。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防御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进攻和防御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不仅互相对立，而且互为前提。具体表现为：进攻和防御相反相成。如进攻手段的发展变化，必然要引起防御手段的发展变化。反之，防御手段的变化，也必然引起进攻方式的变化。同时，在具体的战斗中，作战双方攻防可以同时并用，二者相辅相成。单纯的攻或防而不把攻防结合起来也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再者，进攻和防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攻转化为防，防转化为攻。当然，这种转化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毛泽东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4页。

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① 片面强调进攻或片面强调防御都不是辩证法。

（二）持久和速决

持久和速决，是战争运动的时间概念。持久是指战争延续的时间较长，而速决是指战争延续的时间较短。一般地说，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双方无不要求速决，即迅速解决战斗。但是，持久和速决并不是人们随意规定的，而是由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情况决定的。就抗日战争而论，由于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只能采取战略持久战。不过，在毛泽东看来，战略上的持久，不等于说，战役和战斗上也要采取持久战，相反，他认为战役战斗只能采取速决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术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②这说明，持久和速决，是战争中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战略上的持久战，转化为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从而使战争的发展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三）主动和被动

主动和被动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主动是指军队的行动自由权。被动是指军队处于不自由状态。从哲学上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是主动被动的基础，同时，主动和被动也决定于是否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主动权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6页，第233页。

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① 主动和被动不仅相互区别，相互对立，而且也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主动和被动相比较而存在，而且相互渗透、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争取主动的关键。毛泽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②

三、人民战争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战争领域中的创造性运用，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一）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最伟大的源泉

恩格斯提出过把军队的普遍战争变为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说："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③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提出了"全民武装"的口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发展了这些思想。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 ④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⑤还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

①②④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0页，第487页，第509页，第5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6—337页。

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②在抗日战争时他还强调说：“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③在各个时期，毛泽东都十分强调人民战争的威力。

从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最伟大的源泉的论点出发，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战争中人与物的关系。一切战争的基本要素是人和武器，两者辩证地统一于现实的战争中。那么，在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因素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呢？毛泽东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④这是因为，战争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又是要人去掌握的。因此，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由武器的使用者以及人心的向背决定的。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⑤

（二）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第207页。

③④⑤ 同上书。第2卷第514页，第469页，第480页。

件。列宁说："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人民自由的真正支柱。"[①]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对于战争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深刻地说明了人民军队的作用。他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②]

为了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建军原则。首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③]其次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它集中地体现了人民军队是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同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还形成了自己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因素。

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党为了更好地开展人民战争，还要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这是人民战争战略基地的建设。同时，还要实行人民战争武装力量体制和非武装力量体制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器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等等。

第四节　文学艺术论中的哲学思想

文学艺术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中国无

① 《列宁军事文选》第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547页。

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理论中具体体现并发挥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

一、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文艺应当以表现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集中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感情，用以教育和鼓舞他们，即以文艺这种社会意识形式反映他们的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明确指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要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①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② 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二为"方针，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文艺的方向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这涉及的是文艺工作者的根本立场问题。因此，毛泽东在解决文艺中的诸如文艺和革命、文艺和生活、普及和提高、歌颂和暴露等关系时，始终抓住文艺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

---

① 转引自蔡特金：《回忆列宁》第14—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西”。[1] 我们可以借鉴和继承古人和外国人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决不可以代替自己的创造。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源”和“流”的关系，这是和《实践论》中谈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直接相通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为什么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呢？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虽然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但人民还是喜爱文艺作品。对此，毛泽东解释说：“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2] 这样，毛泽东既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文艺与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强调文艺以生活为源泉，这是文艺与生活关系中的唯物论；强调文艺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这是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辩证法。这样就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也是《实践论》中论述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在文艺理论中的体现。

三、文艺工作中的辩证法

为了科学地解决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解决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歌颂和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861页。

术现象。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① 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即文学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依赖关系。

既然文学艺术的源泉是社会生活，那末，文学艺术工作者为了获得自己的创作材料，就必须深入生活。毛泽东号召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② 当然，毛泽东并不反对文艺工作者借鉴“书本上的”、“古代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些都不能代替生活这一根本源泉。他说：“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860—861页。

服务的主线。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尖锐地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使体现立场的思想感情转变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方面来，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他说："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① 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且要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多少年来，曾经鼓舞过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来维护这一正确的方向。他们真实地描绘出人民群众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战斗风貌，塑造出许多工农兵英雄形象。

在这里，毛泽东坚持并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和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超阶级观点。他说："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② 揭示了这些观点的资产阶级性质，揭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二、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又一基本问题。毛泽东坚持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运用它来观察分析文化、文学艺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第852页。

露、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文艺创作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普及和提高

什么是普及，什么是提高？毛泽东认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难于生产和难于在当时的群众中流传。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提出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反对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

但是毛泽东强调，普及和提高是辩证的关系。他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① 普及工作不但不妨碍提高，而且是提高工作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由于普及和提高是同为什么人的问题密切联系着的，所以毛泽东认为，所谓普及，就是向人民普及，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就是从人民，从工农兵提高。不然就迷失了普及和提高的方向。毛泽东还指出，要注意干部的提高，要注意处理好文艺队伍中专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论述了普及和提高的一系列辩证关系。

（二）歌颂和暴露

任何文艺作品总离不开对现实的歌颂和暴露。毛泽东认为，只有正确地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露的问题。他说：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暴露那些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也有一些文学艺术工作者并没有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说法："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从来的文艺任务就在于暴露"等等。毛泽东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一些同志没有解决歌颂和暴露的立场问题。他说，革命文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对人民大众应以歌颂为主，对其缺点进行批评时，一定要注意立场、分寸，动机和社会效果。

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错误地对待歌颂与暴露的实质和危害。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①

（三）动机和效果

动机和效果，也是文艺创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无论唯心主义者还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在文艺创作问题上，都是以割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为特征的。唯心主义者强调动机否认效果，机械唯物主义者强调效果否认动机。他说："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①当然，这里讲的社会实践标准是辩证的。动机和效果真正达到统一，必须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在比较复杂的活动中，常常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问题上，既要坚持唯物论，又要坚持辩证法，如此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决二者的关系。

毛泽东说，强调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当然包含着如何看待功利主义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只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人民大众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对于文艺作品，毛泽东认为，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在功利问题上，我们要反对"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②

毛泽东在文艺观上关于动机和效果、功利主义这些极为精辟的论述，也是对伦理道德观上历来聚讼纷纭的有关问题的科学解决。

（四）世界观和文艺创作

毛泽东在他的文艺理论中，全面地解决了学习马克思主义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第864页。

同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文艺界中有人认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会妨害创作情绪。毛泽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2] 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是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科学的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3]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包含着文艺等各门具体科学成果中共同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因为它所揭示的最一般规律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所研究的特殊规律，一般方法论也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所特有的具体的方法论。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代替论"是错误的，"取消论"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号召革命作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文学艺术发展的同时，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他说："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③ 同上书。第3卷第874页。

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① 毛泽东强调作家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改造世界观，这对文学艺术家搞好创作繁荣革命的文学艺术事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还强调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文艺批评中，毛泽东强调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对于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矛盾，提倡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解决。同时他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方针，这对于促进文学艺术以致整个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节　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它的任务不但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在于能动地改变世界。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恩格斯也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 他称唯物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④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⑤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74 页。

②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 页，第 4 卷第 23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406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总的方法论原则。他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毛泽东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并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毛泽东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

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在这一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作了科学分析，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论意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党领导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日益增多。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著作，把工作方法问题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号召全党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党对军事工作讨论之后，应“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930 年 5 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调查研究的方法、目的、意义以及技术等，作了系统的解释和说明，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还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反复说明了工作方法的

重要性。他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①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彻底肃清党内大量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提倡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党在实践中创造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作了科学概括，写下《'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他把调查研究同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相结合，强调调查研究是长期的，要不断认识新事物，要"眼睛向下"，有向群众学习的虚心态度。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号召全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写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两篇著作，专门讲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要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要学会"弹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140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902页。

琴”；工作要“抓紧”；要“胸中有数”；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要力戒骄傲；要划清两种界限；等等。这些方法的特点是更加具体化，对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党的建设，加速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国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注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除了号召干部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之外，还对工作方法进行了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如《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六十条里面，虽然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和理论原则，但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其中主要的有：“一切经过试验”、“抓两头带中间”、“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等等。

二、毛泽东方法论的若干特点

毛泽东的方法论具有鲜明特点，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作为一门科学方法论体系，有着极为普遍的科学价值。

（一）系统性、层次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形成了一个方法论体系或系统，具有层次性。由于方法反映事物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在其抽象性上，可以分为普遍的方法、特殊的方法和个别的方法。从普遍的方法来说，毛泽东方法论中最主要的有：关于实事求是的理论和方法；善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关于矛盾分析的方法；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些最普遍的方法不是独立的，可以说，它们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包括调查研究、矛盾分析、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组成的方法论体系。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普遍方法，又都各有其低一层次的众多方法。

（二）综合性、结合性

毛泽东方法论的许多内容，并不是某个哲学原理的简单应用，同时还根据实践的需要，对许多哲学原理的有机结合和综合应用。如实事求是的方法，它涉及到全部毛泽东哲学思想，因为实事求是是它的精髓，贯串于其所有内容之中。又如群众路线的方法，不仅直接涉及到认识论，唯物史观，也同辩证法、唯物主义有联系。这说明毛泽东方法论有综合性的特色。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方法的使用也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例如，在调查研究时，就要结合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群众路线方法等，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查研究工作取得成功。

（三）现实性、创造性

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和转化形式，是理论到达于实践的桥梁、中间环节，它比哲学原理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性、创造性的特征。从它的发展来说，方法又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补充和丰富的，它的内容不断创新。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方法论是不断丰富的，今后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毛泽东方法论一定要达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从近几年对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来看，有一个解决好毛泽东方法论思想同现代科学方法的关系问题。当然，我们应当注意汲取现代科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就把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等“三论”中的方法，吸收到有关原理中来，使方法论更加现代化。但是，决不能认为毛泽东方法论已经“过时”。有人说，“过去的领导方法是‘经验型’的，不科学的，

已经不适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情况”。这是不正确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不是停留在感性经验的范围内的，相反，这些方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总结概括出来的，它们已经上升到理性阶段，并在实践中反复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科学性。这些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也应当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

第六节　关于哲学解放

广泛的群众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毛泽东曾经殷切希望，“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① 他曾反复强调哲学解放的意义，并为此作了一贯的不懈的努力。

一、毛泽东致力于哲学解放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致力于哲学解放的实践。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并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掌握这一事实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工人群众并为群众所欢迎所接受的。列宁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伟大认识工具，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工人阶级运动的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使哲学变成工人群众手中的武器，工人阶级成为

---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9月21日。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自觉战士。

毛泽东一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基础上继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放的事业。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首先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特别注意哲学的运用，自觉地把哲学引入中国共产党制定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把哲学化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斗争、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思想武器；在形式方面，他一贯倡导通过通俗化、民族化，达到群众化。这些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群众中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很重视哲学普及工作。在延安时期，他创造了整风运动这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形式。为了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讲课做报告，众所周知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就是这类教材中的一部分。毛泽东讲哲学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具体。为了使学员听懂，常常列举许多浅显的例子来说明。如讲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三、四十年了。他的菜炒的香，很受人们欢迎。他开始也是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大家提意见。他在长期实践中摸索总结，提高了技术，就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能说出一大套道理。这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讲“矛盾”这个词时，他举例说，矛盾就是打架。世

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瓦匠正在房上修房，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要工作，这样就发生矛盾。许多深奥的道理，经他一说就清楚明白了。[①]毛泽东也很重视编辑出版哲学通俗读物。他在给胡乔木信中说到他“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按即伊林：《人怎样变成巨人》)要找来看看。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并在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去信要求买一批通俗的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1日他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及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他还组织了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的小组，有计划的学习哲学。他还支持、推动延安哲学家组织建立《延安新哲学会》，为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还编写出版了许多哲学书籍，如他亲自指示编辑的《思想方法论》一书，对提高干部的哲学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哲学解放也得到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党和毛泽东做了更为大量的工作。毛泽东不仅自己继续学习和研究哲学，而且多次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来学习哲学。他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

① 参见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圣地延安》。

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①] 他要求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并且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他还强调："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②]他特别强调："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③]为此，他特别希望理论工作者去做"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以便"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④] 当时，党中央还作出决定，指出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建国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曾经形成过几次大的规模。建国初期，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由此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其中艾思奇编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除了广播电台等宣讲形式外，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也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同时，建国初期，《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不仅成为当时广大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而且对于广大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高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水平，均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如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等，为马克思主义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第361—362页，第498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7页。

哲学的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党和毛泽东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哲学的宣传。广大的理论工作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时期，关于哲学的解放和群众学哲学的活动，也积极地开展了起来。毛泽东对此也有过许多号召和论述。他说：“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①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开展。例如，1958 年 3 月，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自动组织起第一个学哲学小组，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用以指导生产，解决技术革新等问题，他们的经验很快地得到了推广、天津、黑龙江、河南、广东以及北京等省市的工人和农民，纷纷组织起理论学习小组，掀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当时学哲学的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如大庆油田就曾以“两论”起家。大庆油田的开发成功，与大庆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认真学习与运用《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是分不开的。又如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学习毛泽东著作（包括哲学思想）的活动中，涌现出一批共产主义战士，如雷锋等。当时工农兵学哲学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学用一致，这比较易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因而破除了哲学神秘感，使哲学得到了大普及，在极大的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工农兵学哲学的活动，也有过偏差。原因主要是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缺少正确的组织和引导，因而产生了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到了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哲学活动进一步被引入歧途，使工农兵学哲学活动的声誉遭到了破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13 页。

坏。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成绩还是巨大的，虽然其中有许多教训应当汲取，然而它终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相当程度地使哲学掌握了群众，变成了物质力量。

二、哲学解放和群众学哲学的努力方向

在我国，从建党以后，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已成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提倡和组织领导，没有他们的言传身教，哲学解放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不可思议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的优良传统，正在卓有成效地组织干部学习。为使哲学解放和哲学群众化的事业取得新的成就，就必须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提出的要求，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要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前进。

（一）组织干部学习哲学应成为群众学哲学的重要环节

干部是群众的带头人，他们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一般来说，他们的理论文化素质较群众为高，经验也较为丰富，应成为学习哲学的骨干。毛泽东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① 1985年邓小平说："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533页。

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① 1987年陈云在《身负责任和学习哲学》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② 只要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起来了，并且学得很认真，他们就能带动群众学习，才能使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学习哲学的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而不致半途而废或徒具形式，徒有虚名。使哲学群众化的历史任务逐步实现。

（二）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文艺活动一样，群众学习哲学也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当前，哲学普及仍然是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更好地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清时代和当前形势，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摆正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能更好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做好哲学普及工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人民的头脑，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当然，随着哲学的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新的实践经验需要从哲学的高度上加以概括，许多新的哲学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这些就需要专门家进行艰苦的提高工作。

（三）既要反对神秘化，又要反对简单化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41页。
②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文选》第490页。

在哲学解放和群众学哲学的活动中，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反对把哲学神秘化。认为哲学高深莫测，一般人绝难过问。毛泽东说，要破除迷信，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困难。例如，在普及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实事求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已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广大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反对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这种情况起初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后来，经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给群众性的学哲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今后要尽量避免这类错误的产生，出现了也要及时纠正。在这里，我们还要把庸俗化与通俗化区别开来。通俗化是说，它的内容是科学的，表现形式是通俗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而庸俗化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歪曲。列宁说过：“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都是一些不动脑筋，也不会动脑筋的人，他不是启发读者了解严整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畸形的简单化的充满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枣就行了。”① 这说明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今后，我们哲学工作者还应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做好哲学的通俗化工作，使哲学更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278—279页。

好地为群众所掌握，使哲学解放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普及哲学，广大干部和群众学哲学，重要的是要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也是学习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①当前和今后干部和群众学习哲学也应该坚持这一方针，按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在当前就是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紧密联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提高全面地坚定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止和清除"左"的或右的思想影响，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遵照周恩来的要求，以他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哲学的解放事业，干部和群众学哲学，按照正确方向前进，就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断开出更为鲜艳的花朵，不断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往“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全面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以此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始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蓬勃生机。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些国家遭到重大挫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东方大国中国的这种发展，正在吸引着世界上愈来愈多

的人的注目。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实现了另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系列新的认识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成功和失败、胜利和挫折的多次反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危害极大的党内主观主义思潮，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确立起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求的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随着历史过程的推移，在探索这种新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时，由于对新的客观情况的估计和对理论的理解不当，仍然有产生主观指导脱离客观形势的可能。而由于社会历史和主观方面等复杂因素，这种可能就会变成现实，在党内形成错误思潮，偏离党的思想路线的正确轨道。前面说过，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尽管有许多贡献，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这样重大的理论贡献，但是，从50年代末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思潮逐渐泛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严重歪曲，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恩格斯说过，哲学革命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是以人们的哲学观念的变革为先导的，这里的特殊表现形式首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内容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是在正确思想路线战胜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开拓前进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及随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对“左”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决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正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及时开展了反对“左”的和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逐步推进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在解决历史问题和回答新的问题的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丰富和发展。

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

错误观点

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刻的分析，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主观主义的态度。他针对主观主义当时表现的主要特征，着重从理论和实践、矛盾的普通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上揭露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和以往不完全相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为"句句是真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些都歪曲和割裂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加以混淆，搞乱了党的思想路线。针对这种特点，邓小平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这个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的著名观点，精辟地论述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① 他在批判那种任意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②他在1975年针对林彪的错误提法，就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

---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40、41页，第35页。

地进行宣传呢?”[1]后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对上述思想又作了进一步发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间，这一条件，对某一个问题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一时间、另一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所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邓小平还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3]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说明，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把它的各个结论和前提以及条件联系起来加以把握。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掌握。掌握它的整体，才能准确理解它的各个部分以及它的个别结论。总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在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学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既要同“左”的、也要同右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邓小平说：我们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

---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4页，第40页，第113页。

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本来的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从右的方面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必须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思潮。他说："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批评了那种把毛泽东思相区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坚持的或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①

邓小平的论述，从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出发，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从而既批判了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的"两个凡是"的观点，也批判了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实质同个别词句相区别，邓小平强调把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个别论点相区别，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要求，坚持马列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的结合。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1、152、157—158页。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随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大讨论，反映了党内外同志渴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迫切愿望，吸引了全国各个工作领域人们的关注。但也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的重重阻挠和压制。在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开会，讲话，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讲的和做的是否能解决问题，正确不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对那些指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 邓小平的讲话，对这场讨论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08、109页。

生实现了哲学的伟大革命变革时，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来了。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这一思想都作了发挥和发展，在理论斗争中和实践活动中发挥了这一命题的作用。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这一命题更加显示出它的巨大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充分发挥了它的现实的和历史性的作用，表明这一场讨论决不是历史的偶然。

第一，它对批判"两个凡是"，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束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发挥了直接的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邓小平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个别指示、论断区别开来。实践标准正是把两者区别开来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了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并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实现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历史上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把被颠倒了是非重新再颠倒过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重新统一起来。

第二，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②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章还强调指出，“全党必须依据这条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作为思想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概括，也是对克服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二大的规定，还使得党的思想路线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对统一全党思想，提高全党贯彻执行正确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并推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发挥了并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3页，第175页。

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三，它要求人们的思想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为片面的、不正确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往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理论、路线、政策中解放出来，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形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适应当代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1985 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① 这不仅是中国的经验，也是国际性的经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左"的观念、理论和做法，使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失去应有的蓬勃生机。邓小平总结的这一经验，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这场大讨论及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中引起的极其广泛的和深刻的影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也就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彻底性，果敢地而又稳步地逐一摒弃被历史的实践证明为陈旧的僵化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引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形成，解放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不断蓬勃发展。这一科学命题，在现在和将来都将不断显现其真理的光辉。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求不断发展我们的认识，不断解放思想。1992 年一、二月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的发表，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

---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03 页。

关于全面贯彻和落实这一重要谈话精神的号召，正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大力推向前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从一个台阶走上另一个台阶。在这个过程中，真理标准的科学命题将愈益发挥其重大思想指导作用。

真理的标准，从认识过程来说是从理性认识再到实践这第二个飞跃的环节上发生完整的作用的，而为了获得经得起或大致经得起检验的真理，从任何具体的认识过程一开始，并一直在全过程中，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

三、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成就。但是，从50年代末期起，毛泽东的领导开始偏离了这条路线，经过曲折的过程，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严重践踏了这条路线，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要重新确立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首先必须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并在新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任务是由邓小平实现的，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起了积极作用。

在拨乱反正、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党深刻地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实质、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 是毛泽东思想的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64页。

出发点、根本点。而这个根本点的实质，就是把马无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①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基本点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在各个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概括。我们要把握这些科学结论，最根本的就是要从中学习毛泽东同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其中个别结论，这样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21页。

能解决任何问题。”①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认识实事求是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邓小平还把它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加以考察。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③

邓小平的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的深刻的科学的概括。

正确认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犯过右倾错误，也犯过“左”倾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极大损害乃至失败。要害都在于没有正确解决“思想基础”问题。陈独秀照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放弃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他们在政治路线上虽然有右和“左”的区别，但在思想路线上则是相同的，都犯了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建立在辩证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21页，第1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1]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又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客观形势，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为群众所掌握，见之于行动，才能使正确的理论、思想变为现实。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发挥。它既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要求，也体现了研究事物内部联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辩证法原理，又体现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理论，从而解决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出发点和途径。延安整风的伟大历史贡献，就在于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观主义思想基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把党内政治上的分歧，提到世界观、思想路线的高度，正本清源，把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是从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入手，从而取得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它不仅是确立政治路线的基础，而且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否贯彻、关键在于思想路线是否对头。鉴于历史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准则》的第一条指出："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①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的深刻揭示，对它的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它把人们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它在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发挥了更为广泛的重大作用。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指导方针。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作为党进入新时期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解放思想和思想僵化是相对立的。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一些干部思想僵化的原因和表现：一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二是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说了算；三是功过是非不清，赏罚不明，"不倒翁"行时；四是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于是条条框框、随风倒现象，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便泛滥成灾。因此，解放思想就成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第415、416页。

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针、方法和措施。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条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试验，大胆探索，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使我们的思想同客观实际相符合。正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前几年那种以歪曲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时髦，以诋毁和歪曲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为“创新”，决不是什么解放思想，而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推行“全盘西化论”的恶劣手法。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文化，主张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与他们在经济上要照搬西方的私有制，政治上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的主张相一致的，是为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同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得到的共识，是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达到的政治原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立国之本。邓小平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根本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

---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1页，第323页。

线。"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但"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①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前提，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安定的因素甚多，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尤为重要。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会长期存在，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这当然不是说可以不必防止和反对"左"的思想。右的和"左"的干扰，都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思想僵化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所以要警惕右，但从总体上说，主要是防止"左"。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的结晶。我们党7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违背实事求是，就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在同外国一位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彻底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3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2页。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不断前进，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规律，不断充实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复强调结合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1985 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联系干部的新老交替，突出地强调了这种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他强调："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① 我们应该从所处的时代、从肩负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来理解并贯彻执行他的讲话精神。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27 页。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最初的20年间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发生了许多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相当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邓小平说："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①

从实际出发，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由此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路线，找到了民主革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从国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臆想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此为指导具体认识我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从而逐步开拓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7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这个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生动体现，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及其三个方面的科学概括，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从哲学高度对毛泽东思想基本精神的科学概括，同时又把这些基本精神运用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前面在第一编中对这三个方面已经作过一般论述，这里着重论述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在内容上的丰富、发展。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②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鉴于过去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为此，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

---

①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第52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5页。

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1992年初，他又一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要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在实践中产生、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几十年乃至100年以前，就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只能以他们提供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指导，依据新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新的实践必然产生新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加新的内容。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③而这就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建设有中国特色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1页，第133页，第165页。

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的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要既反对右，又反对“左”，而从总体上说，主要是防止“左”。在新时期，所谓右就是主张“全盘西化”，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所谓“左”就是固守陈旧的错误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反对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由于旧观念是长期形成的，“左”带有革命的色彩，中国又长期处在“左”的影响下，因而“左”是根深蒂固的。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要反对右，而主要是反对“左”。这也是邓小平在新时期一贯坚持的思想、主张。

（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基本保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某个天才人物头脑的发现，而是我们党在实践中集中群众智慧的产物，它代表了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这个科学理论的实现，也只有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① 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始终在全国人民中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②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01 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4 页。

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把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指出，现在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建设和改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党只有更好地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才能胜利完成。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①

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别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 没有独立自主的方针，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就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一定要学习、引进，但是也不能照搬，更不能搞所谓“全盘西化”，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各种丑恶的思想文化。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57—58页。

②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2页，第371页。

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但是，“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及其三个方面赋与的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们贯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中。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②在民主革命中认清国情首要的就是认清我国社会的性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过程，按照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过程又要分为不同阶段，而各有其矛盾的特殊性。在这里认清国情，首要的就是要认清我国社会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把握其矛盾的特殊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总结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为基础，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再认识，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这就是逐步地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它为我们正确地制定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了基本的根据。

---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68页、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论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思想的萌芽。可惜，这个思想没有展开，更没有付诸实践，相反，毛泽东在60年代又断定我国处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样，就把我党在1953年所说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修改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是“过渡时期”，从而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地使用“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党的十二大重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和道德建设的特点，指出：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的扶贫济困的精神。”①这样，就不仅从物质文明方面，而且从生产关系、精神文明方面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到了党的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论断就完整地形成而更具有系统化、理论化的特点。

首先，完整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这就是：“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经过30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具体表现是：在生产力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10多亿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还占

①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11—12页。

人口近 1/4 的状况，同时存在。在生产关系方面，由于生产力落后，决定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

其次，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这个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在时间上的上限是 50 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下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日，其间至少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既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又区别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以及对其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正是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运用。我国和国际

的经验都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认清所处的阶段、认清国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后果。从实际出发就要从所处阶段的国情出发；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也只有认清国情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统一。否则就既没有唯物主义，也没有辩证法，而只能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在党的文件中多次作过概括，总起来说是：

（一）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路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二）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专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决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

（三）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只有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和保证。不改革，就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 70 多年奋斗的全部成果。

（四）采取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五）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在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需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并对其加强正确的管理与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六）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七）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

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提倡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八）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九）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促进民族地区加快经济文化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十）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

（十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

（十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领导核心。

以上这些原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丰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是指引我们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践证明，这些原则是

完全正确的。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理论将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就一定能够继续做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以下各章将论述这些原则形成的主要的具体的哲学理论和观点的依据，并探讨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具体内容。

第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后来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一些本来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包括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等等，重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但恢复了毛泽东的科学认识，而且以一系列新的光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现阶段我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重新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我国社会正在生机蓬勃地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才在实践中真正显示出马克思所说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显现出真理的耀眼光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在革命和建设中，能否正确地认识并紧紧抓住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局，关系到能不能正确地规定我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个主要任务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这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党的认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五十年代末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所犯的“左”倾错误，集中地表现在对主要矛盾判断上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端正思想路线，实行拨乱反正，也首先和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这对于我们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在1956年党的“八大”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八大”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表述上确有一些不够严谨之处，例如讲“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问题只在于生产力落后，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则完全没有问题，不需要继续完善和改革了；甚至可能产生社会制度已经超阶段地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的误解。但是，从总的精神看，从实质上看，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对于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态，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是，这个本来基本正确的认识没有能够坚持多久，很快就被错误认识否定了。首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党内不少人对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夸大为全局的激化，把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夸大为长期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曾经赞同的“八大”的观点，在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评“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这就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后来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其次，在1959年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由于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错误地把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右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之八第523—524页。

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他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第三，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强调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第四，在1963年到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进一步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主要矛头开始指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最后，到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炮打司令部"开始，形成系统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纠正了此前二十年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更深刻的程度上重新恢复了"八大"的基本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明确地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2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概括为10个主要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以历史决议的形式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论断，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它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强调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生产”，而不是“社会生产力”，这是很准确的。因为社会需要是相对于社会生产而言的，社会生产力是相对于社会生产关系而言的。为了发展社会生产，不仅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还包括要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这样，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就包括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两个方面，而不单单是发展生产力一个方面。显然，这个提法既吸收了“八大”提法的基本思想，又修正了“八大”提法不够准确的方面。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并且把这个问题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联系起来，以这个主要矛盾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区别了此前的“过渡时期”和此后的“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①]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并不是泛指一般的落后于需要的社会生产，而是有特定内容的，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而言的落后的我国的社会生产。其主要表现是：（1），没有实现工业化。一切工业化国家都是工业人口和其他非农产业人口占人口比例的大多数，而农业人口占很小的比重，例如英国现在农业人口只占1.5%，美国为2%，日本为7.9%，世界平均水平为44%，而我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2），商品经济不发达，还没有完成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转化，等。这就决定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这种情况表明，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能否尽快解决这个矛盾，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②] 这是邓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4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53页。

小平在新时期作出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论断。这不仅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也是吸取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不仅对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论断的提出，它在实践中的贯彻，就在理论观念上，全盘工作上、社会生活上引起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生产劳动观点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①社会发展史首先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有规律地改变和发展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大批“唯生产力”，是地道的历史唯心主义。

据此，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二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第三步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④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

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又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①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贫穷所以不是社会主义，是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腐朽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 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③又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④

为什么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

---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③④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8—149页，第180—181页。

根本的利益”，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呢？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巩固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更需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

（二）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是解决面临的国内国际一切问题的基础

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例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文化生活问题等等，才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不断增强。如果生产搞不上去，社会矛盾就将越积越多，甚至导致矛盾激化，经济问题就会发展为政治问题，不但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社会的安定团结也没有保障。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抵制和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在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的斗争中，都要求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四个现代化。”①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0页。

能单打一，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努力做好，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 例如，必须认真地抓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而这些工作的目的，又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最终又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我们必须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培养“四有”新人，这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保证。总之，我们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互相联系、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在对待经济工作这个中心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贯彻始终，排除一切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正象邓小平说的，除了发生大规模战争，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还要接着干或者重新干。这一点，决不能动摇。

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100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14页，第83页。

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首先，科学技术所以是生产力，是因为它和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凝结在一起，引起劳动对象、劳动手段的变更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不断形成具有新的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一是生产资料，一是劳动者。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其生产资料都和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相联系。劳动者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指的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其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现代的作用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它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学科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在继续产生着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11页。

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据统计，本世纪初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只有5—20%，而今天，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60—80%靠科学技术，有的工业部门甚至百分之百要靠新的科学技术。所以，邓小平说，当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①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的革命形势，我们要实现经济的振兴，必须把科学技术作为战略重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薄弱，大批职工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严重不足。技术薄弱，管理薄弱，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尤其在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急起直追，就无法缩短我们在经济技术上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② 因此，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解决工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组织实施科技攻关计划并提供科技保证；加强应用研究，大面积推广投入少、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努力在高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科技成果，继续推进“火炬”计划的实施，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加快向传统产业的扩散与渗透，大幅度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84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增强科技发展。

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因此，必须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应有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办好高等教育，积极发展成人教育。

为了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①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② 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要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要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五、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

邓小平说：“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党中央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使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摆脱贫穷状态。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使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8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59—160 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这个部署是符合实际的，既反对了片面强调困难，对实现现代化信心不足的消极思想，又反对了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思想，体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客观条件相统一的思想。

现在，我们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为了胜利地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如邓小平所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当然，要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确方针。持续，就是保持经济每年都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发展速度；稳定，就是稳步前进，避免大起大落；协调，就是按比例发展。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比例协调，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按比例的速度才是合理的、效益好的、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速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合理安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使之与国力相适应；恰当掌握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使之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既要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又要防止国民收入超分配，造成通货膨胀。要始终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放在重要的、突出的位置上，不断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经济结构有密切联系。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才能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在这里，正确地确定经济发展的重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把发展农业

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农业直接影响经济的全局，乃至社会的安定，什么时候农业发展得好，我们的日子就比较好过，反之，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还要正确处理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把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正确处理经济与科技教育的关系，把科技和教育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

总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物质技术基础仍然比较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从实际出发，按照国情办事，是确定正确建设方针的基本要求。我们只能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既不应当超越客观条件，免强去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又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做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以上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党和国家规定的战略部署、战略重点、方针、政策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只有牢牢掌握这些哲学观点和具体理论，才能在贯彻执行中提高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并结合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只有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推动生产力

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具体分析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和特点，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得到发挥。这些理论和政策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地把三者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把这一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出了这一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在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提出了继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①]所有这些，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自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但是，如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发生了许多重大失误。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往往不是从我国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出发去完善生产关系，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高度社会化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和外国的实践模式出发去追求所谓生产关系的“完善”。长期以来，形成

① 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了一种观念：似乎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纯就是越完善，而不那么“公”、不那么“纯”就是不完善；向着消灭商品、货币的方向前进就是完善，而商品、货币的存在就是不完善，如此等等。于是，在实践中无条件地追求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甚至一度企图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大体类似的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平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他又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① 十几年来，这种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第一，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发出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②“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③这样，就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划清了科学社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②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页，第72页。

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

第二，从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出发，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我们承认并且充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①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认真学习，外国的经验也需要借鉴，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我国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出发，创造出与生产力相适应和便于生产力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

第三，对我国当前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状况作了具体分析。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国家大、人口多，发展又很不平衡。在生产关系方面，我们已经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教条主义影响，长期以来在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环节上存在严重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单一，忽视公有制以外与生产力状况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其他多种经济形式存在的必要性；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政企职责不分，企业的一切活动听命于国家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72—73 页。

行政机关的指令，缺乏自主经营权；计划经济中实行过分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所有这些，都是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所谓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要就是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克服这些弊端，以解放生产力。在上层建筑方面，我们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指导地位，但是，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上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机构重叠，职责不明，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远未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广泛存在。所谓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主要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这些具体分析，为我们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社会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中不断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的基础上，也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

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①] 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目的、方法、步骤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种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每日每时都在向前发展，而生产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结稳定性有利

①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89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9 页。

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某些方面就会变得不再适应，需要进行局部的调整与改革。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反映并保护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也需要进行调整与改革。这种改革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尤其必要。因为它刚刚建立，由于经验不足和旧社会痕迹影响的广泛存在，它必然存在许多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的地方，只有通过不断地改革，才能逐步地走向完善和成熟。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而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就不能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再次，具体到现阶段的我国来说，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和指导工作上的其他失误，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致使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四化建设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因此，改革不仅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而且是一项迫切的现实任务。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得到迅速发展，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说：“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①因而必须充分认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今天，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3、第70页。

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① 我们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地带，发展一定数量的"三资"企业，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创举。

（二）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继续保持生机和活力；而改革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因此，"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②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共同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改革"，目的是从根本上"改"掉社会主义制度，鼓吹用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用"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思潮，我们必须给予批判，在改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

革中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邓小平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在本世纪内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①

我们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反对任何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企图，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内在地统一起来。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不意味着要立即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也不意味着拒绝吸收和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有益的东西，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水平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离开这"三个有利于"去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的问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

①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第13、20页。

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控制。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期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总之，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

（三）关于改革的方法、步骤

社会主义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改革作为“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的一种形式，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革命，但它与剥削制度下的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不是打碎现存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暴力革命，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

展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环节，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①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及其所造成的动乱，严重干扰和破坏四化建设与改革的进行，对于这股反动思潮一定要给予批判，对于各种动乱一定要坚决制止，"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 ②

改革作为"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精心指导。"③ 既不能停步不前，也不能急于求成，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要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进行认真的试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参加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改革实践，取得直接的经验，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要随时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④ 他说，强调稳，并不要求象小脚女人那样，慢腾腾。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没那么

①②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73页，第160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38页。

④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6页。

回事。重要的是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当然，由于我国地区广大、情况复杂，改革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业制宜，防止一刀切、简单化，要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改革作为群众性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广泛集中群众的经验、意见和智慧，虚心听取广大群众的呼声。这是我们在改革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的基本保证。任何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观念和行为，任何置群众利益和要求于不顾的做法，都是根本错误的。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领导集体中的贯彻。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集体讨论，决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没有政治生活的充分民主，不可能作正确的决策。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在改革中实现决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重大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包括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后面要谈到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就以更为完整、更为彻底、更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在今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愈益发挥巨大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不但要研究它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而且要研究这些矛盾在人际关系上的表现，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段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在理论上做出了许多新的概括和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鉴于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恢复了毛泽东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的本来面貌并运用于新的实际，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方针和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一、论证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中，我们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历史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首先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便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果断地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心坚定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变，是以对现阶段我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作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1979 年邓小平指出：在这 30 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 20 多年的历史的集体农民。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 13 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① 1981 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作出明确结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71—172 页。

“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加以解决”。

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是一个社会范畴，而阶级是从经济上来区分的，是以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划分标准的。恩格斯说：“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①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 通过民主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消灭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消灭了地主阶级并逐步消灭了富农，又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消灭了，从而使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被消灭了；在我国大陆，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也就不再存在了。尽管还存在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但是，旧的生产关系已不复存在，已经没有形成新剥削阶级的共同的经济基础。我们“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留。”① 我们不能忘记或忽视这种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关于阶级斗争的又一重要论断。

所谓“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是说我国大量的社会矛盾已不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只表现在少量社会矛盾之中，同过去相比，它的范围大大地缩小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区和领域。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敌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等等的斗争，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是这些斗争的规模和范围比过去大大地缩小了。所谓“一定范围”，不能作主观主义的规定，指明哪里有阶级斗争，哪里没有阶级斗争。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阶级斗争存在的领域或地方也是有变化的，或时而扩张，或时而缩小；或有的地方表现突出，有的地方比较缓和，或某些领域的斗争有所发展，有的领域有所减弱。所以，这个“一定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要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二——一九八五年）第155页。

(一) 在我国，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存在，还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将长期存在。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斗争，必然在国内反映出来，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总是千方百计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复活动，企图实现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这种渗透与反渗透、颠复与反颠复、“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斗争又总是与国内阶级斗争相联系，相呼应，相配合。国内同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与国际上这种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

(二) 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海外域外的敌对势力，还会不断派遣特务分子、间谍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并支持内地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三)历史上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的遗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剥削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决定剥削阶级的思想不可能随着它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立即消失。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①这些腐烂发臭的东西，如剥削阶级的反动世界观、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不仅存在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分子的头脑中，而且通过各种媒体毒化社会生活，反映到其他某些社会成员包括党员、干部和劳动群众的思想意识当中，使一些人蜕化变质，成为新的敌对分子、新的反革命分子。在人民内部，抵制和肃清各种剥削阶级腐朽的、反动的思想影响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思想上的反映；同已经腐化变质分子的斗争，则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

（四）我国经济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国家法制、经济法规、管理制度某些方面的不够完善、健全，使得我们不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以及某些党员发生腐化变质现象，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在我们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以前，必然总会有一些人羡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离心离德，甚至为了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卖人格、国格，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在我国，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化，而是逐渐趋向缓和，经历一个较长过程，最后达到阶级斗争的消亡。但是，在某种条件下，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这种激化的条件，从国外方面来看，敌对势力加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颠覆活动以至进行大规模武装入侵，国内敌对分子必然遥相呼应，趁机进行破坏和捣乱，从而使阶级斗争激化起来。从国内方面来看，如果党和政府在重大决策上发生严重失误，如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不进行有效的斗争；如果党和政府在重大决策上发生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而被敌对分子所利用和操纵；或者党和政府的领导权被反马克思主义者篡夺，推行错误的反动的政治

路线，或者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腐败现象发展而不能得到有效纠正，致使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等等，都会使阶级斗争在社会矛盾尖锐化中也激化起来。当然，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阶级斗争激化一般的只是暂时的和个别的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走向缓和，最后达到消失，尽管有时会发生曲折。

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学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认识其规律，才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前斗争的新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阶级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①

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过去那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务必不能重犯，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决不能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同时又必须重视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有效的斗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如同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在反“左”的时候注意防右，在反右的时候防“左”。总之，对待阶级斗争，既要反对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熄灭论的观点，坚持开展反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左”、反右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纠正了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今后还要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反复强调，“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①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他又指出：“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②

（三）运用法律武器同各种敌对分子进行斗争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应当采取适合其特点的斗争方式。我们党在作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同时，明确指出：今后再不需要也不应该进行过去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强调要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范围内，运

---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5页。

②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39、140页。

用法律武器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邓小平说："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是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①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按照司法程序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采取的新的有效形式。

(四)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关系

历史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其主要任务是打碎剥削阶级国家机器，变革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这些任务已经完成，进行阶级斗争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各项工作，包括阶级斗争在内，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当某一段时间阶级斗争出现激化情况的时候，我们突出地和集中地抓一下，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经济建设就搞不下去。就是说，反对和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离开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更不能搞乱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在整个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30—331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要统帅我们的全部工作。在处理阶级斗争与现代化建设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包括1957年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项工作，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了，在实践上也更正确、更坚定了。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但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而且依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再认识，以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结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一、重新确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科学思想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阶级关系。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制约着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社会活动。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① 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前提条件。那时我们虽然也要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但主要是解决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民主革命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发生了根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本变化，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但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主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的阐述，这显然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 20 年间，这个理论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贯彻，发生了一系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全局性的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左”倾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这就从根本上恢复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总题目”的科学思想。随后，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纠正了林彪、“四人帮”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歪曲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等谬论，明确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肯定：“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进一步分析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阶级斗争的

地位，指出它“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强调“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为了紧紧把握这个“主题”，党中央在一系列文件中作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规定，如：要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划清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与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划清学术问题、认识问题、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与敌我问题的界限，不可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或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说成是政治错误，不可把一般的政治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也不可把犯了路线错误但仍属于党内斗争性质的问题同属于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鉴于过去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硬找斗争对象”和“对问题任意升级”的教训，明确规定：“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全局性的政治运动。”①所有这些原则和规定，将保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再度发生。

二、对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但重新确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科学思想，而且对当前我国社会许多重要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97页。

析。

在这方面，最突出最重要的贡献是正确估价了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的意义，在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中把它放在了基础的地位。我们党作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种需要表现为人们的物质利益。这种主要矛盾必然要在人际关系上得到表现，表现为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的矛盾。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① 这种利益矛盾在我国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是，纵向的国家、集体或集团(包括企业、地区、部门等)、个人之间的矛盾，横向的集体或集团之间，个人之间的矛盾，在时间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等。它们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把握这种矛盾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把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看作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才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动力、直接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根据生产力的状况，采取最适当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即体制，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便最大限度地全面地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的这种动力的作用，推动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运动，解放并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贯彻到底，贯彻到它的基础，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这一时期，还在其他方面作了如下的分析。

(一)关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映这二者的区别问题

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者之间的斗争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这时，专指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再存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会长期存在，并且必然会使人民内部矛盾带有某种阶级斗争性质。但是，这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问题，同我们过去所说的“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前者是最终消灭剥削阶级问题，后者是对人民内部的教育问题，二者不能混淆，否则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旧社会，有些知识分子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许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尽管持有资产阶级思想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许多人也是受资本家的剥削的。他们同那些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们在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当然需要注意解决自己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问题，但是，正如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

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①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都是我国社会的基本依靠力量。因此，党中央强调，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要充分信任，在工作上要放手使用，在生活上要关心照顾，当然，在思想上也要给予教育。

（三）关于国内民族关系问题

毛泽东1963年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个论断指的是美国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之间的斗争。在那里，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斗争问题，只有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民族问题，黑人才能得到解放。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正确论断不加分析，任意扩大它的适用范围，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族问题实质上也是阶级斗争问题，这就严重损害了民族团结，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肯定，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牢固树立各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观点；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同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同民族形式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并且要大力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逐步消除民族间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四）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方针，用以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这一方针也适用于解决台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86页。

湾问题。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使爱国统一路线出现了新的格局。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所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一个是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定》指出："要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总之，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三、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1. 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即是与非的矛盾。毛泽东提出，解决这个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是一个创造。但是，这一方针长期以来执行得不好，在理论上有一些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例如：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包括不包括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明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所谓人民的民主权力，首先应当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即人民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有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和批评权。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人民内部在政治立场根本一致的前提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于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产生这样那样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完全正常的现

象，只能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加以解决。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① 通过民主讨论，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思想的统一和理论的发展。在民主讨论的过程中，可能、有时甚至必然会有错误的意见，但只要这些意见不违背宪法和法律，不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原则，都应当允许发表。这样，通过讨论才能明辩是非，使正确的意见得到发扬、错误的意见得到纠正。总之，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不但包括工作上、认识上、学术上的是非矛盾，而且也包括政治上的是非矛盾。牢固地树立这个观点，对于更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怎样正确对待"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二者是统一的。实践证明，"四大"并不能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只能导致无政府状态，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说："这个'四大'的 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②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不要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也是一个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甚至被说

①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4页，第221页。

成是资产阶级口号而加以大张挞伐。鉴于历史的教训，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的领导干部都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职务高低属于政治范畴，真理属于认识论范畴，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理，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企图依靠手中的权力对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进行行政干预，只能堵塞言路、窒息真理、导致思想僵化，以致使人民内部矛盾激化。

2. 主要用经济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是与非的矛盾，而且表现在物质利益上多与少、得与失等矛盾。这是大量的、经常的、范围最为广泛的矛盾。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客观地存在着全局与局部、长远与暂时利益的矛盾、不同利益群体及个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对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进四化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涉及能否正确地和充分地发挥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可是，我们过去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解往往发生简单化的毛病，一提起人民内部矛盾便以为就是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种情况，掩盖了客观上不属于思想问题的矛盾，忽视了从经济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这方面的矛盾越积越多，以至造成某些矛盾的激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相当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

是对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的调整。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改革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保证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进取性；在企业或集体经济内部，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同本人肩负的责任或实绩结合起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随着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改革，在分配上除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外，出现了其他多种分配形式，如个体劳动者收入，凭债券取得利息收入，入股分红收入，租赁、承包经营者一部分风险补偿收入，私营企业主的一部分非劳动收入，等等。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通过试验、探索、总结经验，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新格局，使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公有制内部不同社会部门、集团之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等等诸种利益矛盾在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个基础上不断得到合理、妥善的解决。

当然，解决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物质利益方面矛盾必然会在思想上反映出来，有些人能够正确处理，有些人不能正确处理，于是产生是与非的矛盾。不解决这些是非矛盾，物质利益矛盾不能得到真正合理的解决。然而，解决思想矛盾只能为解决利益矛盾创造必要条件，却不能代替物质利益本身矛盾的解决。归根到底，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只能通过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经济政策等等去解决。

3. 用多种方法综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其中既有思想上是与非的矛盾，又有物质利益上得与失的矛盾，还有科学、艺术

领域中不同学派、风格的矛盾，以及实际工作中的许多具体矛盾。解决这些各个特殊的矛盾的方法自然也是不同的。在这里，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绝对需要的倒是其反面：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些矛盾，由于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往往不是靠某一种方法所能完全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多种方法综合加以解决。

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常见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产生既有某些工作人员思想意识、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管理体制、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不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是不可能的。但是，光是靠思想教育，包括批评、斗争，又是不够的。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首先，官僚主义的产生，同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由于生产单位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错综复杂，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并迅速作出对策反映，而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政企职责不分，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一切都纳入国家计划，一切都由国家大包大揽，这样势必产生官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页。

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①] 因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必要条件。其次，官僚主义的产生，同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大关系。党政不分，一切权力集中到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到书记那里，便往往造成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以个人有限之智慧行无限之权力，硬要他们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那还不出官僚主义？其他如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干部管理上缺少必要的选聘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等等，都是官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个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②] 所以，对官僚主义这个顽症，只有进行综合治理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① 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8页。

第四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系统工程中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它指明社会是在生产力一定水平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有机整体，上层建筑又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二者也是有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又指出，和以往社会形态的自发发展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是按照客观规律以有计划的自觉的发展为其本质特征的。在实践中它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人们的有计划的自觉的建设活动，有规律地发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从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三个基本方面有目的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反映了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运用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重大发展。这也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完整、更全面，更为科学。三个基本方面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任何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理解，都要招致严重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目标是："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

的社会主义强国。”10多年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章就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我党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作一初步阐述。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积极探索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以一系列新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是两个，“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①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①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15页。

家政权。这个政权包括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两个方面。在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要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是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① 但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和破坏，特别是十年动乱，人民群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力横遭剥夺，许多干部、群众遭到严酷迫害。正如邓小平所说：“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指出：“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鉴于这种严重的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0页。

目标包括“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十二大又进一步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十三大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要求时，也指出，我们应该牢牢把握这些基本要求，“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国家长治久安。”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所以成为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还是一种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二者统一而不可分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又反过来为公有制经济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实现和发展的政治前提和保障。“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表明，在中国，如果不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就会滋长、蔓延甚至泛滥，无政府主义也会抬头，就会严重压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才能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

的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 可见，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民主政治建设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② 国外某些人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主张建立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等于说社会主义本身是不包含民主的，需要用民主去"补充"社会主义。这是在抽象民主的口号下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同时也暴露他们所主张的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决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民主。苏联东欧剧变后的事实，充分地证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割，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离开社会主义讲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极力否认民主的阶级性，混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说什么民主的原则"不能分为东方的或西方的，也不能分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③ 其目的就是要"全盘西化"，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在我国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那一套。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国体与政体的统一。国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3—44页。
③ 严家其：《民主原则不应分东西方》，载香港《文汇报》1989年5月16日。

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 也就是民主的实质和类型。社会主义民主在国体上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业的权力。”② 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而资产阶级民主在国体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在法律条文上、在形式上的“全民”民主，而在实质上是供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富有者享受，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没有实际条件按照他们的意志和愿望管理国家的民主。作为国体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无法比拟的，它们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民主。政体即“政权构成的形式”，③指的是享有民主的阶级通过什么具体形式和具体制度来实现其民主地位和民主权利。作为政体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内部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民主形式和运行机制，更便于体现其民主的阶级实质，而一旦阶级斗争尖锐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力量壮大到足以威协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时，便转而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的政体形式，直接地公开地暴露出其阶级实质；社会主义民主在政体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还不够完备，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即使如此，社会主义民主在形式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资产阶级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以及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等等，即使在维

①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第67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4页。

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上，也不能不暴露出许多弊端，例如：竞选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并且导致互相攻击、欺骗盛行；三权分立造成人为的矛盾和牵制，不可避免地酿成政治丑剧和效率低下，等等。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①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历史经验，更加完整地深刻地揭示了这些特征，主要有：

（一）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的结合

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② 他又说："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③所以，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与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是统一的，没有人民民主，不可能有效地对敌人进行专政；而没有对敌人的专政，就不能保证人民民主。那种一说"专政"，就认为是"独裁"的看法，不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无知，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恶意歪曲。

---

①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0—151页，第131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155页。

（二）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到认识上，就是思想上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处理这些矛盾，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只要集中、不要民主或只要民主、不要集中，都不能正确调节各种利益和各种认识之间的关系，都会从根本上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等等统一起来。国家和社会要保证公民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允许并保证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民则要遵守国家和社会的纪律和秩序，尽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①

（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的结合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这种民主权利的实现，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的。共产党虽然只是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却是其中最先进的部分。它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它才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协调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组织、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既不可能争得民主，也不可能发展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19页。

和法制。”①“文化大革命”那种“踢开党委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以及当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造成的动乱和人民民主权利的丧失，都从反面证明人民民主同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四）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②社会主义民主通过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社会主义法制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其内容，二者互相包含、互相确认。没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没有法制的民主，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动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就“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③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建国以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没有重视法制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保证和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④

所谓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是要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等等，用系统而严密的制度和法律来体现和保证，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

①②③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21页，第319页，第216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8页。

变而改变。只有使民主具有完备的制度和法律形态，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逐步完善起来并具有权威性，才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党的领导指出，要做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必须做到：

（一）抓紧立法

法律化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能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律，而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列宁指出：“**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① 过去我们对这一点重视不够，以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制度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忽视建立和健全具体的民主制度以及把这些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甚至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随着改变。这实际上是“无法可依”。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②

（二）强化法制的权威性

有了法，就必须依法办事，树立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殊人物。任何领导人都不能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18—319页。

滥用权力，破坏法制；如果违法，也一定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因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没有超出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法制教育。

制度和法律是人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人缺乏法制观念，制度和法律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社会的民主法制观念比较薄弱。加强法制教育，是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条件。党中央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守法。要通过法制教育，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

四、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政治体制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原则、方针、步骤，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例如：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同时他又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① 这里讲的“具体制度”、“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等等，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政治体制”。我国的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体制，又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的影响，明显地带有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必须指出改革政治体制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同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结合起来，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7、281—282页。

误倾向。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改革政治体制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改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是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这种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所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所主张的改革则是要根本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严格划清界限。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须坚持兴利除弊的原则，不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现行体制中好的东西不但不能抛弃，还要坚持和发扬。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不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不但要最终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造就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① 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在这个目标中，高度民主是核心。完备的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富有效率和充满活力是民主政治体制的表现。这当然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其中包括：党政分开——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进一步下放权力——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页。

府与企业、党和政府与群众组织之间的权力，“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抓住转变机构职能这个关键，克服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等等弊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等等。当前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理顺党、行政组织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健全选举制度，进一步实现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把近期目标落脚到领导体制的改革，是充分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既抓住了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又避免了过急、过高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有限的，但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逐步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

（三）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过程，既不能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匆忙行事、急于求成，而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①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② 因此，一定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不断提高其水平。同时要注意，“民主化和现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页。

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①] 特别是在我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因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历史的社会的条件限制，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②]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民主建设上如果要求过高、过急，甚至不顾国家法制而搞过去那种所谓“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那样，只能干扰和破坏民主化的进程。特别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各项改革都要注重试验，注意找到切实的过渡办法和措施，做到循序渐进。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我国几十年来思想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日益深化。因此，它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

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首先的和最重要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54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14—15 页。

的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论述，其基本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上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挥。

我们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思想包含丰富的内容，并且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深化的过程。

（一）针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了指导思想上长期的“左”的错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从此，开始了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全国掀起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热潮。但是，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突出的是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79 年春天，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党内一些同志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走向了右的方面，提出了不少错误观点。与此同时，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也贴出了不少反动大字报。当时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二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三是提出要“民主”，要“人权”。邓小平敏锐地看出了问题的实质，1979 年 3 月 30 日，他在理论务虚会结束时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① 这篇讲话，虽然未用精神文明一词，但已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以及道德建设这些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并且论及了它们的重要地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相当全面地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内容，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在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此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件都反复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例如，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思想，逐渐在全党形成了共识。

（二）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出发，深入阐明物质文明与精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0页。

神文明的关系

运用文明或文化范畴概括人类历史的发展程度，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早已使用的一种方法。然而，他们的文明或文化范畴仿佛是独立自在的东西，缺少依存的根基，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党的十二大报告吸收了文明或文化研究中的合理因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文明或文化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认为文明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实践的产物和结晶。这样，就使文明或文化范畴有了坚实的根基，得到了科学的解释。报告指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十二大报告引用了马克思和毛泽东关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互相联系的论述，阐发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由此，报告得出了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结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这些论述，强调了两种文明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体现着两个文明建设要"同时并举"、"两手抓"的思想。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更加具体地论述了两种文明相互作用的机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决议》在阐述两种文明互相促进的同时，注意突出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地位，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强调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同时，物质文明建设又是整个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基石。这种对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解，要求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离开物质条件，不受物质因素制约的唯心主义倾向；又要反对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机械论倾向。这就是我们党在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上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高度，全面把握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社会制度进步的关系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又包括社会制度的建设。它们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任务。因此，我们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仅仅指出它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社会制度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

邓小平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1980 年 8 月 18 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

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① 尽管这里仅仅涉及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的关系，但个别总是包含着一般，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制度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也有重要启迪。事实也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改造确实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说，社会风气当中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如少数干部的以权谋私，一些劳动者对公共财产的不够关心，等等，不仅同落后的、腐朽的思想影响有关，而且同社会体制中的缺陷和弊端有直接联系。如果社会制度建设得比较完善，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无疑会大为减少，受到极大抑制。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更加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里，已不再限于两种文明建设，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的关系。《决议》还具体论述了这一关系，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强大活力，对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随着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93 页。

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决议》在全面论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相互关系的同时，强调了物质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基础地位，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而精神文明建设又是社会制度进步和发展的必要保证，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当然，从总体上说，由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对人们之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调整，而精神文明建设则是对人们之间的思想关系以及主观同客观关系的改善，因此，体制改革是更基本的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使它们协调发展，这体现着对这个问题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思想。

这样，我们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认识就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它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的最重要成果。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我们党在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对它的

内容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党的十二大报告概括了这些认识成果，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概括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大方面。报告指出："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将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又进一步具体化为五个方面：

（一）理想建设

《决议》认为，理想建设是分层次的，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决议》批评了只讲最高理想的片面性，强调要把党的最高理想和全国人民现阶段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决议》还指出，要把共同理想同各地实际、同个人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使理想建设落到实处。《决议》还提出，要把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结合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结合我们民族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进行理想建设。

（二）道德建设

《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强调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同时认真提倡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注意从实际出发，照顾多数，鼓励先进，把先进性的要求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在阐明了道德建设的两个基本层次之后，《决议》指出，这些要求应当在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个人生活领域体现出来。《决议》突出强调了职业道德建设，特别是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以权谋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和纠正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

（三）民主法制观念建设

《决议》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忽视民主政治建设这一重要历史教训，强调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要增强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决议》指出，民主和法制、纪律不可分，“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里体现着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实质内容，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形式，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不可割裂。《决议》还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根本问题是教育人，要从小学抓起，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纪律教育。

（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决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努力使它们扎扎实实地得到普及和提高，尤其是教育和科学，更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国家要从政策上、资金上保

证这些事业的发展。《决议》指出，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中，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决议》强调，必须进一步解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切实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理论建设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为了搞好理论建设，首先要用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其次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最后是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积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更要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将以上内容概括起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

在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中，包含着对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大量论述。这些论述，凝结着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理解和自觉驾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根据我们党的大量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可

以大体归纳为以下六条：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总方针，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方针实际上都是这一总方针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着我们党对人类实践活动（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客观的活动过程，但是，它又离不开一定思想意识特别是理论的指导。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它是人们从实际出发能动改造世界的中间环节。这种对实践和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思想意识和理论的作用，努力把指导思想搞正确，这是保证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而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最科学、最正确的思想理论，一方面，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它正确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是最先进的价值观念，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阶级性和人民性。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质就是坚持从社会发展规律（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出发，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立足点。显然，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唯一正确的方针，根本的方针。

（二）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社会制度改革相结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适应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使精神文明建设渗透在物质文明建设、体

制改革之中，把各项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都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要与其他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顺便指出，对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进步，理论界一些同志将其概括为“制度文明建设”。这是对列宁提出的“政治文明”概念的继承和拓展，因为制度文明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进步，而且包括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的改善。“制度文明建设”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更好地表现了人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文明的三维立体结构，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因此是一种应当肯定的有益探索。这样，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建设相结合，也可以简要地称之为“三大文明建设一起抓”。

“三大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思想，体现着对精神文明建设同其他文明建设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解。它表明，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基础，同时，物质文明建设和制度文明建设又不可缺少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和支持，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三大文明建设一起抓”，就是自觉运用这个一般规律，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三）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结合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理解得很片面，强调的仅仅是思想道德方面（这里姑且不谈其内容方面的错误），十分轻视教育科学文

化和歧视知识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多次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文化建设是思想建设的必要基础和重要条件，其中的科学和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处于突出地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建设又是文化建设的指导和保证，它直接决定文化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近年来，针对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以及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日益加紧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又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建设问题，同时仍然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这些情况表明，对于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方面，我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可以而且应当侧重强调某一方面，但从总体上说，则二者不可偏废，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把握。这体现着对精神文明建设自身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理解，即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四）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

在我国现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或目标，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现过急于求成、求高的倾向，例如，要求广大群众普遍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以至否定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和正当的个人利益。同时，也出现过相反的倾向，如只讲文明礼貌等社会公德而不讲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先进道德。针对这些倾向，《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正确地指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

力量。”这一精神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方面是同样适用的，例如，在理想建设上，也有一个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结合问题；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也必须辩证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当然“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①]广泛性与先进性相结合的原则，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普及和提高辩证关系的思想，并且将它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因此又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发展。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这一原则表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要求是有层次性的，其基本层次是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其更高层次则是对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前一层次，同时把它们辩证统一起来。此外还应该指出，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还包含另一涵义，即在对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性要求中，也要体现一定的先进性，引导群众前进一步，而不是停止于群众的现有水平，更不是去迁就落后。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原则的提出，体现着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自身规律的又一理解：一方面，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同该阶段的经济以及政治发展要求相适应，既不能滞后，也不应盲目超前；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实质是全体人民、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从广大群众现有的思想文化状况出发，着重考虑群众的大多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同时兼顾少数，引导他们逐步前进。

（五）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外国先进思想文化相结合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着如何处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强调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党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少封建腐朽思想，如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伙、男尊女卑等等，这是必须批判和否定的。但是同时，传统文化中也有热爱祖国、勤劳节俭、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等优秀传统。我们既要反对复古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对于外国思想文化，同样应采取分析态度。针对我国多年来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存在的自我封闭、盲目排外的“左”的倾向，我们党提出要注意吸收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针对少数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倾向，我们党又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不允许搞全盘西化。总之，我们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努力“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六）党的领导与依靠广大群众相结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自发地发展的，而是在主体的努力下自觉建立起来的。这个主体既包括党、党的组织和党员，又包括各行各业的广大群众。我们党指出，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双重责任，其一是搞好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做广大人民群众的表率；其二是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努力探索规律，研究政策，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单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群众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因此，必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广大群众来搞好这项建设，并且把党的领导和依靠广大群众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的实际运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和物质文明建设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二者是有机的统一。根据实践经验，我们党又强调了两种文明一齐抓的根本方针，反对"一手硬，一手软"，反对只片面强调抓物质文明建设，而低估、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了两者的统一。对此，我们必须有唯物主义的辩证的理解，必须有贯彻执行的高度自觉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毛泽东哲学思想
作者＝韩树英等著
页数＝５２３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
一、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
三、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
一、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辟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创立了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
三、分析了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
四、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多方向展开（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
一、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完整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三、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四、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体系
五、系统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达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空前统一，来赢得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六、依据历史辩证法，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建国后经历复杂过程的发展（１９

４９—１９７６年）
一、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
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揭示了人类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四、指出形成正确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阐明了物质和精神辩证转化的辩证规律
五、批判了唯心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
六、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新阶段（１９７６年以来）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
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在再认识中的深化和重大发展
四、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思想
五、深化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和统一战线理论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基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重要特征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
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哲学思想武器
第二编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第一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发展
一、科学地揭示了实践概念的内涵和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二、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深刻论述了天才和实践、天才和群众的关系
第二节　系统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
一、认识运动的过程、阶段和“两个飞跃”、“两变”的思想
二、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

三、认识的总过程、总规律
四、真理同谬误的对立统一和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性
五、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三节 强调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
一、自觉能动性的科学内涵和表现
二、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及其和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
三、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
第四节 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
一、实事求是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认识基础
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三、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第五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反对主观主义
一、反对主观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二、从哲学认识论高度对主观主义的系统批判
第二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从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论述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二、论述了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把握和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及其运动发展
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深刻说明其他辩证法规律和范畴
第二节 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建立了分析复杂的现实的矛盾的逻辑体系
一、两种宇宙观、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二、以矛盾普遍性为基础，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发
三、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具体阐述
第三节 揭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一、揭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二、把握矛盾问题精髓的意义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论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矛盾分析方法
一、反对形而上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和显著特点
二、论坚持矛盾分析方法
第三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第一节 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
一、国情分析与中国革命性质及其道路的揭示
二、阶级分析与中国革命动力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证
三、时代分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历史必然性的论证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第三节　群众路线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二、群众路线理论的根本内容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第一节　党的建设中的哲学思想
一、正确处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辩证关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二、党内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
第二节　政策和策略中的哲学思想
一、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唯物主义原则
二、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第三节　军事斗争中的哲学思想
一、研究战争规律的方法论原则
二、战略战术辩证法
三、人民战争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第四节　文学艺术论中的哲学思想
一、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二、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三、文艺工作中的辩证法
第五节　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毛泽东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形成
二、毛泽东方法论的若干特点
第六节　关于哲学解放
一、毛泽东致力于哲学解放的伟大实践
二、哲学解放和群众学哲学的努力方向
第三编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章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三、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五、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改革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一、论证了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
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
一、重新确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科学思想
二、对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
三、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基本特征
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四、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